北京文博

文丛

北京市文物局 主办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文博文丛 / 陈晓苏主编.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6

ISBN 978-7-5402-2701-2

Ⅰ.①北… Ⅱ.①陈… Ⅲ.①文物工作－北京市－文集

②博物馆－工作－北京市－文集 Ⅳ.①G269.27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15638号

责任编辑：王　然

ISBN 978-7-5402-2701-2

9 787540 227012 >

北京文博文丛（2011 *2）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36号　100007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399邮箱）

北京兰星球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787×1092毫米　16开本　7.5印张　181千字

2011年6月第1版　2011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15元

北京文博

目　录

2011 年第 2 辑（总 64 期）

文物工作

关于北京城“中轴线”的文化意义及其特征……孔繁峙　(7)
赴台参加海峡两岸文化创意展考察观感……于　平 (11)
北京市第三次文物普查概述……马英豪 (13)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专栏

北京李大钊故居文物保护展陈追述
——谨以此文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吉晓平 (26)
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藏珍贵革命文献述要……孔繁云 (34)

博物馆学

对正阳门展览工作的回顾与思考……李　晴 (42)
用艺术的语言诠释京剧的神韵……常　硕 (46)

文物研究

从北京大葆台西汉墓出土玉器谈汉代葬玉制度……李　伟 (53)
金代韩景□神道碑考释……孙建权 (57)
明朝大司礼郑真墓志考……苗天娥 (64)
试论紫砂器的发展及清代紫砂茶具之特色……桑颖新 (72)

清初著名收藏家孙承泽的鉴赏著述及其特色……刘仲华（77）
紫禁城内随安室探源及室内布局……刘鸿武（82）

北京史地

北京夏商西周考古学文化的类型谱系……张智勇（89）
北京地区出土的几方唐代女性墓志……高智伟（95）
馆藏北京地区出土的明代火铳火炮……于力凡（100）
万寿寺创建对明代传统佛事规制的四大改变……孔祥利（107）

文物保护

丽泽金融商务区金中都西营遗址起取保护……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113）

资料信息

北京市文物局2011年一季度文博事业大事记……尹　君（116）

《北京文博》编辑委员会

顾　问：侯仁之　李学勤　吕济民

主　任：宿　白　　**副主任：**孔繁峙　廖静文　王世仁　曹子西　齐　心　马希桂

编委会委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　平　王　丹　王丹江　王玉伟　王有泉　王　岗　王鸿年　巴爱民　卢迎红　许　伟
刘开阳　刘建业　刘超英　向德春　李建平　吴梦麟　宋大川　张若妮　张展(大)　张展(小)
陈　旭　郝东晨　郗志群　姚　安　耿春卫　高小龙　高凯军　郭小凌　崔国民　葛英会
韩　扬　舒小峰　温桂华　谭烈飞

主　编：陈晓苏　　**编辑部主任：**韩建识

本期责编：韩建识　陈　倩　高智伟

主办单位：北京市文物局　　**编辑出版：**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北京文博》编辑部

北京文博网网址：http://www.bjmuseumnet.org

《北京文博》电子邮箱：bjwb1995@yahoo.com.cn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AND MUSEUMS

NO. 2, 2011

Contents

CULTURAL RELICS WORK

On the Cultural Meaning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entral Axis of Beijing City
……*by* Kong Fanzhi (7)

Impression on Investigation of the Two Sides of the Straits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Exhibition in Taiwan……*by* Yu Ping (11)

Summary of the Third Beijing Municipal Cultural Relics General Investigation……*by* Ma Yinghao (13)

COLUMN OF COMMEMORATING THE 9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Recount of the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Exhibition of Li Dazhao's Former Residence in Beijing ——To Commemorate the 9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by This Article……*by* Ji Xiaoping (26)

Brief Account of Precious Revolutionary Books Collected in Book and Data Centre of Beijing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Bureau of Cultural Heritage……*by* Kong Fanyun (34)

MUSEOLOGY

Review and Reflection on the Exhibition Work of Zhengyangmen……*by* Li Qing (42)

Annotate the Verve of Beijing Opera by Artistic Language……*by* Chang Shuo (46)

CULTURAL RELICS RESEARCH

Discussion on the System of Burial Jade in Han Dynasty from the Jadewares Unearthed in the Dabaotai Western Han Tomb……*by* Li Wei (53)

Study on the Divine Path Stele of Han Jing□ of Jin Dynasty……*by* Sun Jianquan (57)

Research on the Epitaph of Zheng Zhen,the Great Sili of Ming Dynasty……*by* Miao Tian'e (64)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urple Clay Pottery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urple Clay Tea Sets of Qing Dynasty……*by* Sang Yingxin (72)

Appreciation Works of the Famous Collector Sun Chengze in Early Qing Dynasty and their Characteristics ……*by* Liu Zhonghua (77)
Exploration on the Source of the Suianshi in the Forbidden City and the Interior Layout……
……*by* Liu Hongwu (82)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BEIJING

Types and Pedigrees of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of Xia, Shang and the Western Zhou Dynasties of Beijing ……*by* Zhang Zhiyong (89)
Several Women's Epitaphs of Tang Dynasty Unearthed in the Beijing Area……*by* Gao Zhiwei (95)
The Fire Blunderbusses and Ordnances of Ming Dynasty Unearthed in the Beijing Area Collected in the Capital Museum……*by* Yu Lifan (100)
The Four Great Changes of the Traditional Buddhist Ceremony Regulations of Ming Dynasty by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Wanshou Temple……*by* Kong Xiangli (107)

PROTECTION OF CULTURAL RELICS

Lift Protection of the Western Barracks Sites of Middle Capital of Jin Dynasty in the Lize Finance Business District……*by*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Research Institute, History and Culture School of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113)

DATA AND INFORMATION

Chronicle of Events Concerning Cultural Relics and Museums of the Beijing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Bureau of Cultural Heritage (1st Quarter of 2011)……*by* Yin Jun (116)

EDITORIAL BOARD OF BEIJING WEN BO

Advisiors:*Hou Renzhi, Li Xueqin, Lv Jimin*
Chairman:*Su Bai*
Vice-chairmen:*Kong Fanzhi, Liao Jingwen, Wang Shiren, Cao Zixi, Qi Xin, Ma Xigui*
Members:*Yu Ping, Wang Dan, Wang Danjiang, Wang Yuwei, Wang Youquan, Wang Gang, Wang Hongnian, Ba Aimin,Lu Yinghong, Xu Wei, Liu Kaiyang, Liu Jianye, Liu Chaoying, Xiang Dechun, Li Jianping, Wu Menglin, Song Dachuan, Zhang Ruoni, Zhang Zhan(Elder), Zhang Zhan(Younger), Chen Xu, Hao Dongchen, Xi Zhiqun, Yao An, Geng Chunwei, Gao Xiaolong, Gao Kaijun, Guo Xiaoling, Cui Guomin, Ge Yinghui, Han Yang, Shu Xiaofeng, Wen Guihua, Tan Liefei*
Editor-in-chief:*Chen Xiaosu*
Director of Edtiorial Department:*Han Jianshi*
Managing Editors of this issue:*Han Jianshi, Chen Qian, Gao Zhiwei*
Edited and Published by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Beijing Wen Bo, Book and Data Centre, Beijing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Bureau of Cultural Heritage
URL:http://www.bjmuseumnet.org
BEIJING WENBO E-mail:bjwb1995@yahoo.com.cn



关于北京城“中轴线”的文化意义及其特征

孔繁峙

北京城中轴线及其建筑，是北京古都城市的核心内容，也是令世人瞩目的北京历史名城的重要建筑，在历经数百年的风雨岁月而延续至今并始终保持强大文化活力的天安门、紫禁城、钟鼓楼、正阳门、永定门及天坛等历史建筑，不但是北京古都城市的重要标志，也是我国几千年延续的历史文化的一个缩影。

一

北京城中轴线及建筑的规划理论与营造方式，蕴含着深厚的民族历史文化，与我国延续数千年的古都城市发展史一脉相承，构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独具魅力的古都城市营造体系，是几千年来中华文化孕育的一种特殊的文化成果，是我国民族历史文化在古都城市规划营建上的具体表现形式。它是我国古代社会政治、文化与城市建设的有机统一，是我国几千年社会文化与古都建筑的传承与发展的有机统一。从文化意义上概括，北京城中轴线及其建筑，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古都历史文化发展的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重要载体：

一是，北京古都城市建筑布局包含着深厚的古代城市规划理论。明清北京城是直接在元代大都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城市的规划建设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但其城市规划理念的历史文化渊源，却可以追溯到遥远的东周时期。考古发现及研究证明，已发现的我国古代城市的规划建设，无论早期的王城还是后期的都城，都能看到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周礼·考工记》中记述的王城规划建设的理论痕迹。特别是到了东汉以后魏晋洛阳城的营建，考古发现表明，此时宫城前已有了“左祖右社”的规划布局方式，已产生了城市中轴线的最初形态。隋唐长安城，是在国家重归统一、国力强盛、文化繁荣的社会环境下建造的一座空前规模的都城，其皇城、商市、里坊等建筑对称布局，形成了明确的城市中轴线。在以后的隋唐洛阳城、宋代的汴梁城、辽代中京城、南京城、金代中都城和元代大都城，都传承了我国古都城市的中轴布局方式和理论准则，明清北京城更是与之一脉相承。保存至今的北京古都城市及中轴建筑，承载了我国自东周时期形成的都城营建的传统规划理论，代表了我国绵延数千年的社会历史文化与城市文明。

二是，北京城市及中轴线建筑规划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根源。明清北京城及中轴线的营造规划，既继承前朝的历史成果，又吸纳了丰富的传统文化理念，它是几千年封建社会政治及文化观念的产物。在我国历代封建王朝的发展演变中，都城的中轴线及其建筑，之所以历代沿用而不衰，

其实质是在我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中占文化统治地位的儒学思想影响的反映，是儒学中的“中庸”哲学在城市建设中的体现。“中庸之道”既是扎根于社会各阶层的文化观念，也是封建王权用“中庸”说教对天下的统治，在古都城市的历史生活中，无时无处不在地渗透在社会的各个领域。特别是古都城市的核心建筑——中轴线，更是保留有这种深深的历史文化烙印。所以，我们更应该从历史文化及传统观念来认识其中轴线文化，这样才能使中轴建筑回归真正的历史文化的理论与象征。

三是，古都中轴建筑以特殊的形式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从本质意义上讲，古都中轴线的构成，就是城市规划建筑与封建社会的政治、文化观念的有机统一，是我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中的皇权、政权、民生、民俗等多种政治文化理念，在古都城市建筑层面上的集中体现：

——突出了封建帝王的皇权观念。坐落于城市中轴线及全市的中心位置，又经外城、内城、皇城层层相套的防护下，建设了威严的皇宫，以及在全城核心点上修建了高大辉煌的帝王金銮宝殿，凸显了封建帝王对天下统治的绝对权威。

——强化了封建政权机构对国家的统治与管理。将象征封建国家最高统治机构的兵部、吏部、刑部、礼部、工部等衙署设置在天安门前的中轴线两侧，昭示着直接听命于封建帝王的旨意，并对“天下”发布政令、实施统治；紧邻其南侧中轴线上的雄伟高大的城楼、城门和城墙，则体现了皇权、衙署等封建国家政权的统治威严与观念。

——展现了封建帝王的“民生为本”治国观念。处于中轴线南端两侧的天坛、先农坛，是明清帝王祭祀的场所，明清帝王每年到天坛举行祭天、祈谷和祈雨活动，为社稷百姓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收、祈神灵保佑国泰民安；到先农坛祭山川、太岁、风云雷雨等诸神，并象征性地亲耤“一亩三分”地，以示重视农事，与民同耤，祈祷丰年，体现了封建社会“重农事”、以“民生为本”的传统发展理念。

——反映了古都城市的百姓民俗生活。中轴线北端是古都规划中的“前朝后市”的城市商业区；在中轴线两侧的锣鼓巷、什刹海是都市百姓的居住、生活、休闲区域；分布于前门大街两侧的大栅栏、鲜鱼口等传统商业街，是明中期扩建外城后而成为南中轴两侧的历史商业区域，几百年来，与鼓楼大街形成了中轴线南、北两处最具民间文化特色的胡同四合院、传统老号、寺庙会馆等建筑和场所的都市百姓的生活区域，代表了古都城市的市井民俗文化。

二

北京城中轴线及其建筑，蕴含了我国数千年城市建设的理论及发展的历史“信息”，承载了深厚的古都城市传统文化内涵，在古都城市及社会文化中占据着核心价值的重要地位和强大的影响力，在当今世界城市行列中，显示着独具魅力的文化特征：

（一）在世界古都城市发展史上彰显东方传统文化特征

伴随着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开启，人类城市文明的曙光即出现在中华大地上，由于古代东方的文化特色而形成的中国古代独特的城市规划理论，使得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即呈现出不同于世界的城市规划理念和建筑布局。特别是对历代古都城市考古发现的中轴线遗迹，更是以实物证明，我国早在魏晋时期形成城市中轴线，并在绵延千百年的朝代更叠中一脉相承、不曾中断，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城市文明的突出特色。

世界上很多国家在城市建设上也有轴线组合的规划方式，如美国华盛顿的国会山、林肯纪念堂等建筑群的规划，就采用了轴线组合、左右对称的方式；法国巴黎卢浮宫建筑群也以轴线方式向前延伸展开，有明显的层次感。相比之下，中国古代城市中轴线与世界各国的城市建筑轴线有很

大的不同：

一是，中国城市中轴线在全城的规划中具有突出的整体性。如北京城中轴线上规划的各种建筑，它不是独立于全市之外的，它更不是一组孤立存在的建筑群落。与世界很多国家的中轴建筑根本不同的是，北京城市中轴线贯通了外城、内城、皇城、宫城直达城市北端，7.8 公里的纵向空间同整座城市联系在一起，并与分布城市四周的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及南顶、北顶、东顶、西顶、中顶等坛庙建筑，共同组成一个城市建筑的有机整体。

二是，中国城市中轴线在整座城市中发挥统领作用。世界很多国家城市的中轴线及建筑大多是王室、政府或纪念建筑群落的一种布局方式，只在城市的某一区域内体现了某一领域的精神追求与文化象征。而北京城中轴线及建筑穿越外城、内城、皇城、宫城，在全市的城市建筑中发挥着辐射作用，制约着全市的建筑布局与建筑的形制、体量，全市建筑均遵循以中轴线为中心的两侧对称的布局方式，从而形成了皇宫内两侧分布有文华殿、武英殿，皇城内两侧的“左祖”（太庙）“右社”（社稷坛），内城的“东四”、“西四”和两侧对称的四合院街区，正阳门两侧的崇文门、宣武门，外城两侧的天坛、先农坛，日坛、月坛和永定门两侧的左安门、右安门等两侧对称的建筑布局，使中轴建筑的主导作用更加突出。

三是，以建筑形式展示了东方特有的城市历史文化内涵。与国际城市相比较，中国古都城市中轴线的一个突出特色是，以城市中轴线及建筑表达对城市及社会的人文理念。如北京中轴线就包含了中国几千年在封建社会思想意识中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学说的“中庸之道”和“居中不偏”、“不正不威”等传统观念，特别是通过皇宫、六部衙门在城市中的独特位置和特殊的建筑等级及形制，充分表达了封建皇权至高无上的威严和中央集权的国家统治方式。

（二）古都历史发展的各民族“多源一体”文化的认同特征

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是各民族共同创造发展了中华悠久的历史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尽管各自已形成本民族特有的文字、信仰和生活习俗，但在长期的民族交往融合中，各民族都通行共同的文化。北京作为古都城市，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成就，就是由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北京作为辽、金、元、明、清五朝故都，就是由我国历史上的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汉族和满族这五个民族建立的王朝。尽管五个民族都有各自的文字、信仰和生活习俗，但是，各个朝代都遵循中华民族的统一文化——儒家学说，这种多源一体化的民族历史文化，不但为都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而且还保持了中华主体文化的延续性。辽金以后，是我国历史上都城建设发展的辉煌时期，大量的考古发现证明，辽南京、金中都、元大都、明北京等历代都城的营建，都延续了我国历史上《周礼·考工记》关于都城营建的理论，继承和发展了城市中轴线的建设传统。特别是满族入关后建立的清王朝，更是完整地继承和延续了明代北京城，而且在使用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和丰富了古都中轴线的建筑内容及文化内涵。北京城中轴线及建筑，充分体现了我国历史上各民族“多源一体”的历史文化特征。

（三）古都城市社会文化多样性特征

坐落在长达 7.8 公里中轴延长线上的各类建筑群及不同区段内的沿街建筑，都承载着多种历史信息和深厚的文化内涵，浓缩了古都城市历史上丰富多彩的都市文化：

——皇家文化。规模宏伟的明清故宫等皇家建筑，代表了中国历史建筑艺术和建筑文化的最高水平。明清封建王朝长达五百余年的统治，其治国方略及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促进，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在儒家学说占文化统治地位的背景下，明清王朝为实现国家统一、巩固民族和谐、推动社会发展的治国理念，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官府衙署文化。处于天安门前中轴线两侧的“六部”衙署，代表了明清封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体现了明清时期封建国家坚持中央集权制的统治体制，象征着国家的统一、社会的稳定和民族的和谐。

——坛庙文化。处于皇城、内城、外城中轴线两侧的太庙、社稷坛、大高玄殿、火德真君庙、广福观、天坛、先农坛等多座坛庙建筑，代表了明清社会多种教派并存的民族宗教与信仰，反映了明清帝王尊祖敬神、祭天祈雨、重农事、护苍生、巩固社稷、追求国泰民安的思想观念和社会文化。

——传统商业文化。处于南、北中轴线两侧的前门大街和鼓楼大街，是明清时期形成的全市重要的商业街。沿街两侧分布有大量的多种经营方式的商业店铺、老字号，如前门地区的同仁堂、都一处、一条龙和著名的“八大祥”以及地安门外烟袋斜街的众多传统店铺等，都在京城赢得了很高的商业信誉和影响，是古都历史上最重要的历史商业街，具有着浓厚的传统商业气息，反映了古都传统商业文化的繁荣景象。

——市井民俗文化。处于中轴线北端两侧的锣鼓巷、什刹海、白米斜街等大片历史街区，是历史上著名的老北京胡同四合院及居住、休闲的传统区域，为历代达官、富贾、市民百姓的生活居住区和以积水潭为中心形成的文人墨客游览休闲的传统风景区。白米斜街、烟袋斜街、大小金丝套等街区，都是随着元代以后京杭大运河漕运终点的改变、积水潭的逐步缩小而形成的融汇民居、商业、娱乐的市井民俗区域，代表了老北京民俗文化的特色。

——近现代革命文化。20 世纪 50 年代在中轴线上形成的天安门广场，是新中国成立举办开国大典的场所，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建于中轴线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国旗杆以及天安门城楼，承载着中华民族百余年前赴后继、浴血奋战的光辉业绩，象征着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在 20 世纪新的崛起，象征着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在新世纪的延续和发展。

（四）体现了古都城市社会生活和谐有序的文化特征

北京城中轴线是古都城市的核心建筑，其建筑除自身具有的无与伦比的核心价值外，其在全城中的作用及意义，还在于通过中轴线及建筑对全市各类建筑的辐射作用，有效地控制着全市东西两侧的各类建筑，制约着全市各类建筑的位置、高度、形制、体量，使全市建筑排列有序、布局和谐，并与分布在全市四周的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共同构成古都城市的规划整体。在南北中轴线的有效制约下，古都城市建筑和道路形成了左右对称的格局，从皇宫皇城、内城外城及城门等各类建筑，都依轴线两侧对称布局，充分展现了古都城市建筑布局和谐有序的文化特征。

（五）体现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文化特征

北京古都城市代表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城市建设与社会发展的历史文化，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辽、金、元、明、清五朝故都，在进入 20 世纪以后，古都北京再次成为中华民族的国家首都，尽管古都城市历史性质已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中轴建筑也失去其原有的历史功能，但古都中轴线作为民族文化遗产，得以保护、延续与发展并不断注入新的文化活力。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建设的需要，在古都中轴线上形成了国人瞩目的天安门广场，建设了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人民大会堂、中国人民历史博物馆和中国人民革命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等具有鲜明民族传统特色的现代化文化建筑，使古都中轴线既保留了原有的历史建筑及传统文化特色，又体现了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民族文化的时代性与先进性，从而使北京城中轴线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几千年优秀文化发展的一脉相承、绵延数千年而不曾中断的古都文化特征。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局局长）

赴台参加海峡两岸文化创意展考察观感

于 平

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宝岛台湾的日月潭、阿里山十分美丽。参加工作后，我知道了台北故宫收藏着很多皇家御器。这几年北京文博会台湾参展团的加盟，又让我看到了许多很好的台湾文化创意产品，了解到一些台湾的文化创意项目。自然我对赴台湾考察有着很多的期许。

2011 年 4 月 19 日至 28 日，我终于有幸代表北京市文物局组织市场处及北京古玩城、观复博物馆、北京文博交流馆和北京大慧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四家单位一行 11 人赴台参加“海峡两岸第三届文化创意产业展”。此次展览由北京市贸促会、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促进中心、北京市台办主办，涉及我市文化创意产业八大板块的相关委办局和产业集聚区及各文创单位共一百余人参加。

经过几天的搭建布展等前期筹备工作，21 日“海峡两岸文创展”如期开幕，北京市贸促会副会长储详银先生、台北市文化基金会董事长李永萍女士、台北世贸中心



副董事长吴文雅先生、台北市文化局副局长陈冠甫先生等台湾文创界的领导出席了开幕式和“2011 海峡两岸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论坛”。我作为北京团顾问，主持了海峡两岸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论坛会第一时段，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促进中心主任梅松先生、北京市海淀区文化发展促进中心名誉主任李彦来先生、中关村科技园区雍和园管委会副主任贾邦先生、第九届中国（北京）国际园林博览会筹备办副主任陆铭琦先生、台北市文化局副局长陈冠甫先生等相继作了主题演讲，海峡两岸的文化创意从业人员们在和谐、融洽的氛围里交流了思想，互通了这几年文化创意产业在两地的发展状况，会议和论坛均取得圆满成功。



台湾文化创意园区入住企业

随后几天我又随代表团先后参观、考察了台北故宫、台北华山 1914、台湾创意设计中心、台北文创基地——西门红楼当代艺术家作品展、九分茶文化创意设计区、新竹市铁道艺术村、台湾盐博物馆、屏东观光果园、兆丰观光农场、花莲县农会等地，从台北一路南下，绕岛环形，利用参观、拜访、交流、洽谈、联谊、座谈等多种形式和沿途台湾文化界、会展界、教育界相关人员交流沟通。从中了解到台湾文化创意理念、文化创意产业经过近十年的培育和发展已经深入到当地民众的生活中，从国小学生在校教育就开始培养环保理念和利用环保材料开发创意制作的教育。社区也为民众提供交流制作的空间和平台，一些志趣相同的人们聚在一起创作，并且传授他们的技艺，让更多的人从中分享到快乐。另外，在台湾创意设计中心，我们看到了许多有想法、有作为的青年人，当然也有一些艺术家和年事已高的长者，人们利用过去的历史建筑空间成立设计工作室或文化区，大家汇聚在一起，逐渐形成文化创意设计制作集聚区，传统和现代相结合，文化和科技相结合，历史和现今相结合。这个领地是属于来到这里参与创作或工作的每一个人，大家都是平和、淡然的并享受着创作带给他们快乐的感觉。“理想的度假，是停留，不是奔波；是散步，不是赶路；追求慢活！”这是台湾花莲县理想大地度假饭店小商品部门上写着的广告语，我想这或许也是台湾人的一种生活态度。



花莲县理想大地饭店一家小商品店门板设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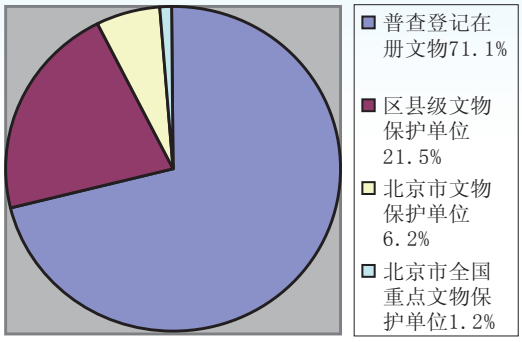
我这次到宝岛台湾参观考察了不少的文化产业园区，拜访、座谈了一些从事文创工作的部门和相关人士，尽管只有短暂的 10 天，但印象深刻，获益匪浅。我感觉台湾人对文化创意情有独钟，人们在创意中生活，创意也让人们的生活五彩缤纷、富有活力。文化创意让生活变得更美丽。这是我台湾文创之行一路的感受。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

北京市第三次文物普查概述

马英豪

1997 年开始，北京市文物局组织全市区县文物工作人员，在全市范围内进行了北京市第三次文物普查，普查工作于 1999 年 12 月结束（数据统计截止时间），2000 年 1 月 25 日，北京市第三次文物普查资料成果经普查工作指导组专家评审通过。2001 年 2 月 20 日，北京市文物局将《关于北京市第三次文物普查有关工作的报告》上报北京市政府，普查工作结束。



图一　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构成图（%）

一、北京市第三次普查统计总体数据

经统计，全市共计各级文物保护单位 3550 处。截止到 1999 年 12 月，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共计 42 处，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共计 222 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含暂保和指定）共计 763 处，普查登记在册文物（即一般文物）共计 2523 处，其中新发现 485 处。

另外，在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中，按照文物类别统计，古遗址共计 299 处，古墓葬共计 241 处，古建筑 1308 处，石窟寺及石刻共计 1035 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528 处，其它 139 处。需要说明的是，其它类主要指无法划为前五类的文物，主要出现在登记在册文物中，例如：延庆的沙梁子黑龙潭、大庄科乡白龙潭等。

表一：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分类文物情况表（单位：处）

区划	分　类						
	I	II	III	IV	V	VI	总计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	1	34	0	5	0	42
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9	6	110	6	90	1	222
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含暂保）	54	47	365	155	112	30	763
普查登记在册文物	234	187	799	874	321	108	2523
总计	299	241	1308	1035	528	139	3550

二、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文物分类在各区、县分布情况

（一）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自 1961 年 3 月 4 日国家公布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来，至 1999 年底，国家共公布了四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北京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共计 42 处，从数量上讲东城区当之无愧成为“北京国

保区”，西城区次之，两者之和占总数的57%。可以说，东、西城区的“国保”基本上居于北京皇城中心区域，如正阳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天安门、社稷坛、太庙、故宫、北海、团城、北京鼓楼、钟楼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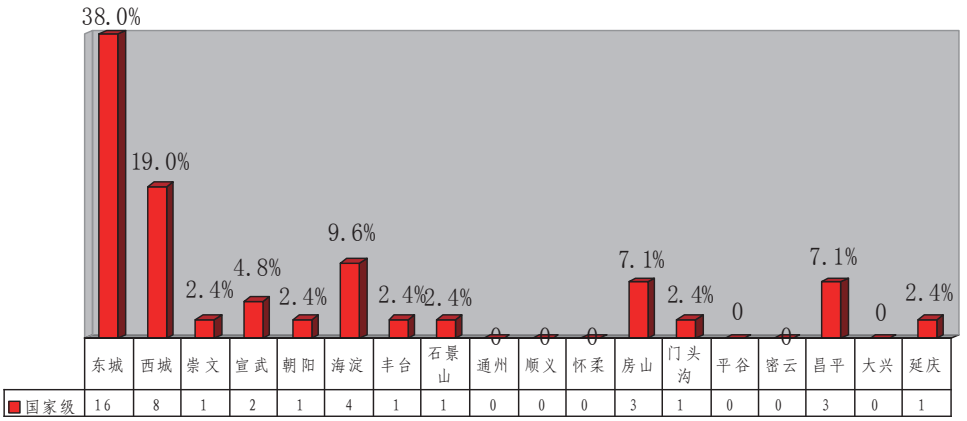
另外，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中，东、西城区各有两处近现代建筑，分别是北京大学红楼、人民英雄纪念碑和北京宋庆龄故居、郭沫若故居。

42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分别由中央单位、市属单位、区县、军队使用，其中大高玄殿为部队占用；41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对外开放（除大高玄殿外），约占总数的98%。在保护现状方面，由于国家及社会各界一直高度重视珍贵文物的保护，不断加大对国家级文物的修缮保护资金，故到目前为止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现状的良好率达100%。

另外，在注重国家级文物本体保护修缮的同时，北京文物部门也强调环境保护，到1999年底，42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部划定了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

表二：北京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分类文物所在区、县分布情况表（单位：处）

划区 / 分类	东城区	西城区	崇文区	宣武区	朝阳区	海淀区	丰台区	石景山	通州区	顺义区	怀柔县	房山区	门头沟	平谷县	密云县	昌平县	大兴县	延庆县	总计
Ⅰ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0	0	0	0	0	0	2
Ⅱ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1
Ⅲ	14	6	1	2	1	3	1	1	0	0	0	1	1	0	0	2	0	1	34
Ⅳ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Ⅴ	2	2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5
Ⅵ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总计	16	8	1	2	1	4	1	1	0	0	0	3	1	0	0	3	0	1	42



图二　北京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所在区县柱状图（%）

表三：北京市全国重点文物管理使用权统计表（单位：处）

	中央单位	市属单位	区县管理使用	军队管理使用	私人管理使用
总数	8	19	14	1	0

（二）北京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自1957年10月28日北京市公布第一批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以来，至1999年底，共公布了五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至1999年底，北京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共计222处，从数量上讲东城区成为“北京市保区”，

西城区次之，两者之和占总数的 49%。需要说明的是，西城区文物保护单位顺承郡王府已整体迁移到朝阳区，但为统一，仍将该文物保护单位计入西城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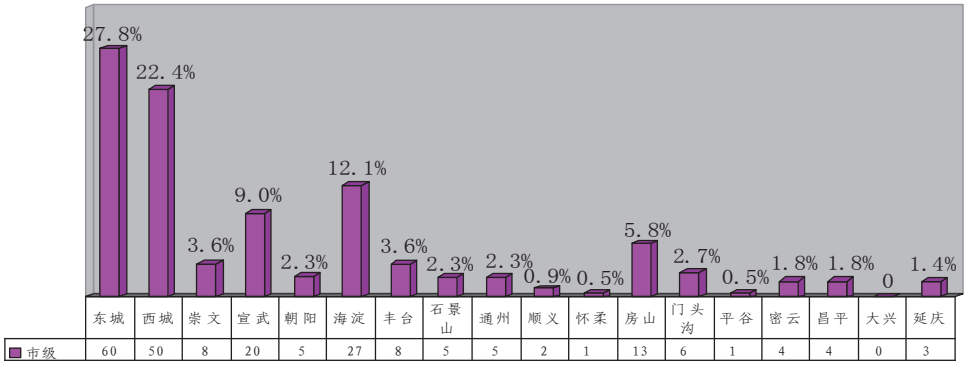
经统计，222 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中，约 30% 对外开放，如毛主席纪念堂、地坛、先农坛等，且基本上配有管理机构，保护现状的良好率达 70%，一般率为 20%，亟待修缮的为 10%。

截止到 1999 年，222 处北京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中有 166 处划定了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占总数的 75%。

值得一提的是，在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中，近现代建筑数量较多，与古代建筑并驾齐驱，占总数的 40%。例如，各个使馆区旧址建筑群、毛主席纪念堂、毛主席故居等。近现代建筑在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中占如此高的比例，在其他级别中实为罕见。究其原因，1840 年后，中国步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代，北京更多地对外开放，因此受到了西方建筑文化、技术的冲击。庚子赔款后不久，一批赴欧美的建筑留学生先后回到北京，例如杨廷宝、梁思成等人，他们在北京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建筑作品。另外，北京又一直处于近现代中国政治风云的旋涡中心，很多的历史事件和著名人物与北京的建筑有关，例如孙中山逝世纪念地、长辛店“二七革命遗址”等，故在此期间，北京产生了大批优秀的近现代建筑和名人建筑等。

表四：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分类文物所在区、县分布情况表（单位：处）

划区 / 分类	东城区	西城区	崇文区	宣武区	朝阳区	海淀区	丰台区	石景山	通州区	顺义区	怀柔县	房山区	门头沟	平谷县	密云县	昌平县	大兴县	延庆县	总计
Ⅰ	0	0	0	1	1	0	3	0	0	0	0	1	0	0	0	1	0	2	9
Ⅱ	0	1	0	0	0	2	1	0	1	0	0	1	0	0	0	0	0	0	6
Ⅲ	25	22	5	9	4	17	1	3	3	1	1	10	4	1	1	3	0	0	110
Ⅳ	0	0	2	0	0	1	0	0	0	0	0	1	1	0	1	0	0	0	6
Ⅴ	35	27	1	10	0	7	3	1	1	1	0	0	1	0	2	0	0	1	90
Ⅵ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1
总计	60	50	8	20	5	27	8	5	5	2	1	13	6	1	4	4	0	3	222



图三　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所在区县柱状图（%）

表注：1、明北京城城墙遗迹（东城、西城）归东城。

2、土城（朝阳、海淀）归朝阳。

3、万里长城北京段（密云、怀柔、平谷、延庆、昌平、门头沟）归平谷

表五：北京市全国重点文物管理使用权统计表（单位：处）

	中央单位	市属单位	区县管理使用	军队管理使用	私人管理使用
总数	57	60	93	10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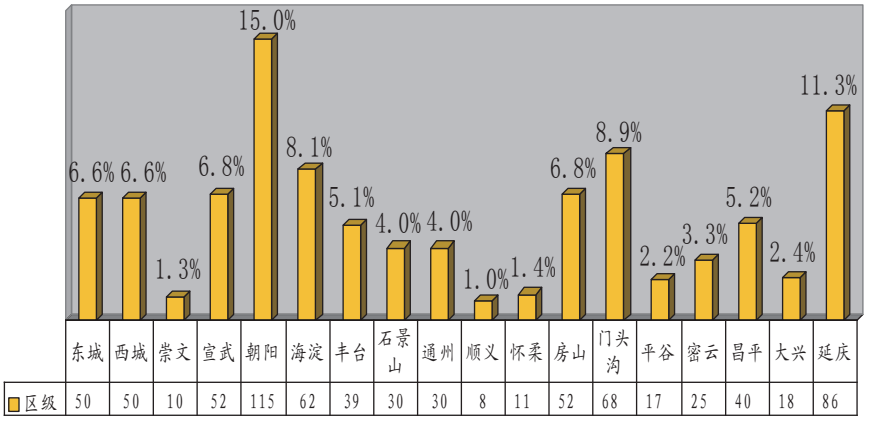
（三）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共计 763 处，其中文物暂保单位 246 处。朝阳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115 处，占总数的 15%，其中碑刻占了朝阳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总数 60%，占全市区县级总数的 10%。经统计，763 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中，城八区约有 10% 左右文保单位对外开放。如东直门外清真寺、大清邮政总局等，且基本上配有管理机构，保护现状的良好率达 56%，一般率为 26%，亟待修缮的为 18%。十个远郊区文保单位中，近 40% 属于自然开放，如古遗址、古墓葬、碑刻等，且大都没有管理机构，保护现状的良好率达 50%，一般率为 15%，亟待修缮的为 35%。

在北京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中，较有代表性的有东城区的通教寺、梁启超旧居、惠王府，西城区的陆谟克堂，朝阳区的兆惠碑，房山区的镇江营遗址、贾岛墓，门头沟的东胡林遗址等。东城区的清代通教寺，属于宗教活动场所，为北京地区最大的尼寺，硬山绿琉璃瓦屋面调大脊前带抱厦，具有较高的佛学和古建筑研究价值。西城区的陆谟克堂，建于 1934 年，系由前中法教育基金会、北平自然博物馆用庚子赔款返还款筹建的生物楼，以法国著名进化论先驱陆谟克命名，法式建筑，建筑面积 1687 平方米，是中国植物学发展的重要“实物标本”地。

表六：北京市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分类文物所在区、县分布情况表（单位：处）

划区 / 分类	东城区	西城区	崇文区	宣武区	朝阳区	海淀区	丰台区	石景山	通州区	顺义区	怀柔县	房山区	门头沟	平谷县	密云县	昌平县	大兴县	延庆县	总计
Ⅰ	0	0	0	1	0	5	0	0	0	3	0	6	6	8	4	10	3	8	54
Ⅱ	0	0	0	0	5	3	2	7	3	0	0	6	5	2	0	6	2	6	47
Ⅲ	35	42	7	33	39	38	16	19	10	1	4	24	39	6	15	5	7	25	365
Ⅳ	4	0	0	0	69	2	16	2	5	2	4	6	5	0	1	13	5	21	155
Ⅴ	11	8	3	18	2	13	4	1	8	1	1	9	13	1	3	3	0	13	112
Ⅵ	0	0	0	0	0	1	1	1	4	1	2	1	0	0	2	3	1	13	30
总计	50	50	10	52	115	62	39	30	30	8	11	52	68	17	25	40	18	86	763



图四　北京市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所在区县柱状图（%）

（四）北京市普查登记在册文物保护单位

此一部分文物属于暂未确定保护级别但需加以保护的文物，是我市重要的文物资源。没有定级并不意味没有文物价值，恰恰相反，它是区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的重要资源。另外，很多普查登记在册文物的科学、历史、艺术价值亟待文物学家、史学家、建筑学家去认识发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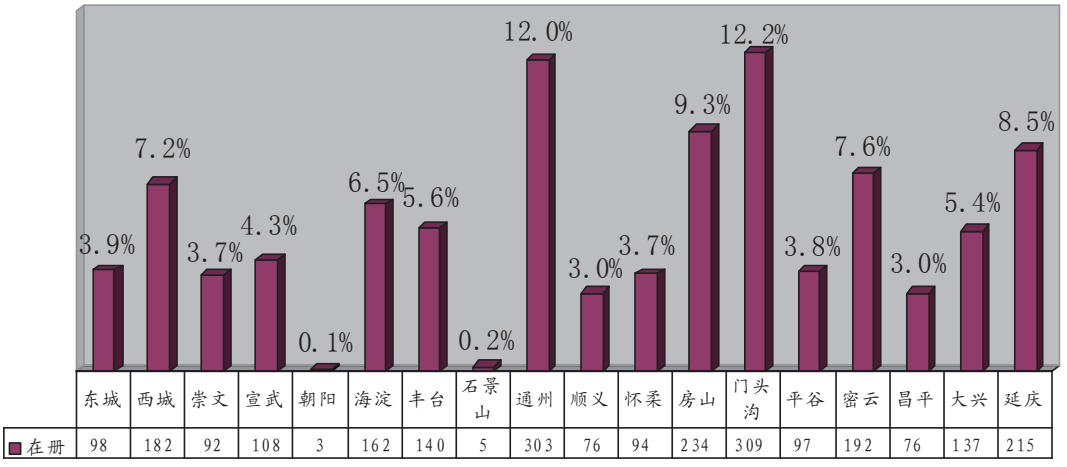
经统计，2523 处登记在册文物中，城八区基本没有对外开放的文保单位（自然开放除外），保护现状的良好率达 25%，一般率为 66%，亟待修缮的为 9%。十个远郊区文保单位中，保护现状的良好率达 20%，一般率为 15%，亟待修缮的为 65%。

登记在册文物中，较有代表性的有东城区的陈独秀旧居、路易·艾黎旧居，西城区的定亲王府，房山区塔照遗址、磁家务瓷窑遗址，海淀区的恩济庄太监墓群等。例如，路易·艾黎旧居，位于东城区台基厂大街 1 号，路易·艾黎在此完成了大量的著作和译作。再例如，西城区定亲王府，位于丰盛街道颁赏胡同 4 号，始王永璜，乾隆长子，末代主人毓朗，光绪朝任民政部侍郎、步军统领，宣统朝任军机大臣、军咨大臣，现存前排北房 5 间，东西厢房各 3 间，后排北房 7 间，现由九三学社使用。

在分类文物中，最多的为石窟寺及石刻，占总数 35%，其次是古建筑。石刻中，绝大多数是田野石刻，其保护状况及其文物防盗安全令人担忧。登记在册文物中，通州区和门头沟区数量最多，各占总数的 12%，可以说通州区、门头沟区等远郊区县拥有丰厚的文物资源，远郊区县应该抓住这一契机，大力发掘文物资源，大力发展文物旅游业事业。

表七：北京市登记在册文物保护单位分类文物所在区、县分布情况表（单位：处）

划区 / 分类	东城区	西城区	崇文区	宣武区	朝阳区	海淀区	丰台区	石景山	通州区	顺义区	怀柔县	房山区	门头沟	平谷县	密云县	昌平县	大兴县	延庆县	总计
Ⅰ	0	0	0	0	0	3	0	0	12	0	5	27	19	43	92	0	6	27	234
Ⅱ	0	0	0	0	0	4	0	1	12	4	14	14	22	43	36	4	16	17	187
Ⅲ	40	147	90	6	0	90	25	2	28	8	5	80	109	1	9	55	10	94	799
Ⅳ	6	1	0	0	0	46	114	2	190	56	45	84	128	6	27	14	94	61	874
Ⅴ	49	34	2	102	3	19	1	0	19	8	3	19	22	0	28	3	0	9	321
Ⅵ	3	0	0	0	0	0	0	0	42	0	22	10	9	4	0	0	11	7	108
总计	98	182	92	108	3	162	140	5	303	76	94	234	309	97	192	76	137	215	2523



图五 北京市普查登记在册文物保护单位所在区县柱状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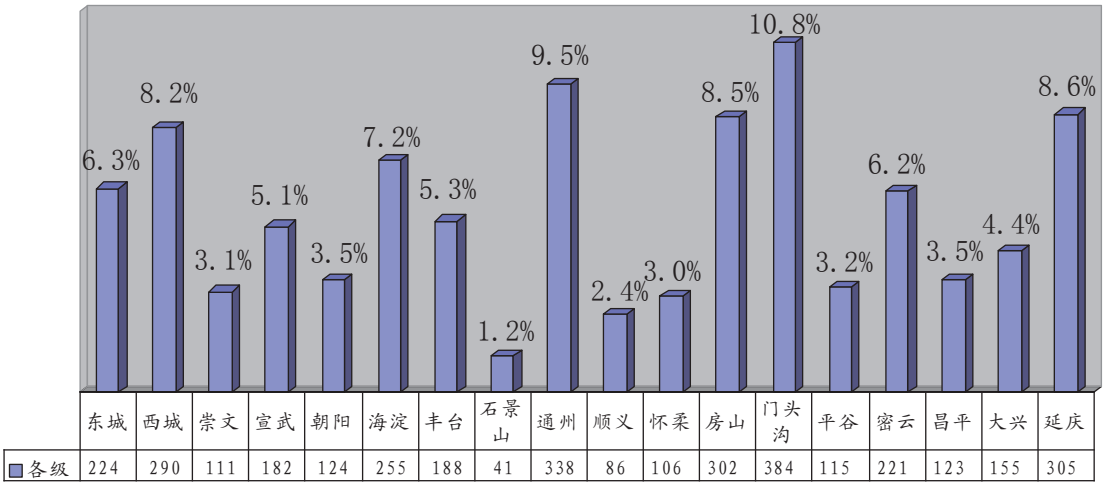
（五）北京市各级文物保护单位

综上所述，将国家级、市级、区级、登记在册文物综合相加，可以看到，北京市文物大户是门头沟区，文物数量为 384 处，占总数的 11%。其中国家级 1 处（戒台寺），市级 6 处，区级 68 处，登记在册 309 处。

北京不可移动文物的总体布局，是以旧城区为核心，围绕故宫紫禁城，集中了众多的国家级、市级文物古迹，以旧城区 25 片文化保护区为骨架，依次向近郊、远郊延伸，城区以古建为多，而远郊则以古遗址、古墓葬、田野石刻为多，形成了点、线、面的文物整体格局。

表八：北京市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分类文物所在区、县分布情况表（单位：处）

划区 / 分类	东城区	西城区	崇文区	宣武区	朝阳区	海淀区	丰台区	石景山	通州区	顺义区	怀柔县	房山区	门头沟	平谷县	密云县	昌平县	大兴县	延庆县	总计
Ⅰ	0	0	0	2	1	8	3	0	12	3	5	36	25	51	96	11	9	37	299
Ⅱ	0	1	0	0	5	9	3	8	16	4	14	21	27	45	36	11	18	23	241
Ⅲ	114	217	103	50	44	148	43	25	41	10	10	115	153	8	25	65	17	120	1308
Ⅳ	10	1	2	0	69	49	130	4	195	58	49	91	134	6	29	27	99	82	1035
Ⅴ	97	71	6	130	5	40	8	2	28	10	4	28	36	1	33	6	0	23	528
Ⅵ	3	0	0	0	0	1	1	2	46	1	24	11	9	4	2	3	12	20	139
总计	224	290	111	182	124	255	188	41	338	86	106	302	384	115	221	123	155	305	3550



图六 北京市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所在区县柱状图（%）

三、普查文物的分类及区、县分布情况

在全面了解了北京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各分类文物数目及在各区县的分布情况后，有必要再将每一分类文物细化后进行研究，比如石窟寺及石刻（即第Ⅳ类），再细化为石窟寺、石刻，即石窟寺数量、石刻的数量以及年代在区、县的分布情况。另外，需说明的是，同一分类中，国家级、市级、区级、登记在册文物数量均合并于一起进行统计。

（一）古遗址（Ⅰ类）

北京众多的不可移动文物中，最有价值的当属古遗址类。北京各类古遗址共计 299 处，其中国家级两处，分别为房山区的周口店遗址和琉璃河遗址，前者属于洞穴遗址，反映了北京人类活动史并把北京人类活动的历史向前推进到约 50 万年前；

后者属于古城遗址，反映北京的建城史并将北京的建城史提早到距今约 3000 年以前。另外，市级有 9 处古遗址，其中 6 处属于古城遗址，如元土城、金中都城遗迹、金中都水关遗址，为北京的都城历史发展及城市历史发展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区级及登记在册的古遗址 288 处，其中较重要的有门头沟区新石器时代的东胡林人遗址、平谷县新石器时代的上宅遗址、房山区商代的镇江营遗址、昌平区的战国军都城址等。登记在册的古遗址，较重要的有房山旧石器时代磁家务古遗址、房山新石器时代的坟庄遗址、丁家洼遗址、密云县新石器时代彭家峪遗址等。

北京地区拥有大量历史久远的地下文物宝藏，文物价值很大。经统计，区级及登记在册古遗址年代在汉以前（不含汉）的就达 44 处；但另一方面，有些古遗址定级相对较低且大多保护状况较差，区级及登记在册文物保护单位很多均处于自然开放状态，且无任何管理机构，对遗址安全极为不利。例如门头沟区东胡林人遗址，该遗址是继房山周口店遗址之后又一重大考古发现，是北京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且处于旧、新石器交替时期，填补了新石器早期古人类活动的空白，并为华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科学依据，为寻找更早的古人类及文化遗存提供了重要依据，在我国考古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和地位，目前仅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再例如，房山磁家务古遗址，发现于 1979 年，是距今约 10—20 万年前古人类活动地点，占地约 1500 平方米，是北京地区难得的旧石器遗址之一，对研究人类发展史有重要价值，目前仅为登记在册文物保护单位。

另外，由于古遗址基本分布于远郊地区的田野荒郊，保护状况及文物安全相对较差，特别是区级及登记在册文物保护单位。例如某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商周遗址，占地 30 公顷，曾出土大量陶器碎片、打磨的石器，并发现数处陶窑址，具有重要的考古价值。目前处于自然开放状态，由于一直没有管理机构，故疏于管理，附近村民经常到遗址区取土，遗址面临被破坏的危险。

综上所述，市级以上古遗址保护状况较好，而区级及登记在册古遗址保护亟待加强，其文物级别也应根据情况相应予以提高。

表九：各级古墓葬年代及数量表（单位：处）

	旧石器	新石器	夏	商	周	春秋	战国	汉	唐	辽	金	元	明	清	总计
国家级	1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2
市级	0	0	0	0	0	1	1	0	1	0	4	2	0	0	9
区级	0	3	0	4	1	0	4	8	3	3	2	3	13	10	54
登记在册	4	5	1	12	4	0	6	38	11	18	5	3	57	70	234
总计	5	8	1	16	6	1	11	46	15	21	11	8	70	80	299

表十 ：各级古遗址在区、县分布情况表（单位：处）

区划 / 古遗址	东城区	西城区	崇文区	宣武区	朝阳区	海淀区	丰台区	石景山	通州区	顺义区	怀柔县	房山区	门头沟	平谷县	密云县	昌平县	大兴县	延庆县	总计
洞穴村落	0	0	0	0	0	0	0	0	0	0	3	6	3	36	21	0	1	9	79
古城	0	0	0	1	1	1	3	0	2	3	1	13	0	6	28	8	1	14	82
长城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1	0	0	1	0	4
古道	0	0	0	0	0	0	0	0	3	0	0	1	0	0	0	1	1	0	6
古窑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10	1	5	0	1	2	20
其它	0	0	0	1	0	7	0	0	7	0	0	16	10	7	42	2	4	12	108
总计	0	0	0	2	1	8	3	0	12	3	5	36	25	51	96	11	9	37	299

（二）古墓葬（Ⅱ类）

北京是人类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同时也是金、元、明、清的古都，北京的墓葬为华北地区人类进化演变以及北京地区帝王陵寝的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实物证据。北京地区古墓葬总计为 241 处，其中国家级 1 处，市级 6 处，区级 47 处，登记在册 187 处。

国家级 1 处——昌平明十三陵，是中国乃至世界现存规模最大、帝后陵寝最多的一处皇陵建筑群。市级中，如丰台区大葆台西汉墓，是研究西汉诸侯王陵制度的宝贵资料，对研究北京地区的汉代历史具有重要意义；另外还有房山区的金陵、西城区的利玛窦墓及明清以来外国传教士墓地等。区级及登记在册文物中，如海淀区礼王坟、瑞王坟、房山贾岛墓以及门头沟登记在册军庄战国墓等。

总体而言，古墓葬中市级以上的古墓葬定级准确，保护状况良好，且均有管理机构。但区级及登记在册文物，则个别有价值的墓葬定级相对较低，且有些墓葬因为无管理机构而保护状况较差。

从北京市第三次文物普查分析，汉及汉以前的古墓葬为 73 处，占古墓葬总数的 30%，这么多历史悠久的墓葬可以说是无价之宝。但目前仅有 9 处为区级或区级以上，国家级无，其余 64 处均为登记在册文物。其中，商代及以前的古墓葬 2 处，为登记在册文物；春秋时代的 1 处，为区级；战国时代的 10 处，2 处为区级，8 处为登记在册文物；汉墓共计 60 处，其中市级的 1 处，区级的 5 处，登记在册 54 处。例如，房山区战国望诸君墓，墓主为战国时期燕国乐毅，封望诸君，占地 0.24 公顷，保存完好，目前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再例如，山戎墓葬群，年代为春秋，占地 0.9 公顷，墓葬多为土坑竖穴，以单人墓室为主，多佩带项链、耳环，由于山戎族于战国末消亡，故山戎墓葬群对于研究游牧民族山戎族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目前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注，此并非北京市第五批公布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玉皇庙山戎墓遗址）。

汉以后，北京地区区级及区级以下的古墓葬同样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例如，门头沟区金代壁画墓，是在北京壁画墓方面极为重要的发现，为仿木结构砖雕墓门，砖结构穹窿顶，室内砖雕四根柱，砖斗拱及影作，壁画为主人生活场景，对了解金代建筑结构及家具形式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目前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另外，北京古墓葬主要分布于远郊区县田野荒郊，十个远郊区县共计 215 处，占古墓葬总数的 89%，这些墓葬大都没有管理机构，属于自然开放，故保护状况不好。例如，某东汉墓葬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属于自然开放，目前，墓道口裸露，部分坍塌，附近居民经常取土，急需保护。

表十一：各级古墓葬年代及数量表（单位：处）

	新石器	商	春秋	战国	汉	魏晋	唐	辽	金	元	明	清	待考证	总计
国家级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1
市级	0	0	0	0	1	0	0	0	1	0	1	3	0	6
区级	0	0	1	2	5	0	2	0	1	0	7	29	0	47
登记在册	1	1	0	8	54	2	9	10	11	6	24	42	19	187
总计	1	1	1	10	60	2	11	10	13	6	33	74	19	241

表十二：各级古墓葬在区、县分布情况表（单位：处）

区划	东城区	西城区	崇文区	宣武区	朝阳区	海淀区	丰台区	石景山	通州区	顺义区	怀柔县	房山区	门头沟	平谷县	密云县	昌平县	大兴县	延庆县	总计
古遗址	0	1	0	0	5	9	3	8	16	4	14	21	27	45	36	11	18	23	241

（三）古建筑（III类）

北京作为辽金、元、明、清的帝都，拥有大量的国保级皇家古建筑，以紫禁城为核心的故宫，围绕其周围的太庙、社稷坛，以及散布于旧城的各类府衙、寺庙，堪称世界瑰宝。经普查统计，北京现存各级古建筑共计1308处，是北京第三次普查中文物类别数量最多的一类，占全市不可移动文物总数的37%。在北京古建筑中，国家级34处，市级110处，区级365处，登记在册文物799处。北京古建筑又以木结构建筑数量为最多，为1183处，占古建筑总数的90%。

经统计，北京古建筑年代最早的当属隋代的房山云居寺塔及石经（国家级），其次是唐代的房山张坊的七级密檐塔（区级）以及宣武区辽代天宁寺塔（国家级）等。

另外，北京古建筑的定级准确，很多有价值的古建筑均被定为市级或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市级以上文物古建筑保护单位共计144处（尤以明清皇家建筑为最多），占古建筑总数的11%。北京的木结构建筑中，东城区、西城区、崇文区、宣武区四区共计469处，又占木建筑总数的40%，基本上北京所有皇家建筑都已列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

从1984年开始，市规划局与市文物局共同划定了五批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共计208处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的本体保护和景观保护从法律上得到了根本保障。特别要指出的是，1990年北京市政府公布了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1999年划定了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控制范围（包括重点保护区和建设控制区），从而形成了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线（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面（旧城保护）的文物保护框架。

另外，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北京城面临着大规模城市改造（尤其是危旧房改造），很多有价值的古建筑面临被拆毁的危险，市委、市政府以及各级文物部门及时加大保护力度，从而使大批古建筑得以保护。例如，从1991年开始，市文物局为了贯彻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强在危改区中文物保护工作的指示精神，共计完成了六批“危改中文物建筑保护名单”工作（到1999年底），“危改中文物建筑保护名单”共计227项，其中宣武、崇文共计62项，内容涉及到19个危改片和12项市政道路。这项工作的实施，对北京市的文物保护工作产生了积极影响，并成为保护故都风貌的一项重要基础工作。在城市建设过程中，随着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保护和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北京文物部门和规划部门妥善处理两者的矛盾，创造了很多成功经验。

表十三：各级古建筑年代及数量表（ 单位：处）

	隋	唐	辽	金	元	明	清	总计
国家级	1	0	2	2	3	19	7	34
市级	0	0	7	2	12	45	44	110
区级	0	1	5	4	8	84	263	365
登记在册	0	0	5	2	2	88	702	799
总计	1	1	19	10	25	236	1016	1308

表十四：各级古建筑在区、县分布情况表（单位：处）

区划 / 古遗址	东城区	西城区	崇文区	宣武区	朝阳区	海淀区	丰台区	石景山	通州区	顺义区	怀柔县	房山区	门头沟	平谷县	密云县	昌平县	大兴县	延庆县	总计
木结构	109	208	103	49	42	136	37	21	34	10	9	93	129	4	16	58	15	110	1183
古塔	0	0	0	1	1	5	2	3	1	0	1	18	6	1	0	4	1	0	44
古桥	0	4	0	0	0	4	4	1	6	0	0	4	4	1	0	1	1	2	32
古城	5	3	0	0	0	0	0	0	0	0	0	0	3	0	0	1	0	0	12
园林	0	0	0	0	0	3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
长城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9	0	0	8	19
其它	0	2	0	0	1	0	0	0	0	0	0	0	11	0	0	1	0	0	15
总计	114	217	103	50	44	148	43	25	41	10	10	115	153	8	25	65	17	120	1308

（四）石窟寺及石刻（Ⅳ类）

1、石窟寺

北京的石窟寺较少，主要分布在近、远郊，总数为 24 处，占普查总数的 2.3%，较有价值的有怀柔的天华洞（区级）、延庆的烧窑峪摩崖造像等（区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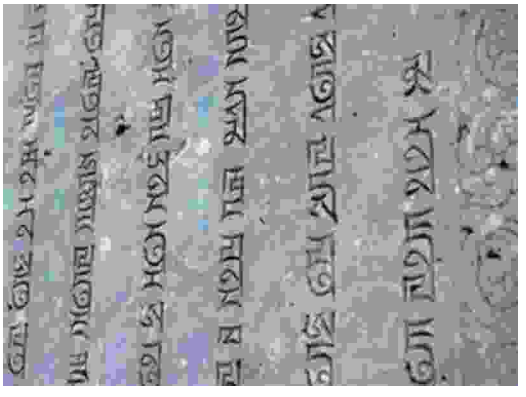
延庆的烧窑峪摩崖造像位于断崖之上，距地表 100 米，开凿于明代，可以说是北京石窟寺中的精品。分东殿、中殿、西殿，东殿（俗称三官殿），洞形方正，殿内石台上摆放三尊石像；中殿（俗称真武殿），有浮雕石像 11 尊；西殿（俗称娘娘殿），有浮雕石像 10 尊。

2、石刻（1840 年以前）

北京石刻共计 1011 处，在数量上仅次于北京的古建筑，但其特点是级别较低，国家级数量为 0 处，市级的仅 6 处，绝大多数石刻属于区级以及登记在册文物保护单位，占石刻总数的 99%，其中大多数属于田野石刻。另外，分布地点主要位于远、近郊，通州区最多为 195 处，其余依次为门头沟、丰台、大兴、房山等区。

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有 6 处石刻，分别为崇文区的正阳桥疏渠记方碑、燕墩，海淀区的魏太和造像，房山区的白水寺石佛，门头沟的宛平县人民抗日战争为国牺牲烈士纪念碑，密云的番字石刻。区级及登记在册文物保护单位主要有兆惠碑（区级）、蓟门烟树碑（区级）、平谷大兴隆禅寺碑（登记在册）、海淀康熙诰命碑（登记在册）等。

石刻中最有价值之一的要数平谷区登记在册文物大兴隆禅寺碑（2002 年公布为区级文保单位）。大兴隆寺建于元代，位于王辛庄乡太后村，寺毁于日军战火，目前仅存两方元代石碑，其中一方碑阴正文为八思巴文 13 行，字口清晰，字迹完好，为北京地区唯一的八思巴文石碑，目前属于自然开放状态。此外，该碑的另一特点，在圣旨文字末行下角刻有汉文刻石人的署名，这是八思巴字蒙古语碑中首次所见。对于这样一处有研究价值的石碑，应尽快提为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并建立相应管理机构。



图七　平谷大兴隆禅寺八思巴文碑

另外，崇文区的燕墩、密云的番字石刻目前仅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燕墩碑身镌刻乾隆皇帝《皇都篇》、《帝都篇》，是中国最早的关于城市规划文章。番字石

刻，是在山石刻下大小不等的若干组番字，其内容为佛教“六字真言”，是研究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物证。再例如密云的十面碑，又称燕山勒功碑，造型别具特色，是研究明代边防问题和戚继光的重要实物，目前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同时，第三次文物普查统计方式的改变，也对石刻定级方面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前两次的文物普查是“庙”与“碑”分离统计，“庙”是“庙”，“碑”是“碑”，而第三次文物普查是将“碑”作为“庙”的附属文物，故很多“碑”不再作为一处文物保护单位了。例如上方山诸寺及云水洞，第二次文物普查中有碑刻 57 项，目前均作为上方山诸寺的附属文物，碑刻本身不再作为文物保护单位了。

客观而言，石刻的年代往往早于现存古建筑的年代，往往与古建筑的创始年代相同，研究价值绝不逊于古建筑，例如法源寺内的唐至德二年（757 年）“无垢净光宝塔颂”碑等，仅是由于新的统计方式使很多有价值的石刻归于古建筑“名下”。故在文物普查时，一方面应该加大附属文物的调查登记，尤其是要加大古建筑内附属文物石刻、石经的调研力度，并作为重要附属文物一同予以公布；另一方面，对于有价值的单体石刻尽可能公布为较高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尽快改变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零石刻”的现象。

另外，石刻本体防风化保护问题一直是世界级的难题，石刻风化问题，涉及到文物、物理、化学、生物等多学科，仅靠文物部门是难以解决的，如何彻底解决这一难题，只能有待于相关专家利用高科技的手段，借鉴国外（尤其是德国）先进经验，提出更好的保护方法。

表十五：各级石窟寺及石刻年代及数量表（单位：处）

	汉	北魏	西晋	隋	唐	辽	金	元	明	清	民国	总计
国家级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市级	0	1	0	0	0	0	0	2	0	2	1	6
区级	0	0	0	2	2	3	2	8	29	106	3	155
登记在册	1	0	1	0	12	25	21	25	248	489	52	874
总计	1	1	1	2	14	28	23	35	277	597	56	1035

表十六：各级石窟寺及石刻在区、县分布情况表（单位：处）

区划	东城区	西城区	崇文区	宣武区	朝阳区	海淀区	丰台区	石景山	通州区	顺义区	怀柔县	房山区	门头沟	平谷县	密云县	昌平县	大兴县	延庆县	总计
石窟寺	0	0	0	0	0	0	0	1	0	0	1	6	1	1	5	1	0	8	24
石刻	10	1	2	0	69	49	130	3	195	58	48	85	133	5	24	26	99	74	1011
总计	10	1	2	0	69	49	130	4	195	58	49	91	134	6	29	27	99	82	1035

（五）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Ⅴ类）

1、近现代建筑

北京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共计 528 处，其中近现代建筑 378 处，占Ⅴ类总数的 72%。国家级 3 处，分别是北京大学红楼、北京宋庆龄故居、郭沫若故居；市级 82 处，如原中法大学、京师大学堂建筑遗存等；区级 64 处，如田汉故居、梁启超旧居等；普查登记在册文物 229 处；如北京火车站、原法国洋行等。

2、现代建筑

在北京市第三次文物普查中，近现代建筑的时间划分是，1840 年到 1949 年期

间的建筑为近代建筑，而1949年以后的建筑则为现代建筑。根据普查资料统计，378处近现代建筑中，现代建筑共计13处，分别为：

（1）国家级2处：北京宋庆龄故居（西城区）、郭沫若故居（西城区）；

（2）市级1处：毛主席纪念堂（东城区）；

（3）登记在册10处：北京火车站（东城区）、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东城区）、中国美术馆（东城区）、首都剧场（东城区）、北京农业展览馆（朝阳区）、北京工人体育场（朝阳区）、北京工人体育馆（朝阳区）、中国军事博物馆（海淀区）、南苑昭忠祠（丰台区）、芦正卷机井（顺义区）。

表十七：各级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在区、县分布情况表（单位：处）

区划 / 分类	东城区	西城区	崇文区	宣武区	朝阳区	海淀区	丰台区	石景山	通州区	顺义区	怀柔县	房山区	门头沟	平谷县	密云县	昌平县	大兴县	延庆县	总计
1	0	2	1	0	2	2	4	0	16	9	4	23	12	1	5	4	0	12	97
2	27	32	2	28	0	30	4	2	4	0	0	0	23	0	28	2	0	7	189
3	66	37	3	102	0	8	0	0	8	1	0	5	1	0	0	0	0	4	235
4	4	0	0	0	3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7
总计	97	71	6	130	5	40	8	2	28	10	4	28	36	1	33	6	0	23	528

1为革命史迹或代表性建筑；2为与重要历史人物或重大历史事件有关的遗迹、遗址、建筑、住宅、墓葬、石刻等；3为中西合璧或外国建筑风格，包括店铺、银行、医院、学校、宗教建筑等；4为反映历史时代特征或带有城市标志性的建筑。

（六）其它（Ⅵ类）

北京其它类文物共计139处，市级1处——冰川擦痕（石景山区）；区级30处，如延庆木化石群等；登记在册108处，如东城区的门楼砖雕等。

在Ⅵ类中，需要特别介绍的是北京现存最久远的不可移动文物——延庆的木化石群。延庆木化石群的年代是侏罗纪时代，距今约1亿9960万年前到1亿4550万年前，经专家鉴定，这一带的硅胶木化石属侏罗纪晚期，以松柏类化石为主，直径最大者达3米，暴露地表最长的树干可达6米。这一木化石群的发现对于研究该地区的古地质地理及石油、矿产的分布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表十八：各级其它文物保护单位在区、县分布情况表（单位：处）

区划 / 其它类	东城区	西城区	崇文区	宣武区	朝阳区	海淀区	丰台区	石景山	通州区	顺义区	怀柔县	房山区	门头沟	平谷县	密云县	昌平县	大兴县	延庆县	总计
1	0	0	0	0	0	0	0	2	0	0	5	0	0	0	0	0	0	1	8
2	0	0	0	0	0	0	0	0	0	0	5	0	0	4	0	0	0	2	11
3	0	0	0	0	0	0	0	0	0	0	12	0	0	0	0	0	0	1	13
4	3	0	0	0	0	1	1	0	46	1	2	11	9	0	2	3	12	16	107
总计	3	0	0	0	0	1	1	2	46	1	24	11	9	4	2	3	12	20	139

1为第四纪或第四纪ｘｘ世古生物、古动物化石地点；2为旧石器出土文物地点；3为新石器出土文物地点；4为再遇其它可予说明。

（七）北京遗址、墓葬、建筑、石窟寺、石刻分布情况

到目前为止，北京的遗址、墓葬、建筑、石窟寺及石刻的总数目是多少呢？以

北京的文物建筑为例，已经知道北京的古建筑数是 1308 处，是否就是文物建筑的总数呢？当然不是，文物建筑的总数还应包括近现代建筑数目，但这仍是未知数。原因就在于Ⅴ类、Ⅵ类的分类方法上，比如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Ⅴ类）划分上，就没有将遗址、墓葬、建筑、石刻等区分开来，而是按历史事件或建筑风格性质划分，统一为一类。也就是说，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Ⅴ类）以及其它（Ⅵ类）中，有一部分文物又涉及到近现代的遗址、墓葬、建筑、石刻等，需要重新按遗址、墓葬等项划分，区别开来。最后，将古代与近现代不可移动文物数目相加，从而可以进一步了解北京每一类文物的总数以及在区县的分布情况，以便更好地掌握北京全市的文物资源状况。

另外，其它（Ⅵ类）中，第四纪或第四纪ｘｘ世古生物、古动物化石地点、旧石器出土文物地点、新石器出土文物地点三项均并入古遗址类统计。

表十九：Ⅴ类中遗址、墓葬、建筑、石刻不可移动文物在区、县分布情况表（单位：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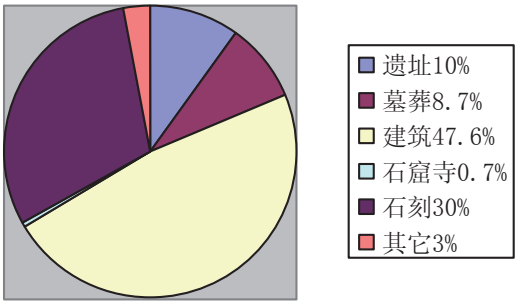
划区 / 类别	东城区	西城区	崇文区	宣武区	朝阳区	海淀区	丰台区	石景山	通州区	顺义区	怀柔县	房山区	门头沟	平谷县	密云县	昌平县	大兴县	延庆县	总计
近现代遗址	0	0	0	0	0	2	2	0	2	1	0	1	2	1	3	0	0	2	16
近现代墓葬	0	2	0	0	2	24	3	2	6	6	1	11	1	0	4	4	0	2	68
近现代建筑	96	68	5	130	5	11	3	0	14	0	0	8	31	0	3	0	0	4	378
石刻	5	1	1	0	0	4	0	0	6	1	0	3	2	0	19	2	0	11	55

表二十：Ⅵ类不可移动中古遗址总数及在区、县分布情况表（单位：处）

划区 / 类别	东城区	西城区	崇文区	宣武区	朝阳区	海淀区	丰台区	石景山	通州区	顺义区	怀柔县	房山区	门头沟	平谷县	密云县	昌平县	大兴县	延庆县	总计
古遗址	0	0	0	0	0	0	0	2	0	9	22	0	0	4	0	0	0	4	41

表二十一：北京市遗址、墓葬、建筑、石窟寺、石刻总数及分布情况表（单位：处）

划区 / 类别	东城区	西城区	崇文区	宣武区	朝阳区	海淀区	丰台区	石景山	通州区	顺义区	怀柔县	房山区	门头沟	平谷县	密云县	昌平县	大兴县	延庆县	总计
遗址	0	0	0	2	1	10	5	2	14	13	27	37	27	56	99	11	9	43	356
墓葬	0	3	0	0	7	33	6	10	22	10	15	32	28	45	40	15	18	25	309
建筑	210	285	108	180	49	159	46	25	55	10	10	123	184	8	28	65	17	124	1686
石窟寺	0	0	0	0	0	0	0	1	0	0	1	6	1	1	5	1	0	8	24
石刻	15	2	3	0	69	53	130	3	201	59	48	88	135	5	43	28	99	85	1066



图八 文物分类构成图（%）

由表二十一分析，北京遗址、墓葬、建筑、石刻类共计 3441 处，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建筑（1686 处），其次是石刻（1066 处），另有 109 处文物保护单位不好分类（例如，铁钟、铁炮、香炉等）。

（作者为首都博物馆保管部业务人员）



北京李大钊故居文物保护展陈追述

——谨以此文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

吉晓平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之际，我们无比怀念以李大钊同志为代表的革命先烈，那段参加李大钊故居文物保护工程的日子，又清晰地浮现在脑海，萦绕在心田。

西长安街南侧一条长度不足 500 米的东西向胡同中有一座小院，这就是李大钊在北京的故居。2007 年 4 月 28 日，在李大钊同志英勇就义 80 周年的纪念日，故居对社会开放。几年来，这里吸引了一批批前来参观、凭吊的共产党员、青少年学生和普通群众，他们向李大钊铜像敬献花篮，追忆李大钊短暂而光辉的一生和对中国革命的重要贡献，感受他真实而亲切的生活情境、人格风范，表达深深的敬意和缅怀……

从 2005 年 3 月至 2007 年春，北京市西城区投入并筹措 2000 余万元，实施李大钊故居文物保护工程，包括搬迁居民、修缮文物建筑、收集研究资料、举办复原陈列和“李大钊在 1920—1924”专题展览等内容。我作为这项工作的组织者和亲历者，有责任把这段工作记述下来，既是为了纪念，也希望对北京名人故居保护工作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北京李大钊故居的历史价值

李大钊（1889 — 1927），字守常，河北乐亭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率先在中国大地上高举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为中国昭示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作为中国共产党早

期的卓越领导人，他在中国革命的许多条战线上进行过英勇的斗争，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在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事业中，占有崇高的历史地位”[①]。

1. 这里是他在故乡之外与家人共同生活时间最长的地方

李大钊于 1916 年 5 月从日本回国后，开始在北京生活。1920 年春，李大钊租下石驸马后宅 35 号（今西城区文华胡同 24 号北院）一个小三合院，同年暑假，他把妻子、儿女从河北乐亭县大黑坨村接到北京，一家人在此一起居住了 4 年，直到 1924 年 1 月搬家。院子占地面积约 550 平方米，有北房正屋 3 间，东、西耳房各 2 间，东、西厢房各 3 间。其中，北房东屋是李大钊夫妇的卧室，堂屋和西屋为通间，用作接待客人和全家的饭厅，西厢房为李大钊的书房，东厢房北间为长子李葆华[②]的卧室，南间是供来往亲友等人暂住的客房，西耳房为长女李星华[③]的卧室，东耳房为次女李炎华[④]、次子李光华[⑤]、幼女钟华[⑥]和表姑薛范氏居住。

2. 这里是他与妻子、儿女在一起生活最快乐、最开心的地方

李大钊从早年求学离开家乡，一直是和家人离多聚少，因此对能和家人团聚倍感珍惜。全家人十分喜欢这个小院，李大钊亲自在院子里栽种了两棵海棠树，又在正房前面各开一块花畦。工作之余，他总是尽量挤出时间与孩子们相处，常常带着孩子朗读诗歌、唱歌、做游戏。李大钊的次子光华、幼女小钟华出生在这里，他的长子葆华、长女星华都是在这里耳濡目染，走上了革命道路。

3. 这段时间是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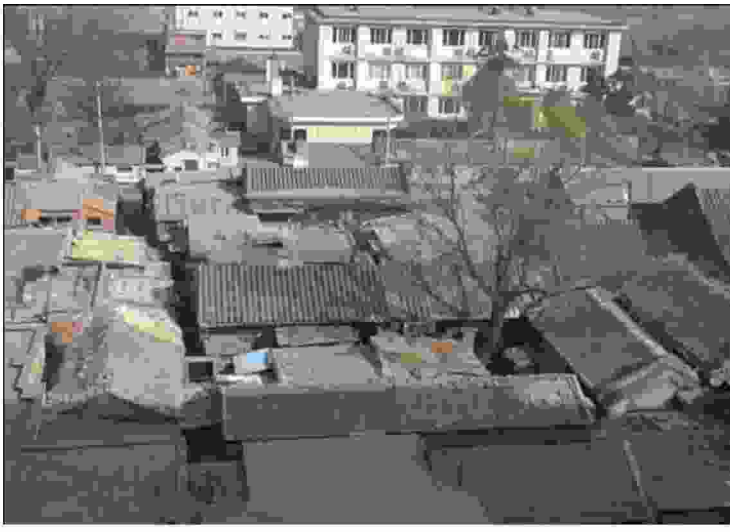
1918 年 1 月，李大钊接受蔡元培校长邀请，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两年后又受聘为教授。“1920 年 3 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秋，他又领导建立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积极推动建立全国范围的共产党组织。1921 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李大钊同志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同志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地区党的工作，在北方广大地区领导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建立党的组织，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军阀斗争，猛烈冲击了帝国主义势力和北洋军阀统治。1922 年 8 月到 1924 年初，他受党的委托，几次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同孙中山先生商谈国共合作，为建立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做出了重大贡献”[⑦]。

4. 这段时间也是他革命生涯异常忙碌、学术成果最丰厚的时期

他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开设了《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史学要论》等多门新课程。他担任图书馆主任期间，北京大学图书馆成为当时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一个重要阵地，他兼收并蓄引进图书，倡导面向读者的服务理念，革新中国图书馆事业，被誉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之父”[⑧]。教学之外，他在校内兼任评议会评议员、总务委员会委员等 16 项职务，在校外还担任《少年中国》编辑部主任、《新青年》编辑部编辑等 12 项职务。这段日子，李大钊参加的各种会议不少于 120 次，还不包括他参加的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及中国国民党“一大”等重要会议。根据 2006 年出版的《李大钊全集》统计，在后宅 35 号居住期间，李大钊撰写各种文章 152 篇，33 万多字，平均不到 9 天就要完成 1 篇。他写的文章涉及历史学、法学、政治学、教育学、伦理学和民族问题、妇女问题以及图书馆建设等诸多方面，为中国现代文化许多领域都做出了开创性建树。

北京是李大钊的第二故乡，自 1916 年夏从日本回国，至 1927 年春英勇就义，他在北京工作、生活了十年。李大钊曾先

后在西单皮库胡同、朝阳门内南小街竹竿巷、闹市口回回营 2 号、石驸马大街后宅胡同 35 号（西城区文华胡同 24 号）、宣武门内铜幌子胡同甲 3 号、邱祖胡同、府右街朝阳里 3 号等八个地方居住过，而选定文华胡同 24 号作为其在北京的故居具有特别意义。因为在此居住期间，不仅是李大钊个人思想和实践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期。北京李大钊故居是他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领导北方工人运动、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等一系列革命实践活动最具代表性的历史见证，具有丰富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文物价值。1979 年 8 月 21 日，北京李大钊故居被公布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腾退、修缮前故居全景

二、李大钊故居的抢救与保护

文华胡同 24 号原来分为南、北两个院落（李大钊故居位于北院），1967 年前为私产房屋，曾几易其主。1967 年以后，变更为公有房产，有房屋 32 间，建筑面积 545 平方米，14 户居民承租。李大钊故居多年来作为民居使用，文物建筑损坏严重，文物保护难、群众居住难的“两难”问题一直非常突出。2004 年，西城区委第九次党代会提出“经济强区、文化兴区、环境优区”的发展战略，在历史文化保护方面实施文物的“解危、解放、解读”工程，把抢救、保护李大钊故居作为一项紧迫工作提上日程。



北房正屋前临建

1. 搬迁居民，腾退文物建筑

2005 年 3 月，西城区委、区政府领导在听取区文化委员会关于抢救、保护李大钊故居的专题汇报后，果断决策：投入并筹措专项资金，搬迁居住在文华胡同 24 号院内的居民，腾退文物建筑，进行抢险修缮，举办复原陈列和专题展览，要求于 2007 年 4 月 28 日李大钊同志英勇就义 80 周年之际向公众开放，面向全社会特别是广大党员、青少年以及人民群

众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同时设置专门机构，负责故居的保护和管理工作。

这一举措得到北京市文物局和首都开发集团的大力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2005 年 7 月，北京市文物局制发《关于公告施行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李大钊故居保护措施的函》（京文物［2005］805 号），为研究制定文物腾退政策提供了法律依据。2006 年 1 月，首都开发集团捐款 600 万元作为启动资金，保证了按照预定计划于 2006 年 2 月实施搬迁居民工作。

在搬迁居民的过程中，区文化委员会、区房屋土地管理中心、区法制办及故居所在街道办事处等单位密切配合，组成信息宣传、政策法制等工作组，制定严密的工作程序，开展深入细致的工作。一是资料准备，采取多种形式收集整理大量基础资料，对住户的人口结构、居住面积等基础情况进行调查核实。二是政策研究，依据文物保护法规和城市房屋拆迁补偿标准，研究制定文物腾退补偿政策。三是宣传发动，印发“致文华胡同 24 号居民的一封信”，宣传文物保护是全民的事业，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召开居民座谈会，加强政策宣传，公开相关政策，入户征求意见，了解居民意愿，做好居民群众的思想稳定工作，防止发生各类问题。四是热情服务，做到既充分体现“以人为本”，为民服务、对民负责，高效率地为居民办理搬迁签约手续，又依法有序，及时调解纠纷、化解矛盾。到 2006 年 6 月中旬，居住在文华胡同 24 号的居民全部迁出，为实施文物修缮工程和布展工作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2. 修缮文物建筑，实施综合配套工程

依据北京市人民政府（京政发［1984］128 号）公布的李大钊故居“保护范围”，文华胡同 24 号院内有文物建筑 18 间（北院 13 间，南院北房 5 间），建筑面积 288 平方米。在启动居民搬迁的同时，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委托北京市文物建筑保护设计所对文物建筑进行初步勘察，根据李葆华《我的回忆》、李星华《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的记载和相关历史照片、回忆文章，制订了恢复故居原貌的修缮工程设计方案。2006 年 5 月，北京市文物局做出《关于李大钊故居修缮工程方案的批复》（京文物［2006］538 号）。2006 年 6 月 28 日，李大钊故居文物修缮工程正式开工。

北京市文物局领导高度重视此项工程，将其列入 2006 年北京市“人文奥运文物保护计划”重点工程项目，先后拨付文物修缮专项资金 140 万元。孔繁峙局长等还多次深入施工现场，针对工程中出现的疑难问题，逐一及时协调解决，保证了文物修缮工程的顺利进行。故居文物修缮工程规模只有不到 300 平方米，文物建筑又是民国时期普通的民居，在外人看来应该是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区文化委员会的同志始终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坚持“程序第一、质量第一、安全第一”的工作标准，付出了辛勤的努力。



市文物局、西城区领导现场办公

在居民全部迁出后，经过对文物建筑详细勘察后发现，北院建筑除西厢房木结构糟朽、墙体严重歪闪需要落架大修外，正房及东厢房大部分木结构及墙体基本完好，根据“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及时调整方案，将落架大修改为挑顶修缮。

在油饰彩画工程中，根据拆除搭建在文物建筑上的临时建筑后露出的旧木构件原状，结合民国早期民宅油饰通行做法，经专家现场研究讨论，按照市文物局主管处室的意见，对故居内油饰彩画施工方案也做出了调整：原设计方案中油饰基层一麻五灰做法改成单皮灰地仗做法，新、旧木构件交接部位，参照旧木构件原状，待基层处理好后统一采用传统光油，达到新、旧协调统一；北正房三间外单连珠万字箍头，参照现场遗迹按原工艺手法恢复；室内顶棚采用传统面裱糊，梁、檩、枋露明处及室内木装修色彩随顶棚纸色。在拆除院内临建、清理完渣土后发现，文物建筑的台明部分被埋在了地下，院门及大部分围墙歪闪、残损严重。据此，将地面降至历史地平，参照现存的北房北侧一小段残存老墙做法，新做了院门和围墙。北京市文物古建工程公司调集了精兵强将，克服了工期短、场地狭小等困难，与区文委及设计、监理单位密切合作，2007年2月完成工程主体部分，院门围墙、门窗油饰、屋面、室内墙面及庭院地面铺装工程，于2007年4月中旬竣工。

按照故居对社会开放的需要，经文物、规划部门批准，将南院南房及两侧厢房扩建、翻建，辟为专题展厅和配套用房，更新了全院的上、下水管道和电力、照明线路，安装了技防监控安全报警系统，移植树木进行庭院绿化，对故居周边街巷环境进行了整治。这些综合配套工程，为故居的开放和安全使用创造了良好条件。

三、李大钊故居的复原陈列和专题展览

自2005年10月起，西城区文化委员会组成专门的工作班子，采取座谈、走访、参观等多种形式，开始进行故居复原陈列和专题展览的立项研讨、资料收集、展陈大纲编写等各项工作。

1. 明确定位，做到集思广益

西城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李大钊故居的展陈工作，区领导强调：展陈方案要高起点，既要再现原貌，又要与现代展陈手段适当结合；要突出重点，展现李大钊在北京十年、特别是故居四年的家庭生活、社会交往场景和做出的伟大贡献；展陈内容、形式设计应广泛征求领导、专家和社会各界的意见。

为了尽早确定故居复原陈列和专题展览的定位和选题，我们委托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协助邀请王学珍、张静如、古平、刘桂生、王世儒、马模贞、朱成甲、王宪明、朱志敏、吴家林、谢荫明、陆兵、侯且岸、孙宽平、马建钧、周吉平、杨琥等中国李大钊研究会、北京“大钊学社”的专家学者进行了两次集体座谈，并多次个别走访，通报李大钊故居开放筹备工作的进展情况，充分吸取对复原故居陈列的定位、举办专题展览的选题和收集资料的方向等意见。

对故居复原陈列，专家们认为，一直以来对李大钊的研究主要停留在思想和学术层面上，而对其家庭生活方面的研究则涉及较少，故居复原陈列可以填补这一空白，使李大钊的人物形象更加丰满。故居既然是生活场所，就应当真实地反映一个人的生活状况。故居复原陈列的定位，要给人以真实的感觉，要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展现既可敬又可亲、既真实又可信的李大钊人物形象。

对我们计划举办“纪念李大钊英勇就义80周年专题展览”的设想，专家们提出了不同意见。大家指出，北京李大钊故居与河北乐亭的李大钊纪念馆、北京的李大钊烈士陵园具有不同的价值和意义。故居应有故居的特点，在其功能上应该有所侧重。故居的专题展览，应集中反映李大钊在1920年至1924年期间最具代表性的革命实践活动，把握好“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阐述社会主义、实现国共合作”这几个亮点，表现他崇高的革命

精神、伟大的人格魅力和无私的高尚品德。

经过广泛征求意见，2006 年 6 月，西城区文化委员会聘请唐山市委党校李权兴教授为顾问，组织人员着手编写故居原状陈列和专题展览的展陈大纲。编写组根据收集的资料，结合故居展陈空间的实际，借鉴李大钊纪念馆、李大钊烈士陵园、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的经验，经过两个多月的辛勤努力，编写出 3 万余字的“送审稿”，提交上级主管部门领导评审。

根据评审意见和新收集的资料，编写组对大纲又作了修改和补充，形成“征求意见稿”。2006 年 10 月 14 日，西城区召开“李大钊故居展陈大纲专家研讨会”。与会领导和专家对“征求意见稿”给予充分肯定，在提出了一些补充资料的同时，大家建议，要着重处理好政治高度和生活真实、伟人功绩和人格魅力、研究成果与平实语言、展出内容与表现形式等几个关系，进一步完善大纲；在展览设计、制作过程中要更加注重细节，在资料上要舍得做减法，精心组织具体的、感人的事件和情节；在表现形式上，要符合故居展陈空间有限的实际情况，合理运用现代技术。根据专家研讨会的意见，我们又对展陈大纲进行了两次调整，使之日臻完善。

2. 收集资料，获取多方支持

资料工作是做好复原陈列和专题展览的基础。在李大钊的故乡唐山市及乐亭县，有一批多年来从事李大钊研究工作的专家，积累了丰硕的成果。李大钊纪念馆收集、保管的有关李大钊同志的珍贵文物和文献资料的种类和数量居全国之首，纪念馆的陈列、展览及讲解都具有很高水平。在唐山市委党史办公室的配合下，我们多次到李大钊纪念馆取经，学习资料征集、展览制作和讲解工作等方面的经验和做法，重点收集了一批 1920 年至 1924 年李大钊家庭生活、革命活动和社会交往的文献资料，达成了征集、复制所需大部分展品以及培训讲解员等多项合作协议，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

李大钊同志的亲属十分关注故居的开放筹备工作，积极配合资料收集工作。李大钊同志的次子李光华已年过八旬，当得知故居已经得到抢救、保护并将对社会开放时非常兴奋，老人家多次到故居为我们描述儿时的记忆。李葆华、李星华等同志的子女经常到故居了解工作进展情况，他们依据长辈生前的回忆，绘制了故居平面图供我们参考，还提供了一批珍贵照片。李葆华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捐赠了葆华同志的书法作品[9]。这些照片和书法后来都作为展品在故居展出。

收集资料的工作还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其中，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先生和北京红展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经理范强鸣先生等尤其令人感动。欧阳中石先生在应邀为李大钊故居题写匾额时非常兴奋，欣然命笔。当工作人员送上表示谢意的礼金时，欧阳中石先生严肃地谢绝并满怀深情地表示，国家和民族的兴旺，离不开李大钊等革命先烈的奉献，为他们做点事是无上光荣的。范强鸣先生长期致力于收藏、展示“红色文化”的工作，他不仅积极协助我们联系有关单位和个人，提供资料线索，还无偿捐赠了 71 册（件）个人多年收集的包括1927年4月刊登李大钊同志被捕、牺牲消息的报纸、1949 年 7 月出版的《守常文集》及历年出版发行的纪念李大钊的图册、回忆录、研究文集等图书资料和纪念品。西城区社科联的戴时焱同志经常在周末休息时间，到中国书店及旧书市场查找资料并为我们选购了一批有价值的图书。此外，我们还通过拍卖会等形式从民间征集了一批珍贵资料。经专家鉴定，我们征集到的《史学要论》[10]、《中国大学演讲稿》（第一集）（1923 年中国大学出版）被定为一级文物；《少年中国》第二卷（上）（1920 年 7-12 期合订本）、《近代文编》（上、下）（1939 年燕京大学编）被定为三级文物。

在走访北京李大钊烈士陵园、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北京大学校史馆、北京市档案馆等单位时，我们都得到热情接待和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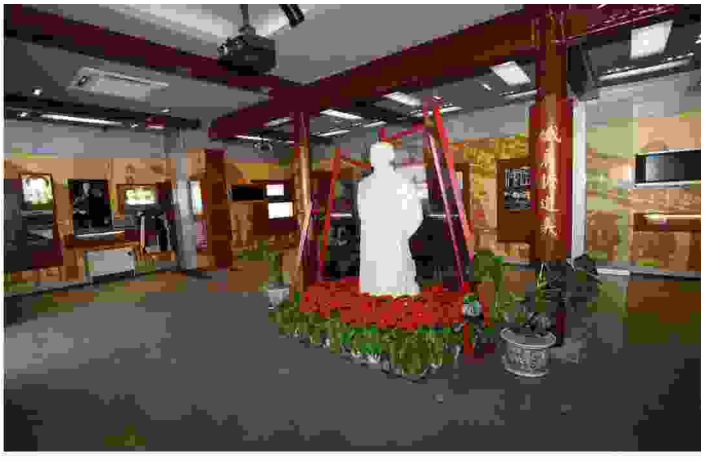
力协助，所到单位的领导、专家从各自专业的角度，向我们提出许多有益的建议，使我们开阔了思路，树立了办好复原陈列和专题展览的信心。如：北京市档案馆研究人员结合1997年举办的纪念李大钊英勇就义70周年“大钊精神永存”展览，希望复原陈列不能全是展板或复制品，应深入挖掘档案资料、尽量征集实物，以增强感染力。北京大学校史馆领导强调，当时李大钊的身份是北京大学教授，相对于故居的家庭生活，北京大学是他传播马克思主义、从事学术研究和人际交往的主要场所，专题展览应突出这条主线，丰富相关的典型资料，他们还指定专人无偿提供了展陈大纲所列出、需要影印的文献资料。另外，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内李大钊办公室的原状陈列、李大钊烈士陵园的庭院环境设计等，也为我们提供了可借鉴的范例。

3. 设计制作，突出故居特色

2006年10月以后，故居的展陈工作进入到形式设计和展览制作阶段。根据展陈大纲确定的内容和专家的意见，我们结合故居展陈空间有限的实际情况，采用实物（征集、复制或制作）、书影、照片、雕塑、油画、书法、图表、视频及电子触摸屏等多种形式，力争准确表现复原陈列和专题展览的主题。

在此过程中，我们始终遵循“复原陈列应当保持历史原貌”的原则。为了真实再现李大钊夫妇卧室的原貌，我们特地从河北农村征集了旧炕柜、木箱、竹席、小炕桌、脚凳、针线笸箩以及夫妇二人喜欢的皮影戏唱本和皮影挂件等一批实物。据专家提供的资料，当年北京大学为所有教授家中都安装了电话，李大钊家中电话号码为“西局2257”，据此，我们委托中国电信博物馆复制了一部老式电话；据李葆华同志生前回忆“在我的印象中，父亲从来没有抽过烟，酒喝一点，但不多……他喜欢瓷器、古玩啥的，买了一些”，我们购置了一批民国初年的瓷器，布置在客厅一隅。这些都收到了让观众置身在真实、具体的场景和特定的氛围中感受李大钊人格魅力的效果。

为了反映历史的客观实际，确保文物和资料的运用有科学依据，我们将1920年10月《少年中国》第二卷第四期刊出的“北京会员李君守常，于日前回籍接取家眷，已于月初回京，寓西城石驸马大街后宅35号”的“学会消息”影印展出。以学术界公认的《白坚武日记》[11]为依据，将李大钊在北京另外7处居所的地点、居住时间制作成图表并标注在地图上，使观众能够清晰地了解李大钊在北京的生活足迹。



专题展厅

李大钊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等革命实践活动是专题展览中最重要的内容。2007年1月，我们专门组织人员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广州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及中国国民党“一大”会议旧址等地考察，在进一步完整而准确地理解相关重大历史事件的背景和过程的同时，对收集到的部分资料进行了认真核对。例如，一般人都认为李大钊参加过中共“二大”，也曾有学者建议我们引用李大钊在此次会议上的发言，但是多数专家认为李

大钊并未出席会议。在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印证了多数专家的意见，即：当时李大钊确实去了上海，但晚了几天，会议已经结束了，李大钊没能赶上，继而转赴杭州参加了中共中央“西湖会议”。由此，避免了在展览中出现“硬伤”。

我们还将1920—1924年期间李大钊在各地讲学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足迹、所担任的北京大学校内及社会多种职务、夜以继日撰写文章的数据等制作成图表，既全面、具体地表现了他坚定的信仰、渊博的学识和大家风范，又充分利用了有限的空间。

按照纪念性博物馆的通行做法，一般都要在室外显著位置设置主要人物或重大事件的雕塑。据了解，目前树立在北京大学、李大钊纪念馆和李大钊烈士陵园等处的李大钊塑像都是在上世纪80年代由傅天仇、钱绍武、叶如璋等著名雕塑大师分别创作的。故居的李大钊半身铜像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青年雕塑家陈辉副教授创作完成。铜像的大理石基座高1.3米，塑像高0.707米，整体高度为2.007米，象征着2007年李大钊故居修复并对公众开放。

回顾李大钊故居文物保护工程的全过程，无时不被李大钊同志以自己短暂的生命在中国革命史上谱写下的壮丽篇章所感动。今天，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我们再次走进北京李大钊故居，还能感受到那段历史、那段岁月里李大钊的辛勤忙碌、亲情温馨，那段与中国共产党历史联系在一起的岁月的凝重……

（在此，谨向唐山市委党校李权兴教授、北京市西城区文化委员会高娟娟、姚华容、殷晓翎、北京李大钊故居管理处王洁等同志在李大钊故居文物保护工程中付出的辛勤工作表示诚挚的敬意！）

① 1999年10月30日，胡锦涛同志在纪念李大钊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②李葆华（1909-2005），李大钊长子。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李大钊牺牲后，由党组织安排到日本留学。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东京特别支部书记。回国后历任京东特委书记、北平市委书记、晋察冀省委书记等职。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中央候补委员（时名：赵振声）。1948年任中共北平市委第二书记兼统战部长。新中国成立后，任水利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贵州省委第二书记、中国人民银行党组书记、行长等职。中共八届、十届、十一届中央委员，十二届、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③李星华（1911-1979），李大钊长女。1927年与父母一起被捕，李大钊就义后，辍学照顾生病的母亲和幼小的弟妹。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为父亲公葬奔走，5月料理母亲丧事。新中国成立后，从事教育工作和民间文学研究。著有《李大钊诗文选集》、《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等，为学习、研究、宣传李大钊做出了贡献。

④李炎华（1919-1966），李大钊次女，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故乡大黑坨小学校任教。新中国成立后调到北京工作。

⑤李光华（1923-　），李大钊次子，　1941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唐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职，1959年调到北京，1977年任中国科学院电子研究所党委书记。

⑥钟华（1923-1924），李大钊幼女，从后宅35号搬家后，刚刚学会走路，因患白喉，医生错当是肺炎，耽搁了最佳治疗机会不幸夭折（李葆华《我的回忆》、李星华《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

⑦2009年10月28日，习近平同志在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⑧《ALA世界图书情报百科全书》（美国图书馆协会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简称ALA，成立于1876年）。

⑨1984年李葆华为秘书张首军题写“发扬革命传统，为四化建设而奋斗”。

⑩《史学要论》，李大钊著，商务印书馆1924年出版，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第一部科学、系统阐述历史学重大问题的理论著作。

⑪《白坚武日记》，白坚武（1886-1937），李大钊在天津法政专门学校的同学，留有一部相对完整的日记，在日记中有既记行踪又记思想的习惯，在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中具有一定的价值。

（作者为原北京市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副主任，现任北京市正阳门管理处书记）



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藏珍贵革命文献述要

孔繁云

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现藏有民国时期出版新善本图书约 5000 余种 8000 余册，具有时代完整、种类齐全、内容丰富、版本多样等特点。藏书包括有大量珍贵历史革命文献，其中不少是珍稀版本，如：《共产党宣言》1920 年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和两个纪念《宣言》发表 100 周年的版本等；《毛泽东选集》1944 年第一版三卷和多种版本；《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内附廉臣（陈云笔名）《随红军长征》一文，首先在北平秘密出版发行，向世人宣传红军长征的壮举；多种版本的《毛泽东选集》；有钤“八路军留守兵团军政研究班图书馆”章的 1938 年 12 月初版《论新阶段》。此部分珍贵革命文献藏品经鉴定为一级文物 24 件，二级文物 113 件，三级文物 610 件（其中有国统区蒋、汪“白色文献”近 20 件），是由“文革”初期成立的北京市古籍文物清理小组在本市造纸厂拣选抢救入藏的。

2009 年夏，按照国家文物局和市文物局的部署，我中心图书保管部开展了“文物调查及数据库管理系统建设项目”，对馆藏一、二级品共计 500 多种进行了资料整理和数据录入。在此基础上，笔者就其中珍贵藏品进行了重点梳理和探究，珍贵古籍部分已在本刊 2010 年第 4 期登出，现将珍贵革命文献部分整理如下，值此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之际，以展示中国共产党从无到有、发展壮大所走过的艰苦卓绝的革命道路和辉煌的历史功绩，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将更加富强。

一、中国共产党建党理论文献

1.《共产党宣言》：繁体竖排铅印本，平装一册，56 页，32 开。书长 18.1cm，宽 12.3cm。封面水红色印，依次横排印四行右读：“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共党产宣言”、“马格斯、安格尔斯合著”、“陈望道译”及马格斯半身像；封三版权页竖排印：“一千九百二十年八月 日出版，定价大洋一角”，印刷及发行者为社会主义研究社及原著、翻译者姓名。封二有曾经藏者的英文签名，该书纸张泛黄、略焦脆，封面有磨损，退色、暗淡。

《共产党宣言》1920 年 8 月出版的中文第一版仅印 1000 册，不知是由于排版疏

忽还是其它原因，封面书名“共产党宣言”排印成“共党产宣言”，同年 9 月份出版的中文第二版进行了更正，封面用蓝色印。8 月初版、9 月再版，间隔时间如此之短，反映出受读者欢迎和畅销程度之大。在陈望道这个中文译本中，部分译法用字与另外两个版本有所不同，如作者“马格斯、安格尔斯”字样（后来的译本作者为“马克思、恩格斯”字样）；正文首句：“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它的结尾是：“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呵！”1947 年 3 月博古译本正文首句：“一个幽灵在欧罗巴踯躅着——共产主义底幽灵。”它的结尾是：“一切国度底无产者，联合起来呵！”1949 年纪念《宣言》发表一百周年译本，正文首句：“有一个怪影，在欧洲游荡着——共产主义底怪影。”它的结尾是：“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8 年德文版问世后，很快风靡全球，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很多国家、地区出版。此汉译本是陈望道借助日译版，参照英文版，第一次将其完整地翻译成中文全译本，中文版《共产党宣言》的出版发行，在当时一部分青年中影响较大，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周恩来总理生前一直关注着《共产党宣言》中文第一版的寻找。1975 年，身患重症的周总理还关切地对陈望道说：“这是马列‘老祖宗’在我们中国的第一本经典著作，找不到它，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心病啊！”因此该书具有特别重要的史料及版本价值，1994 年经专家鉴定为一级文物。

该书是在“文革”中抢救图书文物时，在本市造纸厂拣选而来有幸传世的。据近年有关著录资料记载，目前该书入藏单位除我中心外还有：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图书馆、上海档案馆、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等 11 家各一册。该书自首都博物馆 2006 年新馆开馆时调展，在该馆基本陈列——“古都北京·历史文化篇”近现代章节部分中展出。前去参观的人们可以亲眼看到这难得一见的珍贵革命文物。

2.《马恩论中国》：1938 年 11 月初版，1 册 214 页，平装竖排，书长 18.4cm，宽



12.7cm。封面右上方印黑白马、恩左侧头像，下方红印右读“方乃宜译”、“中国出版社发行”两行，左边书名红反白“马恩论中国”竖排；扉页有“马，恩论中国／马克思 恩格斯著／方乃宜译／中国出版社／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十一月”五行从右向左读。扉页背面为版权页。目录 1-3 页，译者的话 1-2 页，正文 1-214 页。封底左下角有定价。书脊有书名、译者、出版社。目录页钤“北京市文物局藏书”朱文方印。内容由马、恩关于中国的专门论文及其他著作中有关古代东方中国内容的片段摘录所汇集而成。分为：古代东方底特点与中国、关于中国的论文、世界商业与对华政策 3 章。第 1、3 章为马、恩原著的摘录，第 2 章是马、恩发表于《纽约每日论坛》等报刊有关中国的论评，出版早、流传少，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经鉴定为二级文物。

3.《社会主义底基础》：1930 年 8 月初版，道林纸精印 1 册，387 页，繁体横排，毛边本装（上边与书口两处是毛边）。书长 20cm，宽 14cm。封面：“社会主义／底基础”两行，“山城书店刊”。扉页双

线红装饰框内印“社会主义的基础／马克思著／德特里希编／巴克译／上海／山城书店印行/1930”七行；扉页背面版权页：“1930年7月付印/1930年8月发行／印数1—1500册”三行；译者序1-2页，目录1-9页，正文1-387页，本书引用书目1-4页；书眉双页左上角有书名，单页右边有篇章；书脊有书名、译者、出版者。

此书内容是据马克思所著《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剩余价值学说史》等著作中有关社会主义部分的摘抄节录，按类分为：第一编、革命的认识时代；第二编、资本主义的生产时代；第三编、剩余劳动与劳动日；第四编、社会主义和劳动运动；第五编、唯物史观；第六编、科学的断片思想。该书一是为更多的社会实践的人们，提供短时间了解到马克思主义主要理论知识的便利条件；二是，引导在此基础上有时间、有兴趣的需要进一步研究的人们可去读原著全文。此书从欧洲社会主义先进的思想内容、方便阅读的横排版面，到毛边时尚的装订形式，不仅吸引了思想进步人士，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普及传播也起到一定的积极推动作用。

4.《毛泽东选集》（存卷3-5）：1944年5月初版，毛泽东著。32开本，平装3册，繁体竖排铅印，单卷成册，锁线装订。书长18.5cm，宽12.3cm。封面书名红色印刷体右读；内容依次为：无字扉页；毛泽东主席黑白肖像页，下题“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扉页有书名、卷次、出版者“晋察冀日报社编”；背面为版权页，内容包括书名、卷次、“编印：晋察冀日报社；发行：晋察冀新华书店；定价：卷三：平装五十三元／精装六十三元；卷四：平装六十五元／精装七十五元；卷五：平装三十九元五毛／精装四十九元五毛；民国三十三年五月初版；1—2,500”。各卷单有目录，卷三收文献3篇：《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附“正误表”2页；卷四收文献4篇：《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论合作社》、《组织起来》、《两三年内完成学会经济工作》；卷五收文献7篇：《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作用》、《反对自由主义》、《反对党八股》等关于党的建设和整风问题的文献，书中夹有“正误表”1页。卷四封面有蓝墨水笔写“予”字。此书纸张焦脆泛黄，有水渍，书脊磨损。衬页左上角加盖我中心图书编号章，目录首页右下方钤“北京市文物局藏书”方章。

这部《毛泽东选集》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编选毛泽东同志著作的选读本，是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日报社出版印刷的，为传播毛泽东思想作了贡献。也是研究毛泽东早期思想的典籍，虽残存3-5卷，但流传至今已稀少，仍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鉴定为二级文物。著录见《民国时期总书目·政治》01118条。

5.《海丰农民运动》：1926年10月出版，彭湃著，繁体平装竖排一册，32开，1-168页。书长18.2cm，宽13cm。浅蓝色封面印墨色行书书名“海丰农民运动”和仿宋体“广东农民协（空一字）出版”；封二为目录；封三版权页竖排“一九二六年十月出版，定价每册贰毫，编辑者：广东省农民协会；印刷者国光书店……”。封面及首页钤“施复亮印”朱文方印，尾页钤“施739号”蓝色印。首页右下钤“北京市文物局藏书”朱文方印，上方有长方戳填写该书帐号。

此书是中国共产党最早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阐述农民运动的理论方针的重要著作。1926年1月1日，中央农民部主办的《中国农民》创刊，该刊1-5期登载《海丰农民运动报告》；9月，被毛泽东编入《农民问题丛刊》；10月，广东省农民协会把它更名为《海丰农民运动》，周恩来亲自为该书封面题写书名，作为“广东农民协会丛书”之一种出版。该藏本曾经由党早期的活动家、领导者施复亮收藏，具有特别重要的史料价值、文献价值，经鉴定为一级文物。

6.《论新阶段》：毛泽东著，193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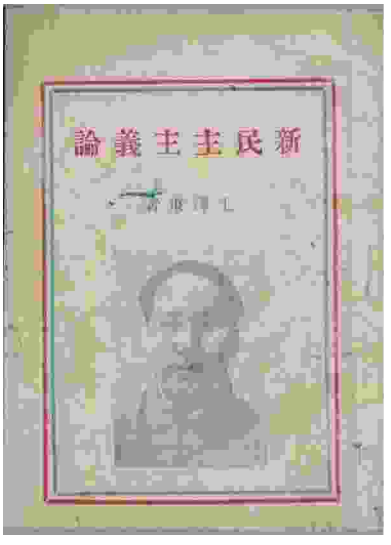
12 月初版，繁体竖排铅印 1 册，正文 128 页。书长 18cm，宽 12.7cm。封面书名竖排，为毛泽东手迹，左下角为“解放社出版 / 1938”横排。扉页有毛泽东手迹：“论抗日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一九三八．十月十二日至十四日在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上的报告”；背面为版权页，竖排三行：“编辑者：解放社；出版者：解放社；总经售：延安新华书店”；横排：“民国二十七年十二月初版”等项。报告分“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抗战十五个月的总结”、“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等八个部分阐述及附录。封底中心位置有黑色手写体“解放”二字。书脊有宋体书名和出版者名。封面左中和第 7 页左上方钤椭圆形紫色“八路军留守兵团军政研究班图书馆”章；扉页左下角钤：左侧长城烽火台图案、右侧“烽火图书室（中国类 NO（5051/1）八路军留守政治部”长方形章、左上角为我中心编号填字章。全书多处有红蓝两色笔标注。正文第 1 页右下角钤“北京市文物局藏书” 阳文方章。在正文第 11 页有眉批：“反速胜论”、“敌强我弱，敌弱我强”。书脊破损，书页焦脆泛黄。

此书虽用当时较好的纸张印刷，但仍显得比较粗糙。当时“烽火图书室八路军留守政治部”、“八路军留守兵团军政研究班图书馆”两方钤章，让我们感觉到战争年代特有的烽火“味道”。著录见《民国时期总书目·政治》01198 ③。此书由延安解放社出版，为最早的单行本，流传到今天，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艺术价值等，经鉴定为二级文物。

7.《论新阶段》：“时论丛刊”、“文缘版”，1939 年 1 月 30 日再版，不见著录。书长 18.6cm，宽 12.8cm。繁体竖排铅印平装本 1 册，封面橘红色，黑色字体竖排右边一行：“每日译报时论丛刊”，左边长方框内反书名：“论新阶段”，下面有“毛泽东著”字样。封二为每日译报丛书出版预告：国际妇女动态；华北官僚群像；女战士丁玲等 14 种。后依次为：目录 6 页，毛泽东题字 1 页，报告序言 1 页，正文 103 页。封三版权页上三分之二处为汉文：英商每日“译报”时论丛刊；文缘版；民国二十八年一月三十日再版等项。下三分之一处为英汉文：本报创刊于民国二十七年一月二十一日；发行人孙特司·裴士、拿门·鲍纳等。封底中心位置印有“译报”徽标。封面钤蓝色“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图书馆”三行外一圈英文圆章。目录题：“张勉之．六三．一．五”，钤“北京市文物局藏书”朱文方印及红章填写书号。封底左下钤有“南京夫子庙书店”书籍打开形状章、“中国书店定价签”填字章。

从此书出版者和所附新书广告可以看出，在华外国商人也密切地关注着中国国内的时局变化，从多方面介绍中国。虽然是再版，不是最早的单行本，因不见著录，流传到今天，也是十分罕见的毛泽东著作早期的版本了，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献价值，经鉴定为二级文物。

8.《新民主主义论》：1940 年 1 月，毛泽东著，繁体竖排铅印平装本 1 册，正



文 49 页。书长 17.5cm，宽 12.5cm。封面外红内蓝线框装饰，框内上边横排红题书名，下蓝色印作者和毛泽东半身像。依次为扉页；目录排列十四篇文献；正文内容为“中国向何处去” 、“我们要建立一

个新中国”等十五篇文献，文后落款：“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五日”。封三铅笔题写六行字迹模糊不可识；钢笔题“白求恩国际和平第一医院李新农／石家庄——托儿所周颖”字样。

书中目录（一）——（十五）篇的序号用墨笔填写标注；目录比正文少一篇，补写目录第二篇“（二）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有眉批，另有红或蓝色标记圈、点、竖线等，没有出版单位和时间。著录据《民国时期总书目·政治卷》01200条载：最早版本为：（1）解放社，1940年3月版；（2）新华日报华北分馆，1940年出版，56页，32开。我中心藏本不见著录，疑是校对本，具有特别重要的历史价值，经鉴定为一级文物。此书纸张焦脆，书皮脱落，书页多处断裂破损。2005年9月委托古籍修复专家李文如先生进行了粘连补破、装订，保持原状修复，并在书后题“二〇〇五年”钤“李文如装订”方印；目录页钤有“北京市文物局藏书”朱文方印。

9.《陕甘宁边区政府一年工作总结》：1944年1月，繁体竖排铅印，平装一册，44页。书长18cm，宽12.3cm。封面红印书名行书“陕甘宁边区政府一年工作总结”、印刷体“一九四四年一月出版”；目录2页，内容有：一、林祖涵主席：《边区政府一年工作总结》，分为“去年大进步的一年和今年要备荒”、“为准备反攻创造更充实的条件”两个部分；二、李鼎铭副主席：《边区政府简政总结》，分为“精简问题”、“统一领导问题”、“反官僚主义问题，在反官僚主义中改造我们的领导作风问题”、“提高效能问题”、“节约问题”五个部分。分别是一九四四年一月六日和七日在边区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的报告。

林祖涵即林伯渠，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李鼎铭于1941年在边区参议会二届会上提出“精兵简政”议案，得到毛泽东的赞同，当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书中所论述的“精兵简政”政策是我们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十大政策之一，对坚持长期抗战、夺取最后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此书为与事件同时印刷的出版物，是中共党史的重要史料，经鉴定为一级文物。

10.《论联合政府》：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之一，毛泽东著，1946年5月出版，平装1册，32开。书长17.6cm，宽12cm。繁体竖排铅印，土本纸。封面“毛泽东／论联合政府”2行从左向右读，书名下方书“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之一”，封面中心位置是毛主席肖像，最下方“晋察冀日报社出版”1行从左向右读。扉页有书名、第七次代表大会时间、出版日期；扉页背面目录1-2页，正文1-91页。全文共五个部分。目录页钤“北京市文物局藏书”朱文方印。纸张前几页粗糙，后面页焦脆泛黄，封面破损、有污迹，封底失，最后一张护页破损折皱严重。书背装订处生锈，散页，后人用线装订过。书角磨损，书脊破损严重。此文献在我党的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为事件同期出版物，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经鉴定为二级文物。

二、进步文献

1.《今日——马克斯特号》（第一卷第四号）：1922年5月，1册71页，繁体竖排铅印。书长22cm，宽15cm，封面缺失。目录页横书右读“马克斯特号（第一卷第四号）” 共七篇文章：唯物论与唯物史观——林可彝；格达纲领批判——熊得山；绝对的相对的剩余价值学说——摩汉；马克斯的唯物哲学——王中君；马克斯的诗——李湘渔女士；马克斯传——胡南湖；马克斯夫人燕妮传——李光华女士。背面为“卷头语”，末页为“五月五日马克斯纪念记事”一篇（在目录中没有列入）。在第35、59、68页加印报刊广告和启事。72页暗码登《京报》、《公论报》、《江汉日报》、《江声报》广告。双页码书眉印“今日”字样，单页码书眉印篇目名。封三上半部：“北京新知书社广告：本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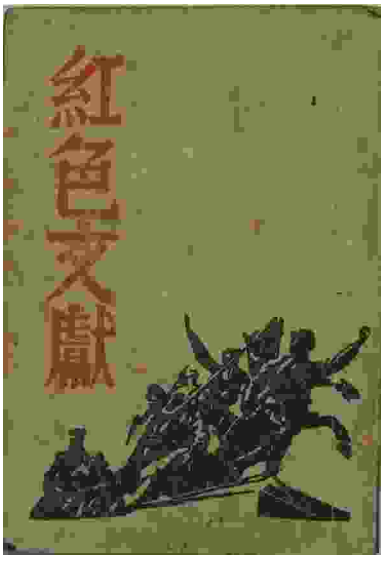
为北京大学及北京教育界同人所组织，以编印教科书及各种有价值的图书杂志为主要营业……”，下半部版权页：“编辑者：北京慈慧殿 5 号 / 今日杂志社；印刷者：东城弓弦胡同 6 号 / 北京新知书社；代理总发行及定价；本志定价表：每月一册，一角；每卷六册，五角；全年二卷，一元”。封底红印：本志代派处名单。书脊有印刷体“今日杂志”字样。著录据《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三集第 435 页载：1922—1923 年每年一卷四册。此特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介绍，在当时社会上起到了一定的宣传、普及的推动作用，此书传世现已稀少，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经鉴定为二级文物。

2.《抗战文艺选——抗战文艺丛书（第一集）》：1941 年 1 月初版，平装 1



册，212 页，竖排铅印。书长 18.2cm，宽 12.5cm。蓝绿等色彩纸印刷，封面四周黄色为底，上边反白书名：“抗战文艺丛书”，下方黄地红字“抗战文艺选”，下方白底红字印“张厚植、宋念慈合编”从右向左读，中心位置用三角形稿纸和一手握笔组成图案装饰。最下方有黄底白字“杭州正中书局印行”字样。编者的话 1 页；目录 3 页；正文 212 页，文后一行：“录自青年月刊五卷四期”；封三版权页：民国三十年一月初版；中国文化服务社浙江分社发行；抗战文艺选（第一集）等项。书眉双页注书名，单页注篇名；封底左边有一行“本书领到麗水区图书杂志审查会‘麗’字第三七四号审查证”；书脊印：书名 / 第一集 / 印行者。编者的话页钤“北京市文物局藏书”朱文方印；正文页钢笔题“1941、3、25、贞人购于口”， 钤二方印，字迹模糊不可识读，二印上盖有“北京图书馆藏”朱文方印。封面封底有污迹、墨迹，破损已严重。此集收入散文、特写、报告文学、新诗、译文等类共 44 篇，其中有《黄帝魂》（卢冀野）、《在前方——不朽的一夜》（徐迟）、《在火线上》（冰莹）、《吊台儿庄》（臧克家）等。此书为抗战三年时作者对战区悲壮热烈战争场面及将领言论风采的记述，由于印刷条件艰苦，用当时延安特产的一种土纸印刷，有强烈时代感和沧桑感，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等价值，经鉴定为二级文物。

3.《红色文献》：1938 年 2 月，平装 1 册，繁体竖排铅印。开本长 18.2cm，宽 12.9cm，封面书名红色印“红色文献”，竖排。内容依次：扉页：“红色文献 / 解放社”从右向左读；扉页背面是版权页：“红色文献 / 定价七角 / 解放社出版 / 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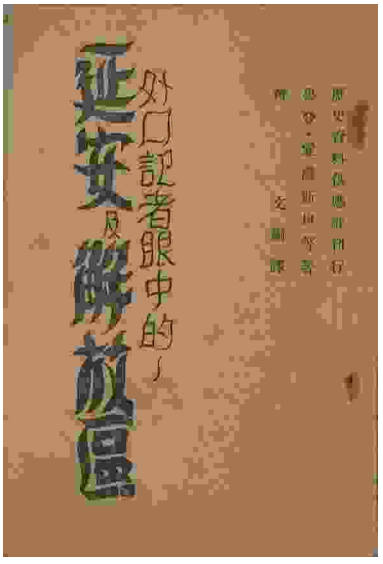


国二十七年二月”；编者的话 1-2 页；目录 1-2 页；正文 1-404 页；书脊印有书名、

出版者。护页题“战时农村问题研究所惠存／□□敬赠／一九三八”字样；封面钤“战时农村问题研究所图书室”蓝色椭圆章；扉页钤“北京市文物局藏书”朱文方印。据“编者的话”，此书列为《中国问题指南》第二册，包括自中共二次大会宣言到六届四中全会期间中共重要历史文件21篇，以此献给中共建党十六周年纪念。该书内容好，资料丰富，具有重要的近代史料、文献价值等，经鉴定为二级文物。著录见《民国时期总书目·历史卷》01156条。

4.《划时代的一二九》：1937年12月，杨述著，平装竖排本，1册40页。书长18.2cm，宽12.7cm。封面缺，内容为纪念“一二·九”两周年，为号召人们在抗战全面爆发的形势下，继续发扬“一二·九”精神，争取抗战最后胜利而作。分为：写在一二九运动前面（黄诚）、划时代的一二九、一二九北平学运小史、一二九学运的检讨、自跋五部分。目录页自上而下钤“05645”兰色打号编码、“人民出版社图书资料室”长方印、“北京市文物局藏书”朱文方印；封底钤中国书店价签章。该书为锁线钉，书页纸张色泽泛黄，外为牛皮纸粘书皮。该书纪念伟大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流传到现在数量稀少，不见著录，经鉴定为二级文物。该书自首都博物馆2006年新馆开馆时调展在该馆基本陈列——“古都北京·历史文化篇”近现代章节部分中展出。

5.《外国记者眼中的延安及解放区》：1946年4月初版，爱泼斯坦等著， 1册，32开，土纸本竖排铅印。书长17cm，宽12cm。封面竖排由右至左：历史资料供应社刊行／鲁登·爱泼斯坦等著／齐文编译／外国记者眼中的／延安及解放区。扉页为“编者赘言”2页，目录3页，正文174页。封底左下角方框内印有版权：作者；发行所：历史资料供应社；经售处：维新书局；定价：法币七百圆；版权所有，翻印必究；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四月出版。皆横排左读。书脊印有：书名“延安及解放区”、“齐



文编译”、“历史资料供应社刊行”。首页右下方钤“北京图书馆藏书”方章，正文第一页钤“北京市文物局藏书”方章。

抗战中解放区一直在被封锁的状态下，既得不到外界的援助，人民创造的惊天动地的伟绩也没法向外界报道。在1944年5月终于得到国民党当局的允许，这就出现了中外记者西北访问团。他们先后在延安住了两三个月至五六个月不等，一部分外国记者还到了晋绥解放区。此书收录美、英、法、德、奥等国记者、专家、学者及被解放区营救的盟军航空员对延安及其它解放区的报道、观感22篇。其中：《我所看到的陕甘宁边区》（爱泼斯坦）、《延安印象记》（白修德）、《晋察冀印象记》（林迈可）、《中国的地下城市》（福尔曼）、附录《福尔曼的边区报告》等，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鉴定为二级文物。著录见《民国时期总书目·世界文学》0897条。

6.《北行漫记》：1946年出版，繁体竖排平装1册，230页。书长17.5cm，宽12.8cm。封面白色，上方红色反白书名“北行漫记”、蓝色“福尔曼著 陶岱译” 、红色印“燕赵社出版”三行从右向左读。扉页双线框内竖排书名、著者、译者三行。扉页背面版权页有：书名、著者、译者、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出版等；目录 1-3页；



正文 1-239 页，分为：第一章、重庆低语；第二章、集中营；第三章、到客难坡去的路等章。纸张泛黄，书脊破损，封面封底有污迹。该书出版的数量少，为抗战后外国人记录中国红色革命的书籍，经鉴定为二级文物。

三、小 结

我中心所藏民国时期出版物有种类齐全、内容丰富、版本多样等特点，具有多方面的学术研究价值，以上所列举革命历史文献，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和中共党史的参考资料。1. 版本多样：所藏《共产党宣言》有 1920 年第一个中文全译本，两个纪念《宣言》发表一百周年的版本等；《毛泽东选集》有 1944 年晋察冀新华书店第一版三卷、1945 年苏中出版社出版、1948 年 5 月东北书店发行、1948 年中共晋察鲁豫中央编译局编印等多种版本；2. 填补著录空白：《论新阶段》“时论丛刊”、“文缘版”为 1939 年 1 月 30 日再版，不见著录，具有重要的历史、版本价值。

（二）为博物馆办好有关展览提供所需展品。如首都博物馆 2006 年新馆开馆时，在该馆基本陈列——“古都北京·历史文化篇”近现代章节部分中展出我中心提供的一级文物 1920 年版《共产党宣言》，二级文物：1919 年版《五四》、1937 年 12 月《划时代的一二九》，三级文物：1949 年 6 月 30 日版《论人民民主专政》、1935 年版《五四运动之史的评价》等藏品。这些珍贵的党史文献经过岁月的洗礼能完好无损地保存到现在，实属不易，可以说是凤毛麟角、相当珍贵了。藏品的展出让前来参观的人们能亲眼看到这些难得一见的珍贵革命文物，对观者的心灵都会有所触动和震撼，激发人们的爱党、爱国热情。

（三）对北京地区街巷文化整理研究方面具有参考作用。如：《今日——马克斯特号》（第一卷第四号）1922 年 5 月，版权页：“编辑者：北京慈慧殿 5 号 / 今日杂志社；印刷者：东城弓弦胡同”。也可以在原处标注词条说明牌，使人们在相关研究中有所参考。

（四）每种近代文献又具有多方面的功用和学术价值。如通过对传世过程中所附加的题跋、题记、钤印等多种信息的研究，在历史文献、事件、人物等诸方面资料的补充及研究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如《海丰农民运动》：1926 年 10 月出版，钤“施复亮印”朱文方印；《红色文献》：1938 年 2 月初版，题识“战时农村问题研究所惠存 / □□ / 一九三八”字样；《论新阶段》：1938 年 12 月初版，书中钤有一方椭圆形紫色“八路军留守兵团军政研究班图书馆”，另一方左侧长城烽火台图案、右侧“烽火图书室（中国类 NO（5051/1）八路军留守政治部”长方形章。这些为我们提供了此文献曾经学习收藏之人、曾经敬赠之人、八路军机构设制情况等难得的资料信息。

综上所述，就馆藏革命历史文献通过“文物调查及数据库管理系统建设项目”的完成，不仅使藏品得到科学的管理，也使得由于历史上多种原因造成诸多分散流离的藏品，有了可能聚齐在一起为人们所了解、研究的一个平台。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保管部主任）

对正阳门展览工作的回顾与思考

李晴

展览陈列是博物馆展示收藏与研究成果的主要窗口，是博物馆对外宣传和教育公众的重要途径。正阳门作为具有博物馆性质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自 1991 年对公众开放以来[①]，就将“以展览服务社会”作为业务工作的立足点。20 年来，共举办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展览计 85 项，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本文将详细介绍开放以来正阳门管理处展览工作的开展情况，展览工作对其他业务工作的促进作用，以及笔者对正阳门展览工作的一些思考。

一、正阳门展览工作的发展历程

1991 年以来，正阳门管理处的展览工作主要从四个方面开展。第一，结合历史文化、区域文化推出主题展览。正阳门自建成至今，经历并见证了明清以来北京地区近 600 年的风雨沧桑，它所处的前门地区，曾经是北京商业文化的中心，而它本身也已经成为北京历史的一部分，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和民俗风情。据此，正阳门的固定陈列都是以老北京的历史、文化和民俗为主题设计展出，它们是：“历史上的北京展”、“老北京系列展——老城墙、老街、老市、老宅子”和“正阳门历史文化展”。这三项固定陈列展出后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通过参观展览，很多外地游客留言表示对北京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而众多的北京观众则反复参观，对展览提出了宝贵的意见。此外，管理处还制作或引进推出了以北京地区历史、文化、民俗为主题的临时展览 8 项，分别为：“正阳门箭楼历史陈列”、“张先得老北京水彩画展”、“历史上的北京——清末民初图片展”、“北京民俗展”、“历史上的北京展”、“北京的今天与昨天”图片展、“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伟大的中轴线”和“城墙记忆”。这些展览一方面从多角度展示了北京的历史文化、民俗风情，对固定陈列起到了补充的作用，

另一方面也方便外出巡展，拓宽了参观展览的受众人群。

第二，结合有特殊意义的历史事件推出展览并巡回展出。主要包括：1990 年引进展出“纪念鸦片战争 150 周年图片展”；1991 年制作展出“纪念雷锋诞辰五十周年——雷锋事迹展”；同年推出“中国共产党在北京”作为城楼开馆展览，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1999 年和 2009 年，分别推出“北平和平解放 50 周年纪念展”和“正阳门上大阅兵——纪念北平和平解放 60 周年”两项展览，纪念北平和平解放。2000 年，引进展览“庚子事变百年祭——八国联军入侵北京 100 周年”，教育民众勿忘国耻，振兴中华。2001 年展出“北京市区县青联委员艺术作品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2006 年至 2008 年，配合北京举办第 29 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制作推出展览“奥林匹克精神——图说奥运三大理念”，在社区、学校和一些公共活动场所展出，宣传奥运理念。

第三，面向社会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开展社会教育，推出临时展览。主要有：“珍惜生命 学会生活”、“砖的故事”和“未成年人自我保护展”。通过这类专题展览，将正阳门开辟为学生们的第二课堂，拉近了博物馆与孩子们的距离，收到了良好的教育效果。其中，“珍惜生命 学会生活”是正阳门管理处针对青少年观众开展自我保护教育制作的第一个展览，虽然只是以展板的形式宣传安全知识，但是从 2000 年至 2007 年巡回展出了 7 年，受到众多教育单位的欢迎。2005 年展览“砖的故事”与“自己动手制城砖”的科普项目结合；2010 年“未成年人自我保护展”则直接将展览内容加入动手活动“安全知识趣味棋”中，寓教于乐，探索出临展、巡展的新形式。

第四，利用正阳门良好的地理位置，与其他单位合作，引进临时展览，丰富展览内容。例如“齐白石书画展”、“太平天国历史文物展”、“中国茶文化展”、“首都市民文明公约展”、“元左丞相耶律铸夫妇合葬墓出土文物展”、“首届中国扑克收藏展”、“北京市贯彻、执行＜文物法＞成果展”、“和韵之书——张大侠魅态书法展”等等，内容涉及历史、民俗、旅游、书画、雕刻、摄影、体育、道德规范、爱国主义教育等诸多方面，合作单位的范围亦颇为广泛。

20 年来，正阳门管理处在设计制作展览的过程中不断的将现代科技元素融入其中，包括：2003 年至 2004 年管理处与相关公司合作开发触摸屏软件并投入使用。触摸屏以京腔京韵的风格解说配乐，通过详细的资料和活泼的动态画面宣传正阳门，展示老北京的城门城墙和历史风貌。2005 年底至 2006 年 10 月，城楼固定陈列改陈，改陈设计中将音乐、门铃声及动态画面应用到“正阳门历史文化展”，使展览更加生动，更利于观众的参与。2007 年为了更好地向市民推广“奥林匹克精神——图说奥运三大理念”，管理处制作了展览的网络版，配以奥运进行曲，同时添加大量的图片和动画，动态的展现了北京奥运的三大理念。展览期间登陆“北京文博网”，点击奥运展的图标即可以在网络上观看展览，参加奥运知识问答，提升了展览的趣味性。2010 年管理处在临时展览的创作和巡展工



“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展新闻发布会

作上进行了新的尝试，临时展览“未成年人自我保护展”的开幕式，由学校电视台通过闭路电视对全体师生进行现场直播，达到良好的宣传效果。

二、正阳门展览工作的重要作用

正阳门展览工作的开展与管理处开放接待、宣传教育、科学研究等方面的业务工作息息相关。20 年来，通过展览陈列，正阳门向中外游客展示了多年来征集到的部分珍贵照片、图片，以及专业人员的研究成果。同时，通过举办临时展览以开展社会教育，服务特殊群体。近年来，以展览为依托开展了历史知识讲座和科普动手项目，这种寓教于史、寓教于乐的形式已使众多公众受益，并已经拥有相对固定的合作单位和参与群体，收到了良好的宣传教育效果。下面通过三个主要的展览活动说明正阳门展览工作对其他业务工作的促进作用。

1、展览是开展社会教育的重要基础

博物馆的重要社会功能之一是开展社会教育，展览工作是开展社教活动的基础。2005 年，管理处设计制作了针对中小学生的临时展览“砖的故事”，旨在介绍中国制砖的历史、砖在古代建筑中的应用以及粘土制砖工艺，宣传传统的制砖文化，增强学生们的文物保护意识。考虑到普通的展览形式不容易调动参观者的参与热情，因此配套推出了科普项目“自己动手做城砖”，由讲解人员在介绍展览知识的同时教参观者用软陶烧制小城砖。展览推出后，受到学生们的欢迎，多次接受邀请在社区和学校展出并进行烧制小城砖活动，加强了博物馆与共建单位的联系，充分发挥了其社会教育的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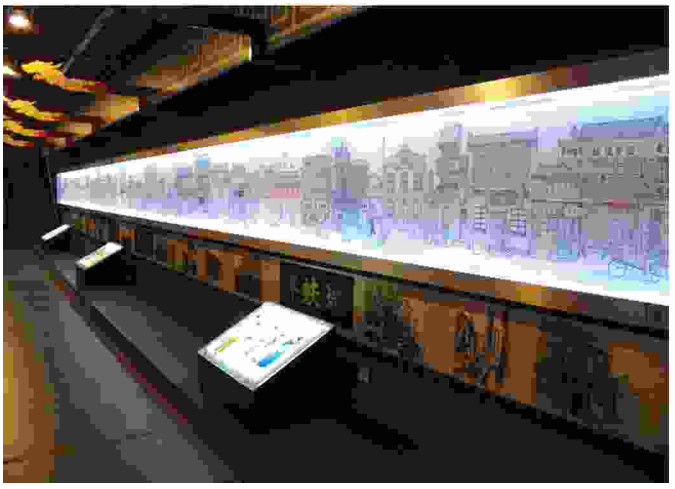
2、展览陈列是展现收藏资料和科研成果的重要平台

与大多数博物馆、陈列馆不同，正阳门管理处自身没有馆藏文物，收藏文献资料、照片、图像，并以此为基础开展科研活动就成为业务工作的重要内容。开馆以来，管理处通过公开征集，走访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北京档案馆、故宫博物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单位，收集了大量的文献和照片资料并细心分类收藏。2006 年，根据城楼展览改陈任务需要，业务人员走访北京十余家图书馆和科研单位，全面搜集了有关正阳门的文献、碑帖、档案、照片及古画等资料。当前正阳门城楼展出的固定陈列“正阳门历史文化展”正是以这些资料为基础设计制作的。该展览详细介绍了正阳门的修建历史、规制、功能、职守、附属建筑以及改建过程等，是详细介绍正阳门这一明清两代国门的第一个展览。展览同时介绍了前门地区的商业文化。开展 5 年以来，“正阳门历史文化展”以 800 平方米的展览面积，先后接待了中外观众 498268 人次，得到领导、专家和观众的好评。

3、展览的推出是提高博物馆知名度的重要途径

2010 年，管理处设计制作了临时展览“未成年人自我保护展”，以“传播自护理念，呵护美好青春”为宗旨，用贴近生活的人物对白，配合生动活泼的故事性场景对话，提示孩子们应该注意和留心的生活细节及自我保护方法。配合展览的推出，制作了“安全知识趣味棋”，增强展览的趣味效果，使安全知识和自护方法更加易于未成年人接受。由于以往展览及开幕式往往受到场地条件的制约，限制了参加的人数，此次展览的开幕式通过学校的闭路电视全程直播，全校师生同步观看了由 4 位同学在特制的大棋盘上充当棋子进行的“真人版”趣味棋表演，加深了对展览的认识和理解，也将开幕式活动推向了高潮。活动邀请了市教委、市文物局的领导以及包括新华社、北京电视台在内的 9 家媒体参加，《光明日报》、新华网、《北京晨报》等媒体登载相关新闻报道 16 篇（含转载）。现代展览的推出往往伴随了开幕式活动的开展，而新闻媒体介入，不仅是对展览活动本身的报道，更是对博物馆的宣传。正阳门地

理位置特殊，展厅面积有限，不适宜在馆内进行活动，巡展的推出和博物馆外活动的开展不仅弥补了场地条件的不足，而且有利于宣传博物馆，提高知名度，从而吸引更多的观众参观。



正阳门历史文化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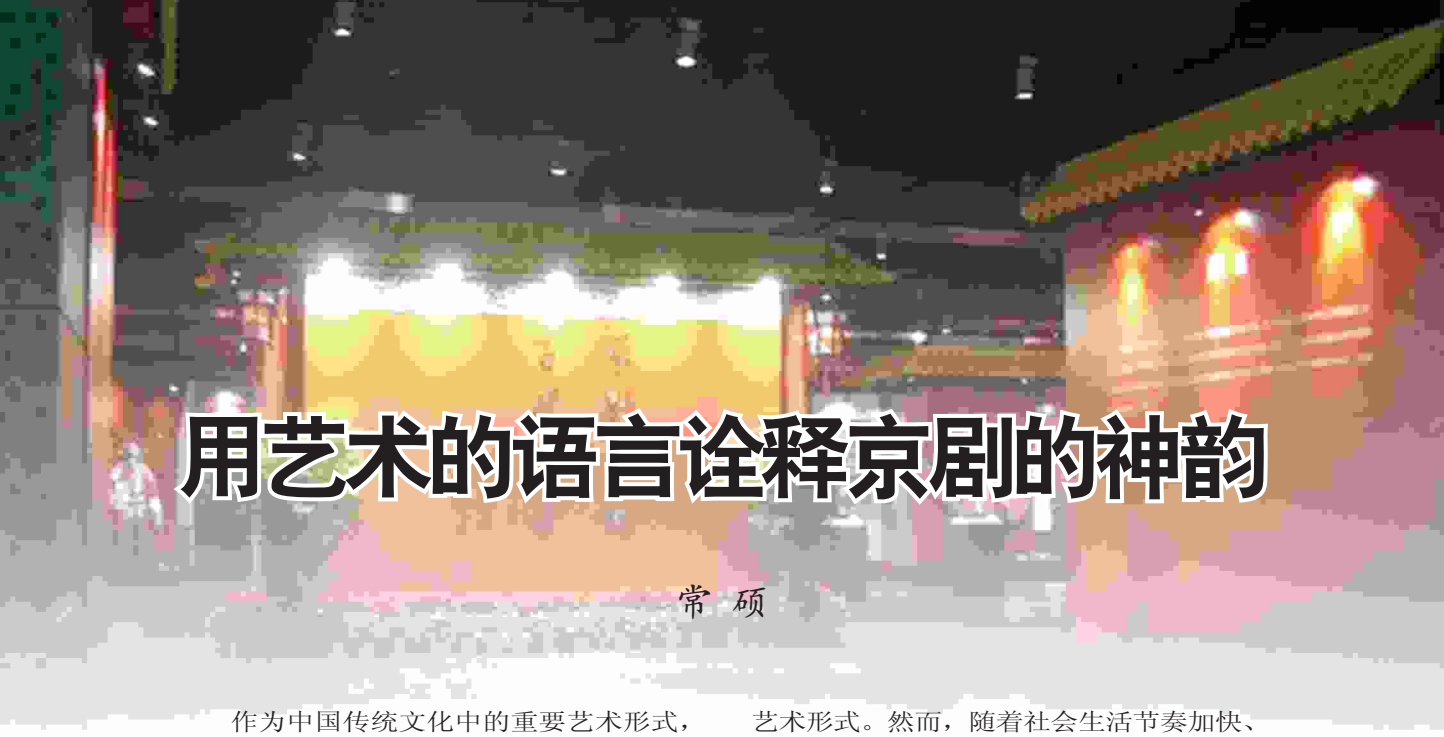
三、对正阳门展览工作的思考

近年来，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党中央和北京市有关领导多次提出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博物馆是文化发展与繁荣的重要窗口之一。目前，一方面，北京很多中小博物馆门庭冷落，参观者少，还有些博物馆因人员不足、经费紧张，发展较为困难；另一方面，北京是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北京地区博物馆、展览馆的展览是成果丰硕，精彩不断。正阳门属于中小型博物馆，虽然不具有馆藏文物，但因为地处天安门广场，工作人员较为齐全，淡季基本不存在“零接待”的情况，旺季则有较多的游客参观。在这样的背景下，做好展览即是提高吸引观众的能力，提高服务观众的能力。当前，正阳门正在筹备固定陈列的改陈，这是今后一个时期展览工作的中心，也是做好展览工作的根本。和大型博物馆相比，我们在场馆环境、文物收藏和观众来源等方面都不具备优势，因此更应该从展览特色上下功夫，发挥自身的优势。在展览内容上应结合自身的历史文化选取部分近年来查找到的资料和研究成果进行展示。目前，管理处收藏民国至建国初期的相关老照片 1295 张，内外城门城墙的老照片 278 张，正阳门的老照片 156 张，还有 11 块金石碑帖的电子版，以及大量的明清档案、史书和私人著述等。在此基础上，撰写出版了《北京正阳门》，即将出版《北京都城城垣资料汇编》。这其中的很多内容可用于展览。而展览形式上则应考虑吸取国际上办展较为成功的主题博物馆的设计形式，根据正阳门展厅的场地情况，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制作融知识和艺术为一体的有特色的陈列，给观众以新鲜感，留下深刻的印象。作为对固定陈列的互动与补充，在做好基本陈列的同时，应努力探索临时展览的设计与展出形式。临时展览具有灵活机动的特点，将社会教育活动与制作临时展览结合起来，既可以丰富宣教活动内容，又增加了展览的观众参与程度。展览内容上既可有与固定陈列内容相关的历史、民俗和文化类内容，也可以与学校等合作单位探讨制作他们有需要的特展，使教育活动更有针对性。

开馆 20 年来，正阳门管理处在展览工作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较大的进步，2010 年固定陈列与临时展览共接待参观群众 31 万人次，提高了正阳门的社会声誉。同时，也应该看到作为业务工作长期并且重要的内容，正阳门的展览工作还需要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完善：一是配套的展览宣传材料、纪念品的开发；二是本馆展览人才的培养。这两方面工作的完善将会使管理处的展览工作更具有活力，更具文化内涵。

① 正阳门箭楼 1990 年 1 月 21 日对社会公众开放，城楼 1991 年 6 月 29 日对社会公众开放。

（作者为北京市正阳门管理处馆员）



用艺术的语言诠释京剧的神韵

常 硕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艺术形式，京剧已深深嵌入百姓生活和精神世界之中。在历史长河的起落沉浮中，京剧的发展走过了曲折非凡的道路。于今，如何在传承、创新中发展博大精深的京剧艺术，使其在新时期里焕发出崭新的光彩成为了我们新的使命。为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拉近艺术与观众的距离，给京剧赋予时代的特色，国家大剧院举办了“京剧神韵 百代流芳——中国京剧艺术大展”。展览通过艺术的语言，生动鲜活地诠释了中国京剧艺术，以深刻的展览内涵，优美的陈列语言，为公众打开艺术之门。作为此展览工作者，笔者将透过此展览就艺术类展览成功要素进行分析。

一、深化展览主题——展览的灵魂所在

展览诞生之初，无论其规模大小，必须确立展览主题，明确展览内涵，这是制作展览的根源所在。为打造优秀的艺术展览，展览工作者就京剧发展现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国粹”京剧扎根于民间艺术的土壤，吸取宫廷艺术的营养，集古代戏曲艺术和华夏文明精髓之大成，积淀了中华民族五千年丰厚的文化底蕴，成为当今世界最具独特民族价值和视听审美价值的艺术形式。然而，随着社会生活节奏加快、国际化程度加深，人们的意识形态已发生变化，京剧艺术已渐渐远离人们生活，成为曲高和寡的艺术门类。现阶段京剧与观众距离较为遥远，人们对京剧兴趣淡薄，青少年对京剧普遍存在负面态度。如何在传承、创新中发展京剧艺术，展现京剧的魅力，使京剧艺术回归大众，拉近艺术与观众的距离，让人们更广泛、更深入的了解京剧、喜爱京剧，成为我们一直思考的问题。

展览工作者组织业内专家深入研究与讨论，深刻认识到拉近京剧艺术与观众距离，扭转青少年对京剧的态度是转变京剧尴尬现状的根本。因而，将展览定位于知识普及型展览，强调展览的艺术性和普及性。在展览内容方面，展览工作者约请中国戏曲学院等专家编写展览大纲，通过对京剧历史、行当流派、舞台表现形式等内容的展示，确保展览专业性和艺术性，展现京剧丰厚文化底蕴，给人以启迪；另一方面邀请京剧名家和业内专家对展览大纲进行论证，在展览文字方面力图平易近人、通俗易懂、引人入胜；细节上贴近普通观众，做好专业用语的注释工作，注重知识普及，雅俗共赏，以观众为本，使京剧艺术回归生活，让观众近距离的、完整的解读京剧艺术。通过对展览主题的深层次探讨和研究，展览工作者明确工作方向，为展览奠定了基础与灵魂。

二、丰富多彩的藏品——展览的血肉依托

京剧艺术展中展品丰富，包括演出戏服、妆头配饰、表演道具、吹奏乐器、绘画作品、京剧人偶、老戏单等百余件展品，其中不乏许多从未面世的清宫文物。如中国艺术研究院珍藏的清朝升平署腰牌。腰牌木质，正面上书“升平署光绪三十四年制造　民籍学生王凤卿年二十六岁　第一百三十八号　面黄无须”字样，背面书“腰牌　内务府颁发”字样。腰牌明确记载王凤卿的个人信息和颁发机构，是研究清代升平署伶人管理的重要实物资料。

京剧服饰是中国特有的传统服饰艺术，是京剧舞台表演艺术的特征之一，也是极具观赏性的艺术品。展览中展出了梅兰芳、程砚秋、王瑶卿、萧长华、叶盛兰等名家的戏衣，它们或飘洒自然，或庄重妥贴，色彩斑斓，美不胜收。其中，王瑶卿三开宫装备受瞩目。三开宫装为其在《三击掌》中饰王宝钏所穿，里外共三种穿法，故称“三开”。三开宫装刺绣精美异常，红色宫装上有百蝶飞舞、配以繁花图案，是难得一见的刺绣佳品，其独特的制衣工艺更是引得广大观众惊叹连连。

砌末是戏曲舞台上大小用具和简单布景的统称，在舞台上帮助演员完成动作。程砚秋在《锁麟囊》中的演出道具锁麟囊也在展览中展出。《锁麟囊》为程砚秋代表剧目，为程派剧目中魁首，在京剧界的地位举足轻重。锁麟囊为该剧中的重要道具，鉴于程砚秋其人和《锁麟囊》一剧的盛名，广大观众争相参观。无论是资深京剧爱好者，还是懵懂少年，皆对其怀有浓厚的兴趣。

京剧伴奏乐器分打击乐与管弦乐。在戏曲舞台上，人物的一切行动都是在音乐的伴奏中进行的。因而，乐器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此展览中展出著名京剧琴师梅雨田的胡琴。梅雨田为“同光名伶十三绝”中梅巧玲之子，梅兰芳之伯父，有“胡琴圣手”之称，曾为清内廷供奉。此胡琴历经百余年仍保存完好，是研究中国古代乐器的重要实物资料。而通过该胡琴的展出，观众对梅雨田其人，乃至梅兰芳家族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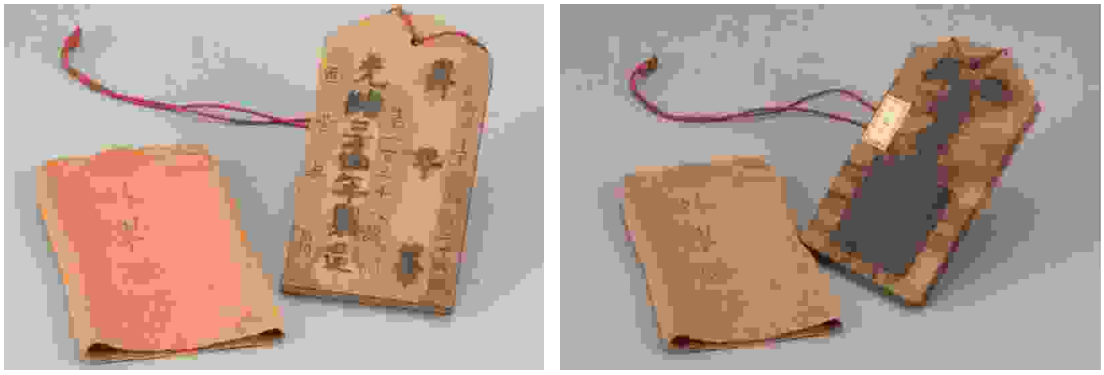
展览通过对清宫文物、京剧服饰、砌末道具、演奏乐器、文献资料等多种类藏品的展示，吸引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艺术爱好者，不仅满足了广大京剧爱好者和京剧艺术家的艺术需求，也引起了其他参观者的关注，给前来参观的人们带来了视觉领域和知识领域的冲击，激起人们对于京剧表演艺术的兴趣，引发人们对京剧艺术的追求和探索。

三、新颖的陈列艺术设计——展览的语言倾诉

陈列艺术设计是展览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它能体现展览的艺术效果，表达展览的主题和内容，是思想与艺术的统一。成功的陈列艺术设计可以增强展览的感染力，勾起观众的参观兴趣，引发观众对展览的思考，给人们启迪。

（一）多重视角结合，营造与烘托展览环境

因展览目的的多元化和展品类别与展示形式的多样化，展览空间具有灵活多变的组合变化特征。为烘托展览氛围，引起观众参观兴趣，合理布局是展览工作的重要一环。京剧艺术展注重展览的功能性、精神性、审美性和时效性，在展线设计方面进行深入分析，以“宫廷”为展览设计的理念，展览主体结构为“宫廷建筑，红墙金瓦”之造型，象征京剧为国粹艺术。展线围绕“红墙金瓦”展开，其中主线是京剧发展史，人们可以看到自清代至民国的京剧文物，感受京剧的发展历史。主展线上设计了出入口各一，简洁明确，使观



升平署王凤卿腰牌正、背面



王瑶卿三开宫装



程砚秋在《锁麟囊》剧中使用的道具



梅雨田使用的胡琴

众思路清晰。在展厅的其他出入口位置，以玻璃幕墙为围挡，并设置《白蛇传》等景观，再现京剧舞台经典场景，使观众更深入的体验京剧文化。展览通过合理的展线设计，借助实物陈列、版面设计、灯光设计、色彩设计、道具运用、音像视频等综合媒体有效地来传递展览信息，增强展陈与观众间的互动与和谐。

为了给观众以亲切之感，展览工作者在陈列设计上注重了展示色彩的设计，以期通过色彩对人们产生心理和生理的影响，达到营造京剧氛围的目的。结合展览的“京剧”主题，在展厅设计上选择了具有浓郁中国气息的红色为色彩设计的主基调，同时配以鲜明而富有活力的黄色，两种色彩配合运用，营造出了中国宫廷“红墙金瓦”的艺术效果，使观众在参观时产生京剧发生于民间、繁荣于宫廷、遍及于中国的情感与共鸣。展板设计上，主要采用红色的衍生色彩棕色为展板底色，配以白色和黄色的文字。棕色的展板给人以深沉、厚重之感，以其为展板底色，可以营造出京剧凝炼深邃、博大精深的艺术效果和情感导向，再配以间或白色、间或红色的墙体，一方面明暗对比，避免主题过于深沉，另一方面也易于区分展览各个部题。红色与黄色代表皇家文化，白色寓意民间意向，棕色借喻京剧文化，三种色泽灵活运用，营造出既恢弘壮丽，又鲜明活跃的色彩空间，从而给观众以亲切、自由、自豪之感。

灯光设计的运用可以起到画龙点睛之作用。根据不同内容的展品和不同色彩的展板，使用不同的光照效果，能够营造出不同的视觉效果。陈列艺术光照环境设计的关键在于选择适合的光源、适合的光源颜色、以及高超的专业布光技巧，从而使展品色彩、形态、内容得以充分展示。光照环境的优劣代表展览陈列设计的品味和优劣。设计独到的光照环境，可以做到让“物”说话。京剧展中到位的灯光设计增添了各个展品的生命力。如清宫点翠凤冠的灯光照明，将光线集中于凤冠上点翠装饰，使得每一片翠鸟羽毛均光彩夺目，满目生辉。在清宫麒麟蟒的灯光设计中，将光线集中于蟒服的中央，提高照明亮度，引导观众聚焦于蟒服上的麒麟刺绣，展现清代宫廷高超的刺绣技艺；此外，通过光线明暗的设计，向观众展现戏服之上牡丹、云朵、海水的色彩变化，使展品静中有动，通过灯光传达出展品的生命色彩。选择不同的光源，能够营造不同的色光效果，对观众产生不同的心理影响。

京剧艺术展的展厅灯光配合展览色彩设计，采取暖色系光线照明，烘托明艳、活跃的艺术效果。展板照明方面使用灯光直接照明，一方面增强展板的亮度，另一方面突出重要文字信息。通过不同照明方式的有机结合，使展览群组陈列最大限度的达到空间色彩的完整和谐，营造出极具质感的视觉效果和艺术氛围。

（二）广泛运用现代技术，京剧大展活灵活现

展览陈列除了通过静态陈列来表达展览主题外，也可以通过影像与多媒体系统设计来展示展览内容。音响、电视、投影、电脑等现代技术经常被运用于展览的各个环节。现代技术的应用打破了早期展览中展品仅能通过静止状态呈现展览内容、静止的传播展览信息的局面。它通过动态演示，让观众参与进来，亲身实验，实现了人与展览的互动，通过视觉、听觉、触觉等感官，接受展品所传递的信息。

京剧艺术展广泛的运用了现代技术手段。首先，设计者在展陈设计中融入了“音”的要素。当代展览经常通过各种乐曲，给观众营造宁静、闲适的参观环境。京剧展亦无例外的选取了具有中国特色、清幽安适的丝竹弦乐作为展览的背景音乐，以达到隔绝外界喧闹、营造艺术氛围的目的。为避免背景音乐与其他多媒体设备播放的音效产生听觉上的冲突，在施工方面采用了特殊的手段进行声处理。通过精妙的展墙架设和先进的音响设备，京剧展中的多种音效巧妙连接，适时出现，互不影响，

有效地引导观众情绪，启发观众思考。

其次，广泛的使用了“视”的概念。如在京剧舞台表现形式部分使用了电脑多媒体技术，通过数字屏幕与电脑主机相连，利用预先编写的程序来播放京剧行当和舞台表现形式的动画作品，向观众展示京剧表演程式；在京剧发展历史环节中，通过数字屏幕与 DVD 播放设备的结合，播放剪辑制作好的《京剧发展历史》和《梅兰芳》等知识性纪录片，使观众更直观的了解京剧发展史；在梨园旧影部分，通过电视屏幕和 DVD 设备播放观众耳熟能详的京剧选段，给观众直观印象，拉近观众与京剧的距离。

电脑多媒体、数字电视等现代技术将生动、感染力强的形象资料进行展览，以其特有的音、像、色、光的组合和涵括丰富的信息量给观众带来丰富、新奇的视觉效果，让观众更直观、更便捷、更亲近的吸纳展览信息，让展览更加鲜明具象、活灵活现。

（三）辅助展品运用得当，拉近与观众的距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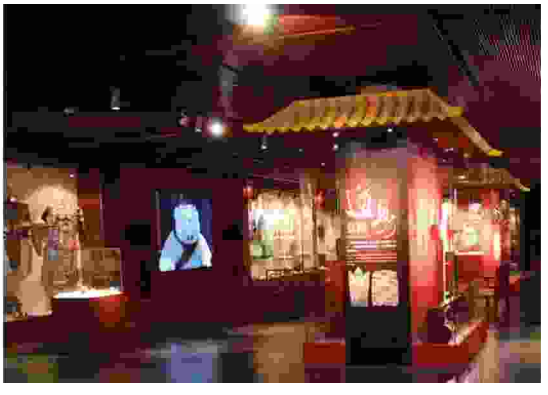
辅助展品是展览不可缺少的一项重要环节。一个成功的展览，珍贵的展品固然重要，但设计得当的辅助性展品、展具可以起到画龙点睛之用。辅助展品不仅可以营造展览氛围，独具特色的辅助展品更可以给观众惊喜，使观众有耳目一新之感，赢得观众的赞誉。

首先，展览设计者为烘托展览氛围，呼应“宫廷和红墙金瓦”的设计理念，在展厅入口处搭建了颇具中国韵味和宫廷色彩的主题墙。此主题墙借鉴中国古代建筑中“影壁”的概念，采用红墙金顶设计，墙体两侧悬挂宫灯，既像是分割内外空间的影壁，又像是引人而入的垂花门，将外界空间与展厅内部加以分割，观众绕过“影壁”进入宫廷内廷，欣赏京剧文化之美。主题墙的架设通过色彩与造型，给予观众视觉冲击，通过中国文化、宫廷文化的思想意识，在心理上迎合了观众的民族情节，从而展览自开篇即为观众带来强大的震撼力和吸引力。

其二，为烘托展览氛围，展览的部分展墙上加设了金龙和玺彩绘。京剧文物配以红墙金瓦、和玺彩绘、宫灯垂挂等辅助展具，打造出了宫廷京剧的视觉效果。观众自进入展厅，耳听丝竹雅乐，目看京剧文物，身感宫廷之韵，自然而然的对京剧产生了民族情节与亲近之感，继而激发起探索求知之欲，沉浸于京剧艺术的海洋。

第三，景观陈列与场景复原是展览中常用的艺术设计手法，它们通过再现真实环境或创造某一场景，增加艺术感染力，使观众如身临其境，做到人与景的对话，拉近展览与观众的距离。京剧展陈列设计中选取了展览的几个重要位置，运用景观陈列、场景复原等方法对展品进行展示。如通过《白蛇传》、《华容道》、《杨门女将》等场景陈列再现京剧表演场景，增加京剧表演艺术的感染力，使很多未曾看





京剧动画选段——《十五贯》

过京剧的小观众产生对京剧的好奇与喜爱，在他们心里埋下京剧艺术的种子。

第四，支架、吊线等展具的使用是衡量展览品质的因素之一。适当的展具可以衬托展品，细节的处理可以影响展览的成败。通过对展具独具匠心的设计，不仅从功能上满足展览需要，更从造型、色彩等方面突出美学效果，与展品相映成辉。以清宫升平署刀枪把子的支架设计为例，其支架为配合京剧展特色，以木材为原料，整体漆红，形制仿照兰锜式样（古代放置兵器的行架），造型为传统吉祥图案——葫芦造型，营造了“武库禁兵”之感，使京剧砌末富于真实质感。戏服展示吊线的独特设计在于使用简单别致的如意结连接吊绳和支架，一方面从美学上打破了吊绳、支架、服装三者连接的呆板局面，营造艺术美感，另一方面也恰如其分的烘托了国粹艺术的神韵，通过细节感染观众。

别具匠心的辅助展品与展具恰如其分的呼应京剧艺术大展的展览主题，衬托展览内容，完美的呈现了展览风格，营造艺术氛围，将观众带入京剧的世界，给观众难以忘怀的感官体验，引起观众共鸣，赢得观众赞誉。

（四）时尚与传统的结合，引起青少年的关注

京剧展的目标观众群中不仅包括京剧艺术爱好者，也包括对京剧了解很少甚至没有接触的青少年群体。为激发青少年群体对京剧的兴趣与喜爱，达到弘扬国粹文化，艺术普及教育的目的，在展览中引入了当今时下流行的 flash 动画、动漫短片等素材。在京剧行当和舞台表现形式部分，设计、编制了京剧行当的 flash 程序，通过新颖、奇特的导航界面，鲜明富有趣味的艺术形象传达京剧知识，同时，观众通过鼠标、触摸屏等媒介，进入 flash 动画情境，增强了观众的互动性和愉悦性。除了 flash 的设计，京剧展的另一大亮点为京剧选段动画的制作与运用。展览选取《空城计》、《霸王别姬》、《十五贯》等著名京剧唱段，绘制成动画短片，将一个个京剧角色用鲜明的动画人物表现出来，给京剧赋予时代的新气息，做到时尚与传统的融合，不仅让青少年观众兴趣大增，更是引起广大成年观众的惊叹。

一个成功的展览离不开新颖、富有特色的陈列设计，在展览中运用多种方式方法，通过独具匠心的设计，营造浓郁的艺术氛围，增强展览的感染力，从而吸引观众，启发观众，达到艺术与观众的交流和对话。

四、艺术教育与交流——展览的社会效应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艺术形式，京剧已成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京剧艺术大展展览期间，党中央、国务院给予亲切关怀和指导。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同志在视察大剧院工作后，对中国京剧艺术大展给予高度肯定，亲笔题写“京剧神韵 百代流芳”，为展览定名。

“京剧神韵 百代流芳——中国京剧艺术大展”的举办，不仅向社会公众普及京剧文化知识，传承京剧文化艺术，也向世界打开了艺术之窗，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与艺术，让世界了解中国，感受中国。

（一）京剧艺术与城市文化的契合点

展览工作者通过整合京剧艺术这一无形资源，将国粹文化通过实物、图片、模型等资源进行物化，成为有形的知识力量展现至人们眼前。为更好的为公众服务，为青、少年服务，展览主办方广泛开展社教工作，力图使展览成为京剧艺术与城市文化的契合点。

1、通过义务讲解，普及京剧文化。展览主办方通过邀请专家对讲解人员进行培训，提高讲解质量，注重讲解内容的知识性和趣味性。面对社会大众，每日提供定时免费讲解服务，普及京剧知识。

2、加强与学校和社区的联系，组织展览观摩活动。为增强青少年对京剧艺术

的兴趣，主办方为在校学生提供免费参观和讲解服务，通过展览感染青、少年群体，为其埋下京剧的种子。在京剧展展出期间，共接待青、少年学生3000余人，开展针对青、少年学生的讲解80余次。

项目汇总	测评对象	比例
观众来馆原因分析（总比重100%）	观看演出	42%
	参观剧院	33%
	专程参观展览	18%
	工作等其他原因	7%
观众年龄分析（总比重100%）	18岁以下	17%
	19-29岁	21%
	30-59岁	38%
	60岁及以上	24%
观众兴趣分析（总比重100%）	京剧等表演艺术类专业人群	17%
	京剧等表演艺术类爱好者	52%
	对京剧等表演艺术了解较少人群	24%
	对京剧等表演艺术不感兴趣人群	7%

3、邀请业内专家，举办主题活动。展览期间，主办方邀请京剧院团、院校的专家，组织开展艺术讲座、专家研讨会等主题活动，为京剧艺术研究提供媒介与服务，成为学校的第二课堂。展览期间组织京剧专题艺术讲座3次，专家研讨会3次，邀请专家20余位，参与观众800余人。

通过广泛的开展社会教育活动，京剧艺术展实现了中国非物质文化与艺术的传承和发展。根据社会公众的不同层次，提供参观讲解、艺术讲座、学术研讨等各项社教服务，并走入学校、走入社区，开展艺术普及教育，以学校和社区为基点，从基层传播京剧艺术，提高城市文化软实力。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媒介，塑造城市精神，提高广大民众的思想文化水平和文化艺术素质，陶冶人们的情操，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带动城市的建设。

（二）中西文化的交流平台

京剧艺术展在筹备之初，展览工作者发挥国家大剧院自身特色，采用中、英双语文案，邀请专业学者对展览文案进行翻译和审查，确保中英文信息的精准转化，为外国观众提供了解京剧文化、感受京剧艺术的机会与空间。

此外，展览工作者通过丰富多彩的展览实物，极具中国特色的展陈设计，专业、风趣的讲解服务，营造出浓郁的京剧艺术氛围，使海外观众通过近距离的互动与体验，亲近京剧艺术，领略京剧文化，感受京剧风姿。京剧艺术展自2008年12月21日开幕至2009年2月28日闭幕，历时70天，接待观众20余万人。其中接待青少年学生3000余人，接待外国元首、政府官员及随员200余人。

为更好的了解观众需求，提高展览质量，展览期间组织开展了观众抽样调查活动。根据500份抽样调查问卷显示如下：

通过展览满意度调查可知：对展览满意或较为满意的观众占97%，认为展览存在问题的观众占3%。良好印象主要为“展品丰富，展览设计新颖，展览动画新奇独特，知识丰富，具有民族精神，讲解服务很好”等；存在意见主要为“展板文字较小，希望有更丰富的纪念品”等。

京剧艺术展通过立意深刻的展览主题，品类丰富的展览展品，新颖独特的艺术设计，气氛浓郁的参观环境，将艺术语言灵活生动的融汇于京剧文化之中，完美诠释了京剧文化的神韵，打造出高水平的艺术展览，激发了国内外观众，尤其是青少年对京剧艺术的兴趣与热爱，引起表演艺术领域专业人士和曲艺爱好者的关注与支持，拉近艺术与观众的距离，弘扬和传承中国非物质文化和艺术，迎来社会各界的认可与好评。

（作者为国家大剧院艺术品部项目主管）

从北京大葆台西汉墓出土玉器谈汉代葬玉制度

李 伟

北京大葆台西汉墓一号墓主人为广阳顷王刘建、二号墓为刘建王后，葬制是按汉代皇帝御用最高级葬具体系建造，也就是史称“梓宫、便房、黄肠题凑”。

大葆台西汉墓规模宏大，结构复杂。该墓虽早年被盗，但墓中仍出土一批珍贵文物，其中包括近百件玉器。出土的玉器包含：玉璧、玉璜、玉象纹环、龟形玉饰、螭形玉饰、圆形玉饰、菱形玉饰片、三角形玉饰片、半弧形玉饰片、玉觿、叉形玉饰片、方形玉镂空玉饰片、椭圆形玉饰片、玉条形器、方形玉饰片、桃形玉饰片、玉佩、玉镂空舞人佩、玉鸽、玉火炬形器、玉耳塞、玉衣片等。[①]出土的玉器雕琢精细，刀法简练有力，造型精致灵巧，充分体现汉代制玉工艺的高超水平。北京大葆台西汉墓除了“黄肠题凑”和各种精美陶器、铜器、铁器、漆器等随葬器外，玉衣的玉片和玉耳塞也代表墓主人的特殊身份。大葆台汉墓发现也印证了汉代厚葬之风盛行以及葬玉制度日趋完善。

西汉早期，由于经过连年战乱，民生凋敝，经济贫困，文献记载：“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②]“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③]这也反映当时社会经济不是十分富裕。“文景之治”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中央集权统治力量的加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家，在继承和发扬了“君子贵玉”的儒家思想的同时，还提倡儒家的孝道等伦理道德，从而导致厚葬的习俗流行。这一时期，虽然中央王权已经巩固，社会经济得到复苏，玉料虽然比以前多，但与这个时期盛行崇尚玉风气相比，玉料仍显得非常珍稀。汉代玉器除了具有“保尸”的神秘性和礼仪的庄严外，同时还有显示地位、权力、财富的功能。于是王室贵族们想尽办法占有尽可能多的玉器作为其追求目标。古人认为死人的灵魂也像活着的人一样，只是不在同一个世界里罢了。因此，王室贵族们即使死了，也要享受活着时候的生活。汉代提倡厚葬，并且逐步制定了较为完备的丧葬制度，这种丧葬制度一直延续到曹魏时期，曹操本人坚决反对厚葬，提倡薄葬。曹操的儿子、魏文帝曹丕更是认为天下动荡不安，“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是焚如之刑”，祸皆起于“厚葬封树”，曹丕于黄初三年（222 年）废除了葬玉制度。[④]

葬玉一名为“保护尸体的玉”，在汉墓中颇为普遍，葬玉主要包含四种：玉衣、玉塞、玉琀（多作蝉形）和玉握（璜形或猪形），而不是泛指一切埋葬在墓中的玉器。

“玉衣”之名，始见于《汉书》，又称玉押或玉匣。汉代葬玉制度中最重要的是玉衣的使用，玉衣是汉代皇帝、王室成员和高级贵族死后使用的殓服。这种玉衣制度可以溯源于东周时代“缀玉面幕”和缀玉片的衣服。但是成为真正的“金缕玉衣”，从现有资料看应始于景帝末年或武帝初年（公元前 2 世纪中叶）。目前我国从汉墓里出土玉衣及有玉衣片的墓已经有

几十座，魏文帝黄初三年，因曹丕下诏禁用玉衣的缘故，以后墓葬就不再见到了。

玉衣的外观与真人的体形相同，就其部位言之，可分为头罩、上身、袖子、手套、裤筒和鞋子六部分。每部分又由两部件组成，各部件都是由小玉片缀成，编缀用纤细的金属线缕。一件玉衣的玉片总数达 2000 多片，这些玉片一般要作成长方形或方形，四角都有细孔，便于编缀，特殊部位则用梯形、三角形或多边形的玉片。

汉代早期的玉衣以临沂刘疵墓中玉衣为例，刘疵的玉衣只有头罩、手套和鞋子，没有上身、袖子和裤筒，这可能是早期玉衣的形式。现在发现的西汉早期有玉衣的墓除了临沂刘疵墓外，还有徐州北洞山楚王墓、咸阳杨家湾 4 号和 5 号汉墓以及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图 1）。这些早期汉墓出土的玉衣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玉衣片多为长方形、方形、凸字形，鱼鳞甲的甲片状玉片也有少量出现；二是缕线多为金缕，但也有用银缕、丝缕；三是玉衣只有头部、双手双足五个部分，有的是这五部分的玉片质量比其它部分的好；四是玉衣编缀方式多数与铠甲中的札甲相似，只有个别玉衣编缀方式类似鱼鳞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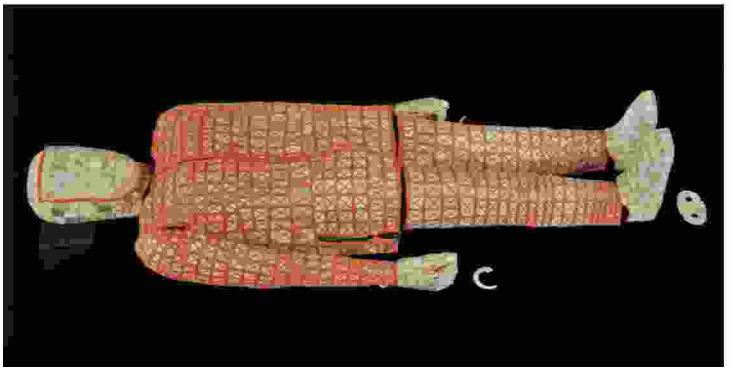


图 1　广州市象岗山南越王墓出土的玉衣

“金缕玉衣”的真正成熟应是在景帝末年或武帝初年（公元前 2 世纪中叶）。因为经过“文景之治”，到了武帝初年，汉王朝通过 70 多年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统治阶级的生活日益淫侈腐化，以至于“土木衣绮绣，狗马被缋罽”，“兴造甲乙之帐，落以随珠和璧”。生前穷奢极欲，死后则实行厚葬。因此玉衣的出现可能在文景时期，而封建贵族以玉衣作为殓服应是武帝时期开始盛行。西汉对玉衣的使用还没有明确规定，诸侯、列侯都可以使用“金缕玉衣”。东汉才对玉衣建立了严格的使用制度。根据《后汉书·礼仪志》记载，皇帝死后使用金缕玉衣，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使用银缕玉衣，大贵人、长公主使用铜缕玉衣。这些在汉墓出土的玉衣上有所体现。据考古资料所知，西汉墓出土较为完整的金缕玉衣有五套，诸侯王三套，即中山靖王与中山孝王刘兴；另外两套属于列侯（刘疵和刘迁）。这说明西汉时期能使用金缕玉衣的不只皇帝。在发现的东汉墓中出土的玉衣能确定的只有银缕玉衣、铜缕玉衣两种，而没有发现金缕玉衣。银缕玉衣分别属于诸侯王中山简王刘焉、中山穆王刘畅等。铜缕玉衣属于嗣位的侯以及诸侯王、列侯的妻子死后使用。现在还未发现东汉皇帝的墓葬，因此也没有发现东汉时期的“金缕玉衣”，由此也可以看出东汉时期对玉衣的使用已经有了明确的使用制度。

玉衣是由许多小的玉构件经过金属缕组合而成，因此对工艺技术要求非常高，由于体积较大，结构复杂，制作繁琐，并非一般的小作坊都能制作。根据文献记载，玉衣由中央朝廷的手工业作坊统一制作，皇帝把它赐给各地的诸侯王及朝中受宠幸的大臣。当时中央专门设置了一个制作丧葬品的机构，称为东园匠，[15]制作玉衣就是在此机构的监督下。玉衣的制作是一个非常复杂和繁琐的过程，首先要按照人体比例进行精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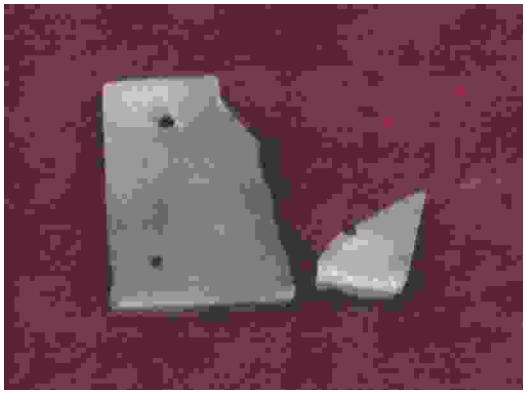


图 2　大葆台汉墓出土的玉衣玉片

设计，然后把所要用的玉材经过开料、锯片、磨光及钻孔等工序加工成玉片，再穿丝成衣。玉衣是有 2000 多玉片组成，每一片玉片的大小、形状和打孔的位置都必须经过精心的设计和细致的加工，如果有一片玉片不合要求，有丝毫的误差，玉衣便会鼓凸不平或根本无法缀结，因此制作玉衣需要有高超的工艺技术水平。如：北京大葆台西汉墓出土的玉衣片，其玉质为白玉，形状是长方扁平状，残留的玉片两角各单面钻有一小圆孔，玉片的边缘磨成斜坡状，虽然只是玉片，但做得非常精细（图 2）。玉衣的整个制作过程所花费的人力和物力相当惊人，当时制作一件玉衣约需一名玉工匠耗费十余年的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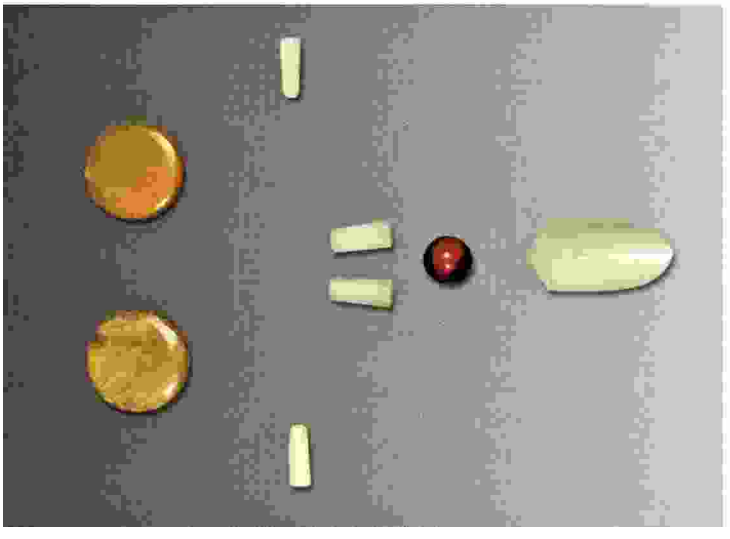


图 3　安徽天长汉墓群出土的玉双眼塞（眼盖）、玉双耳塞、玉双鼻塞、玉口塞

玉塞是指堵塞或遮盖死者九窍孔的玉器。它分别由双眼塞（眼盖）、双耳塞、双鼻塞、口塞（图 3）、肛门塞和生殖器塞等九件玉器组成，又称九窍塞。葛洪在《抱朴子》中曰“金玉在九窍，则死者为之不朽”。古人认为堵住这“九窍”，可以防止人体内的精气外逸而使尸体不朽，玉塞的作用就是防止精气由体内逸出，从而达到保护尸体的目的。由于玉塞并不是起美观作用的装饰品，所以大多制作得较为简单，双眼塞（眼盖）多作椭圆形或杏叶形；耳塞、鼻塞和肛门塞则作成圆柱形，



图 4　大葆台汉墓出土的玉耳塞

并且一头大另一头小，如：北京大葆台西汉墓出土的玉耳塞，长 2.7 厘米、直径 0.5—0.9 厘米（图 4），其玉质为白玉，一头大一头小，大头顶端为平面，小头为半圆形，截面呈圆形，虽然素面无纹饰，但表面光滑圆润，做工精细。耳塞也有作成八棱柱形的；生殖器塞做成圆筒状，系用玉琮改制而成，上端加盖封闭；玉塞中所说的口塞并不等于含玉。如：满城汉墓出土的两件口塞，均为新月状，内侧都有三角形或方形的凸起，其中一件外侧也有凸起，在使用时只将内侧的一部分放入口中，外侧和两端在口外，它与含玉是有区别的。[6]

玉琀是死者含在口中的玉制品，其造型有玉蝉、玉珠、玉管、玉玦、玉片等。《周礼·天官·王府》载：“大丧，共含玉。”据目前考古资料所知，这种习俗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出现，但到了汉代，蝉形玉琀占主流。古人将玉蝉放入死者的口中，以求精神不死或企望生命的复活，汉代人以玉蝉为含，有着深刻的寓意。古人认为蝉的生理习性为蜕壳再生，也就是蝉蜕。《史记·屈原传》：“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以蝉蜕比喻超尘脱俗的清洁高尚。《抱朴子·论仙》：“下士先死后蜕，谓之尸解仙。”就是说人们生时以蝉蜕自命清高，死后希望借之尸解成仙。另外，蝉蜕再生也是比作生命的延续。《古今注·问答释义》中有齐王死后尸变蝉而鸣的神话故事。《酉阳杂俎·虫篇》：“蝉，未蜕时名复育。”复育即为再生。用玉蝉是为了让死者生命复归，蝉虫虽生时不过百日，但其鸣声悠扬，常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人生苦短，生前祈求长寿，死后希望以蝉鸣代言，以玉蝉为玉琀，是汉代人们对生命的复现、灵魂永生的精神寄托。

汉代蝉形玉琀的制作与其他朝代不同，这个时期的蝉形玉琀一般玉质选材较好，多用白玉和青玉制作，器型呈片状，边沿薄，中心稍厚，用几条简单而粗犷有力的直线和弧线来表达蝉的各个部位，刀法看似简单，但用刀利落并且刀刀见锋，故后人称此时期玉器制作工艺为“汉八刀”。玉蝉并非全部用作含，也有佩戴在身上以求长生，这种玉蝉顶部有孔，用来系绳佩戴。还有一种玉蝉首、尾、腹部都有孔，它应该是缀在帽子上的玉饰，称其为冠蝉。

玉握是死者手中所把握的玉器，早在殷商时期的墓中就发现死者口中含贝、双手握贝的现象，而贝在当时就是财富的象征。手握发展到汉代时，死者手中所握之物比以前精美规整，并且以玉为主。西汉时期使用的玉握有几种不同器形。如：中山王刘胜和其妻窦绾的玉握，他们两人手里握的分别是夔龙蒲纹玉璧和凤鸟蒲纹玉璧改制成的璜形玉握。另一种玉握是龙形觿，如：南越王赵昧的玉握就是两件略有差异的龙形玉觿。还有一种玉握也是最为常见猪形玉握。如：徐州奎山汉墓所出的两件玉握就雕琢十分简单，外形似猪状，这应为以后猪形玉握的雏形。西汉中期以后猪形玉握开始流行，东汉时期猪形玉握逐渐占据主流，东汉猪形玉握造型简练，而且较为规范。如：河北定县北庄汉墓出土的猪形玉握就具有代表性，它长 10.3 厘米、宽 2.3 厘米、高 2.8 厘米，玉材为新疆和田白玉，器型表现为圆雕形式，做俯卧状，周身无任何装饰，仅仅用几道宽阴刻线就表现出猪的双耳、四肢等部位的轮廓。而腹部、嘴及尾部均随形琢为平面。[⑦] 东汉晚期，猪形玉握逐步转向写实，头部、四肢及额前的皱纹都刻划得比较具体而真实。

总之，葬玉是汉代玉器中极富特色的一类，以其品类多样，造型繁复，用法不一为新特点，将中国传统的葬玉，发展到了空前绝后的顶峰。

---

① 大葆台汉墓发掘组：《北京大葆台汉墓》，文物出版社，1989 年，第 46-50 页，70-72 页。

②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73 年，第 1417 页。

③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73 年，第 433 页。

④ 杨伯达主编：《中国玉器全集》，河北美术出版社，2005 年，第 823 页。

⑤ 古方主编：《中国古玉器图典》，文物出版社，2007 年，第 5 页。

⑥ 常素霞主编：《中国玉器发展史》，科学出版社，2009 年，第 209 页。

⑦ 杨伯达主编：《中国玉器全集》，河北美术出版社，2005 年，第 398 页。

（作者为河南省文物交流中心馆员）

金代韩景□神道碑考释

孙建权

2003年5月，北京市五环路丰台段施工过程中，在卢沟桥与宛平县城间出土了一方辽韩延徽家族（金）韩□□墓神道碑。碑已残毁，仅存下半部，碑文约1840字。陈康先生介绍了此碑的出土情况：“碑原应是在石景山区八宝山革命公墓内，公墓原址是辽政事令、鲁国公韩延徽家族墓地。这方韩公神道碑何时被充作修固永定河护堤石料运到丰台，情况不详”[①]，并推测此碑年代为金海陵王天德年之后，同时说：“丰台出土的残碑缺失上半截，墓主名字已失，单从文字来看，碑主韩公应是韩延徽的八世孙，韩倬的六世孙，高祖韩绍文，曾祖韩造，祖为资字辈，父韩诩。……韩诩之子应为景字辈，韩公是韩景□。”即，墓主的世系为：韩延徽→韩德邻→韩倬→韩绍文→韩造→韩资□→韩诩→韩景□[②]。随后，陈先生对该碑的发现作了如下评价：“韩景□神道碑出土，一为幸甚，一为惋惜，他是已出土的韩延徽氏中官阶最高、时代最晚的，可补史之不足，可惜的是碑已成残碑，又身在异乡，终不能得其全部，为研究韩延徽家族留下了遗憾。”

笔者以为，该碑文虽已残缺不全，但毕竟记录了韩某的一生事迹，对研究金史、韩延徽家族来言，仍是一份宝贵的材料。本文结合传世文献及其他考古资料，对此碑文[③]作一初步考释。不当之处，还请各位学者批评指正。

一、韩某家世、官爵

韩某是韩延徽的后代中在金朝官位最显赫者，官至三品，爵至从三品。

（一）家世

韩延徽后代，除韩某之外，迄今已有韩佚、韩资道、韩诉三人的墓志出土。据《北京出土辽韩资道墓志》[④]可知，韩资道曾祖为韩倬，辽兴军节度使，累赠至中书令；祖父为韩绍文，守太子太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鲁国公致仕；父韩造，诸宫制置使、

检校太尉；母张氏，辽司徒兼中书令张克恭之女。资道为造之长子。资道妻琅琊王氏；子五人，长曰迎恩奴，次三子早亡，次尚幼。另据韩诉墓志[5]，韩诉（韩资懿子，资道侄）有四子：景彰、景隆、景庄、景修，孙四人：汶、淑、汴、洙。韩某神道碑介绍其世系如下：

奉直大夫、翰林待□□同知知制诰、上骑都尉、河南□开国子、食邑五百户、赐紫金鱼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平章生侍中倬公，赠侍中。侍中生绍文，太子太师，鲁国公，资□公生造，太子太保、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致仕。公即诩之次子也。公既贵，赠诩宣威将军。曾祖妣张氏，追封岐国太夫人。祖妣王氏，妣张氏、王氏，皆赠南阳郡太夫人。

对照其他已发掘的韩氏墓志，可推知韩某的高祖为韩绍文，曾祖为韩造，曾祖母为张氏，祖父为韩资某，祖母为王氏，父为韩诩。另外，《王师儒墓志铭》云：“夫人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三司使事兼赠中书令韩造之女，以公累封丰国夫人。”[6]则韩造在世时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三司使事，死后赠中书令。因为韩造在长子韩资道死时（1069 年）仍在世[7]，所以《韩资道墓志》中不曾提及韩造取得的最高官职。碑文载韩造为太子太保、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可补《王师儒墓志铭》中失载的韩造（追赠）官职——太子太保，亦可补《辽代汉臣世系表》及《辽代汉臣世系表补正》之不足。

（二）妻子、后代

碑文说韩某妻子是“□之甲族”，“累封南阳郡夫人”。韩某有六子：湛、淳、深、激、温，另一子名脱失[8]。韩湛、韩淳皆“举进士业”；韩激“祇候内承奉班、监苏门河平县早生镇酒税，卒于官”；韩温为敦武校尉（从八品下）、监涿州税，病卒。另有两个女儿。子韩深有二子，“伯”字辈，一子名伯益，祇候承奉班、知潞王府印。“知潞王府印”一职，《金史》不载，仅在《黄掴九住传》中提及“潞王府司马”。韩某有曾孙一人，合喜；孙女五人，长早逝，次出家为尼，次嫁辅国上将军某人。

（三）封爵、铭文

碑文末尾注明了韩某最终取得的爵位：辅国上将军（从三品中[9]），爵至开国侯、食邑至一千户、实封至一百户，于是“宜有墓隧之碑”。铭文则大致概括了韩某一生事迹，其中有不少文字还可以和碑文所记相印证，价值很高。如：

1、“副节济平”，可和韩某曾任利涉军（济州）节度副使、兴平军（平州）节度使（详见下文）相印证。

2、“天都肇建，百甲寔□。日受万计，日□□□。”可和韩某在天德三年（1151 年）张浩营缮燕京之时负责统筹财政支出（详见下文）相印证。

二、韩某仕途

辽朝末年，韩某弱冠出仕，为辽阎门祇候，特授左承制。辽亡降金。在金朝经太祖、太宗、熙宗、海陵王四朝，历任六宅使、明威将军、振威将军、利涉军节度副使、宣威将军、兴平军节度使、济南尹、延安尹、知河北西路兵马都总管府事。海陵王已除其为户部尚书，不料除命已下，人已卒。下面依据碑文，详细考释韩某的仕途。

（一）辽末入仕降金

韩某作为辽名臣韩延徽之后，在辽季兵荒马乱的年代，通过追随辽帝入仕，辽亡后降金：

纷扰于天庆间。祇候阎门，特授左承制。及……宋二主归命，朝廷选阎门祇候能干者十余人护视西北，公皆预焉。二主尝出珠王（玉）[10]纨绮遣□□公不受，公益礼之……任使。皇统初，考叙前绩，自六宅超授明威将军，累迁振威，授利涉军节度副使。至明具疑狱滞讼，即请于守，愿□心剖吏……□郡用宁。公日步簿书□□所堪以均赋役，而人不困。断治明察，吏

不得民一钱。

辽天庆四年（1114年），女真人起兵反辽。辽军在新兴的女真军队面前节节败退，士兵败后多四散奔逃，少数依然追随辽帝者，多获封官。如辽季大臣刘彦宗之子刘筈，“辽末调兵，而筈在选中。辽兵败，左右多散亡，乃选筈为扈从，授左承制”[11]。韩某无疑也是此类人，“纷扰于天庆间，祗候闶门，特授左承制”。辽亡后，韩某归金。刘、韩二人的经历反映了辽末金初某些辽地士人的入仕途径，出土文献可和传世文献互相印证。

天会五年（1127年），金灭北宋，俘虏宋徽、钦二帝，韩某曾作为闶门祗候监视宋二帝北上，并曾拒绝宋帝的贿赂。这段记载，为我们展现了徽、钦二帝被俘北上路途中的一个细节。此后韩某仕途因碑文脱失而不明，仅知做过六宅使。皇统年间（1141-1149年），韩某得到升迁，自六宅使迁明威将军、振威[12]（将军）。后出任利涉军（济州[13]）节度副使，除冤狱，政绩斐然。

（二）任兴平军节度使

韩某利涉军节度副使秩满后，迁宣威将军，擢为兴平军（平州）节度使：

岁且满，累迁宣威将军，授兴平军节度使……竟夕，一境沾足，民德之。一□待玉牒近属。方□熙宗时，宗臣作牧，挟贵专忍，嗜驰猎不以时。方春，州县承帖拘马数百……喻遣之，守惧，为之止。公尝察州县吏修废。时海山令贪纵不法，令方以事诣州，公曰：“汝职废久矣。”悉条其□□□宜以□……州县吏之奸者，杖而去之。县民佥口（曰）：“公神明也。”复按滦州同知取财，方鞫之时，僚属交议，以为暴刻。公曰（曰？）月浸月积，而民……守倾毁，举不能有所指，惟公痛裁节之，畏公廉毅，而亦莫之毁也。平人赖以纾。后遂以为例。及罢将去，郡者幼相扶携。嗟……

此段碑文涉及了金朝的养马制度。金初，具体的养马制度为：“每于逐年四月，尽括官私战马，逐水草牧放，号曰‘入淀’（淀乃不耕之地，美水草之处，其地虚旷宜马），入淀之后，禁人乘骑，八月末，各令取马出淀，饲以粟豆，准备战斗。”[14]依此可知，金初的养马方式为：官方在初夏统一收养官私战马，至仲秋时分出“淀”，准备投入战斗；马匹在入淀之后，“禁人乘骑”。但平州地区的金朝宗族大臣违反规定，强迫平州州县守臣拘括数百匹马供自己娱乐，因此韩某出面处理此事。这段碑文可以作为金初马政的金方史料，与南宋吕颐浩的见闻形成互证。此外，韩某在任上还处置了海山令和滦州同知等不法官吏。

（三）判济南尹

韩某离开平州后，改任某地官员：

以赀雄里中，居母丧，饮酒□纵，遇二宿奸，逼取银三百两，莫有知者。公察系逼银者，侍狱之一人欵（款）伏，银遽超护。公戒……激溢河流，下接堤岸不支，民居将汤没。公乘舟相河之势，率民当完者完之，冲泛风涛，出九死而不顾，忘食息，水以平时……□汤。阳起石贡余，例为府僚分有之。公曰：“为吏以俸廪足食于家，可纵其贪耶？”悉入官，以助经费。时廉访使周行天下，距……第一。民皆曰：“复得公，民其安矣！”皆奔走歌呼，惟恐其别有除命也。公益扫除变更，兴起法度，使百姓安便之……大将军既代，府民遮恋，尤甚于去平时也。未几，授同知延安尹兼鄜延路兵马都总管府事，未之任。

因此处碑文残缺，韩某任职的具体地名失载，但凭借蛛丝马迹，仍可考出。

按，“阳起石”，乃中药名[15]，初见于唐朝，孙思邈《千金翼方》有载[16]。迨至北宋，阳起石成为朝廷贡品，《太平寰宇记》卷十九《河南道》“齐州”条曰：“齐州济南郡，……土产：绵、绢、丝、葛，今贡阳起石。”按，北宋齐州即金朝济南府。另，《文献通考》“齐州”条：“齐州 ……政和六年，升为济南府，兴国

军节度。齐当天中，由腹齐也。建炎二年，守逆豫以州降金，没於金。金隶山东东路。嘉定十三年，伪守王斌以城来降，旋复失。贡绵、绢、阳起石、防风。”[17]马端临也说阳起石是齐州的贡品。值得注意的是，查《太平寰宇记》、《文献通考》二书，“阳起石”词条仅见于以上二处，由此可以断定阳起石为济南府的独有贡品。金人元好问《济南行记》也云：“凡北渚亭所见西北孤峰五，曰匡山，……曰药山，以阳起石得名。”[18]元好问游济南府，见到济南府有一“药山”，因阳起石得名，可见在金朝，阳起石仍旧为济南府药山特产，用来进贡宫廷亦可想而知。

综上，阳起石是宋金时期济南府（齐州）向朝廷进贡的独有物品。由此可推断韩某在此期间是在济南府任职。因为此前韩某是任兴平军节度使（从三品[19]），故他在济南府的职位应略高于此，是济南尹（正三品[20]）的可能性很大[21]。而碑文所言河患之“河”，指的当是济南府附近的黄河下游的北分支——“北清河”[22]。此外，碑文提到的“大将军既代，府民遮恋”亦可佐证韩某任职于某“府”。

碑文记录了金朝济南府进贡阳起石的情况，为我们提供了金朝地方进贡制度方面的可贵材料。另外，《金史·河渠志》记载的黄河水患始于大定八年（1168年），对此前的黄河水患则缺乏记录，而此段碑文记录了大约在天德时（天德年间：1149–1153年）的一次黄河下游水患，可补正史之不足。

韩某任上处理民事诉讼，治理水患，整顿吏治。离职后，金廷改命他同知延安尹兼鄜延路兵马都总管府事，未赴任。

（四）参与营建中都

韩某离开济南未赴陕西上任的原因，或许是因为中都的兴建：

天德三年，太师南……首历是选。日视出纳，百用繁浩，至于亿计。公心术明敏，服劳不倦，事无巨细，皆躬亲而办，仍僻州佐县令谨廉者十余……召上殿。海陵面喻曰：“朕曩者皇统间常过济州，一识卿面，尔后稔闻卿政誉，朕甚嘉之。”

天德三年（1151年），海陵王下令扩建燕京，作迁都的准备。尚书右丞张浩（大定二年进封太师）奉命前往督工。碑文中“天德三年，太师南……”即指张浩南下筹划营建中都之事。因此段碑文有缺，故已不知韩某在何处任职、任何职。从残余碑文来看，韩某此时当参与了营建中都一事，可能任职于燕京，其职责是管理财政，统筹购买修建燕京所需物料。至于“首历是选”，可能是张浩在修建中都时，选拔四方能吏，群策群力，以期尽快完成修建任务。《金史·张浩传》云：“天德三年，广燕京城，营建宫室。浩与燕京留守刘筈、大名尹卢彦伦监护工作，命浩就拟差除。”韩某以出色的能力当选，事后得到了海陵王的召见与嘉奖。

（五）出镇鄜延路

碑文上曾提及：“授同知延安尹兼鄜延路兵马都总管府事。未之任。”在燕京修建完毕后，韩某即赴延安府任职：

鄜延总尹纯质留人不炼事，以……遇。既之任，事皆决于公。初，夏人以数万众入寇，过塞门寨，侵扰边户。咸兵屡出，不能却目，颇为患。公□移檄忧人一日……□皆敛色屏气。公从容喻之曰：“汝幽遐小邦，受上国封建，岁有贡赐，当□固疆场，遵守臣职，今乃恣为不逞，以尺□……一介问罪，汝国其将何辞以对！”渠师耸然服罪，诉以追访失马。上比咸恐惧请命，宜却兵三十里。公悉驻列城堡，诸……

碑文记录了韩某在延安府的作为。时西夏每以数万人侵塞门寨，金边将不能却。韩某到任后，晓之利害，为罢兵。“塞门寨”，《金史》不载。查《宋史》，塞门寨为北宋与西夏边界重镇，属战事频发之地。又据《续资治通鉴长编》[23]，可知塞门寨位于北宋延州（后属金延安府）境内，毗邻西夏。

金夏宗藩关系在建立伊始便埋有隐患，

双方互相猜忌。金夏在贸易、礼仪、领土等方面的争端此起彼伏。但传世文献在叙述海陵王时期的金夏关系时，并未提到双方有军事冲突，而碑文云海陵王在位时（大约在贞元年间：1153-1156年）西夏屡屡寇边，此事《金史》无载，可补正史之不足。

（六）知河北西路兵马都总管府事

韩某结束延安府任期，调至中都"近地"供职：

□比（北）西路兵马都总管府事。使喻海陵旨曰："延安政成，皆替□之力，今移汝近地，以待殊擢。"公附谢曰：臣待罪巨藩……□□十日，逾旬，许人告捕给赏，仍削官杖之停罢。留者处□方赞皇令子婿到县□告留过期者，公骇然谓其人曰……子婿，面质其罪。公曰："汝祖父生之前，然所出非嫡，命立不明。其人常侍汝祖父，既而有出，宁得为婢？邦□当优礼嫁……□不预签署。公曰："少尹无一铢之罚，公坐何不预焉？"始有悖语。公甜然不为较也，府帅为改悔。会宋国贺生辰使……□□宴，以严饰见□大夫，士皆以为宜。方京师阙馈饷，以公驰传发运河北东西路廪粟，始议取民物力均以陆运……□不阙，民用不扰。

碑文中"比西路兵马都总管府事"，误，应为"（河）北西路兵马都总管府事"。遍查《金史》，涉及"西路兵马都总管"者有二：一为山东西路，一为河北西路，前者置于山东西路东平府。至于后者，《金史·地理志中》"真定府"条云："真定府，上，总管府，成德军。宋常山郡镇州成德军节度，正隆间依旧次府，置本路兵马都总管府、转运司。"据此可知金朝一般以真定尹（或同知真定尹）兼河北西路兵马都总管府事[24]。则韩某应该就在真定府供职。除此之外，碑文下文提到的海陵王圣旨——"今移汝近地，以待殊擢"，因为河北西路恰好紧邻中都，亦足资考证。另外，海陵王在正隆间（1156-1161年）始置河北西路兵马都总管府这一史实，也说明韩某任河北西路兵马都总管府事之时在正隆年间。

碑文下文所提"赞皇"，系一县名，位于河北西路沃州境内[25]。这段碑文叙述之事因碑文残缺严重，已无法考释。从今存文字看，似乎涉及到奴婢与贵族生子后，其身份不再为奴婢的问题。姑存之以俟高明。

下文"会宋国贺生辰使……宴，以严饰见……，士皆以为宜"，叙述的当是南宋贺海陵王龙兴节[26]之使臣，路过真定府，金朝官方设宴款待一事。按，金朝迎接宋使，仅在南京开封府、真定府两地设专宴款待之。宋使在这两个地方也驻留得稍久些（普遍在三日左右）[27]。在真定府，有过以同知真定尹负责押宴的例子[28]，所以，韩某或许就是以真定尹或同知真定尹的身份押宴。这段碑文可作为金方史料与宋人笔记史料互证这一史实。

中都在海陵王贞元元年（1153年）成为金朝首都。为充实京师户口，平章政事张浩建议"凡四方之民欲居中都者，给复十年，以实京城"[29]，海陵王从之。自此中都人口猛增。据《金史·地理志上》记载，中都大兴府共有"户二十二万五千五百九十二"，若以每户五口人计算，俨然是一座拥有百万人口的大都市。《地理志》所载人口数虽系金朝极盛时期的数字，但海陵王迁都燕京后带来的中都人口膨胀是确切无疑的。[30]

随着人口的急剧增多，中都的粮食供给问题也日益凸显。大定三年（1163年），金世宗对宰臣说："京师之用甚大，所须之储，其敕户部宜急为计。"[31]人口如此之众，一旦中都发生自然灾害，粮食供给便会成大问题。如承安元年（1196年）中都干旱，"百姓艰食，诏出仓粟十万石减价以粜之"。[32]

同样，正隆二年（1157年）秋，"中都、山东、河东蝗"[33]。因海陵王生辰在正月十六日，而正隆三年六月，又有飞蝗入京师[34]，那么很可能在正隆二、三年之交，

中都因蝗灾而发生了粮食供应问题。由于山东、河东也均受蝗灾影响，所以海陵王只得下令调拨河北两路所收粮食救急。韩某于是奉诏发运河北东西两路存粮入京师，有效地缓解了中都的粮食供应压力，于是“始议取民物力均以陆运”来保障中都的粮食供给。此系中都粮食供应方面的史料，可补正史之不足。

三、其他问题

（一）韩某的生卒年

1、生年

铭文中说他“弱冠筮仕”。“弱冠”，古人二十或二十来岁之称。联系以上碑文“纷扰于天庆间，祇候闶门，特授左承制”，可知韩某辽天祚帝天庆纷扰之际（1114[95]–1119 年）开始做官——闶门祇候。若以“弱冠”为二十岁，则可推测韩某生年在1094–1099 年之间。

2、卒年

韩某在任职知河北西路兵马都总管府事时，得到了海陵王的重视。海陵王已下诏升韩某为户部尚书，命已下，韩某病逝：

未几，海陵议公材干，不可以秩次外用，大臣亦荐公不可弃之于外，将以户部尚书授公。命已（已）……口岁六月甲申，葬大兴府宛平县房仙乡鲁郭里，从先域也。

碑文脱去其去世之岁，仅交代“六月甲申”下葬。但依据上文推断，中都乏粮在正隆三年，而“未几”韩某即逝世，那么韩某的离世时间在正隆三年末至正隆四年春，大概是不错的。考虑到正隆三年时韩某尚为中都运送粮食，故笔者更倾向其卒于正隆四年。

综上，韩某生于 1094–1099 年之间，卒于正隆四年（1159 年），享年 60–65 岁。

（二）韩某下葬祖茔的时间

上节已经提及韩某下葬祖茔的月份——某岁六月甲申，而下葬地点在大兴府宛平县房仙乡鲁郭里，与韩佚、韩资道、韩诉相同。因正隆三年、五年、六年六月均无甲申日[96]，则韩某下葬必不在此三年。正隆四年六月是有甲申日的，且为初一，那么是否可以推断韩某死于正隆四年、葬于正隆四年六月呢？似乎可以下此结论，但还有其他因素需要考虑。鉴于韩佚、韩资道、韩诉的去世时间与葬于祖茔的时间间隔都不同[97]，所以我们目前尚无法确定韩某下葬祖茔的具体年份。正隆四年六月，可备一说。

（三）神道碑的撰写时间

碑文尾段在介绍韩某儿子韩激时，云：“曰激，祇候内承奉班、监苏门河平县早生镇酒税，卒于官。”碑文提到了“苏门河平县早生镇”地名。考《金史·地理志中》“卫州”条：“苏门本共城，大定二十九年改为河平，避显宗讳也。明昌三年改为今名。贞祐三年九月升为辉州，兴定四年置山阳县隶焉。有白鹿山、天门山、淇水、百门陂。镇一早生。”即“苏门”在金章宗明昌三年（1192 年）开始，取代“河平”一名，则此神道碑的撰写时间也必然是在明昌三年以后。至于碑文将“苏门”与“河平”并列，或系改名后，人们仍旧沿用旧名，因此顺便一提。《辽代石刻文续编》、《金代石刻辑校》分别将此神道碑系于“天德之后”、“大定年间”[98]，而此碑实立于明昌三年以后。

---

① 陈康：《丰台出土辽韩氏家族墓神道碑》，《北京文博》2003 年第 3 期，第 66–69 页。

② “韩景□”，下文正文中皆以“韩某”代称。

③ 按，此残碑碑文，陈康《丰台出土辽韩氏家族墓神道碑》有录。

④⑦ 鲁琪：《北京出土辽韩资道墓志》，《文物资料丛刊》1978 年第 2 期，第 176–179 页。

⑤ 齐心：《金代韩诉墓志考》，《考古》1984 年第 8 期，第 752–758 页。

⑥ 陈述辑校：《全辽文》卷十《王师儒墓志铭》，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292 页。

⑧ 陈康先生认为“韩景□子六人，残碑上刻湛、凉（淳）、激、温及二女”，大概是忽略了碑文中提到的“深二子也”四字。

⑨《金史》卷五十五《百官志一·六部条》：“从三品上曰奉国上将军，中曰辅国上将军，下曰镇国上将军。”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221页。

⑩ 凡见碑文中讹误之字，笔者在其后以“（）”标明正字。

⑪ 《金史》卷七十八《刘筈传》，第1771页。

⑫ “振威将军”官衔，亦见于《韩诉墓志铭》和《石宗璧墓志铭》，《金史·百官志》不载。疑系金初有之，后易名。

⑬ 济州，大定二十九年更名为隆州。见《金史》卷二十四《地理志上》，第552页。

⑭（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七十六，引《吕丞相颐浩奏对十论劄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274页。

⑮（明）李时珍：《本草纲目》石部第十卷《石之四·阳起石》，中医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53页。

⑯（唐）孙思邈：《千金翼方》卷二。

⑰（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百十七《舆地考三》。

⑱（金）元好问：《遗山集》，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版，第402页。

⑲《金史》卷五十七《百官志三》，第1311页。

⑳《金史》卷五十七《百官志三》，第1310页。

㉑ 按，《金史·地理志中》云：“济南府，散，上。宋齐州济南郡。初置兴德军节度使，后置尹，置山东东西路提刑司。”（《金史》卷二十五，第611页）《志》云济南府长官为“尹”。但遍查《金史》，济南府长官之称，有“济南尹”和“知济南府事”两种。今依《金史·地理志》。

㉒ 具体参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54-55页。

㉓（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九《仁宗》，康定元年十一月戊午条：“赠延州塞门寨主内殿承制高延德为慈州团练使。”

㉔《金史》卷七十九《张中彦传》、卷八十七《仆散忠义传》亦载张中彦、仆散忠义二人曾以真定尹、同知真定尹兼河北西路兵马都总管，第1790页、第1935页。

㉕《金史》卷二十五《地理志中》，第604页。

㉖ 海陵王圣节名称，《金史》不书，但郑麟趾《高丽史》中却有载，为“龙兴节”。周峰：《金代的圣节》，《北方文物》2002年第4期，第53-56页。

㉗（宋）程卓：《使金录》，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碧琳琅馆丛书本；（宋）楼钥：《攻媿集·北行日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宋）范成大：《揽辔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

㉘ 如楼钥随其舅父汪大猷使金贺正旦，在返回路过真定府时，便由“同知真定尹田钟吉押宴”。

㉙《金史》卷八十三《张浩传》，第1863页。

㉚ 葛剑雄主编：《中国人口史·辽宋金元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86页）认为金代中都人口在泰和七年共6.2万户，约40万，太少，疑误，今不取。

㉛《金史》卷五十《食货志五·和籴》，第1117页。

㉜《金史》卷十《章宗二》，第239页。

㉝《金史》卷五《海陵纪》，第108页。

㉞ 同上。按《金史·五行志》载“正隆二年六月壬辰，蝗飞入京师”，误，正隆二年六月并无壬辰日。

㉟ 按，“天庆”年号一共十年，1111-1120年。缘完颜阿骨打于1114年起兵，故从此开始算起。

㊱ 陈垣：《二十史朔闰表》，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137-138页。

㊲ 据三者墓志，韩佚统和十三年六月一日终于平州寝第，丁酉岁（统和十五年）五月九日葬于幽都县房仙乡鲁郭里之西原，期间相隔两年；韩资道咸雍五年二月十二日终于燕京北罗坊之私第，同年五月九日葬于宛平县房仙乡鲁郭里，期间相隔仅三个月，系同年下葬；韩诉天德二年正月十四日终于应州私第，正隆二年夏五月，葬于乡之先茔，期间相隔七年之久。

㊳ 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辽代石刻文续编》，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67页。王新英：《金代石刻辑校》，吉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7页。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2010级中古史博士研究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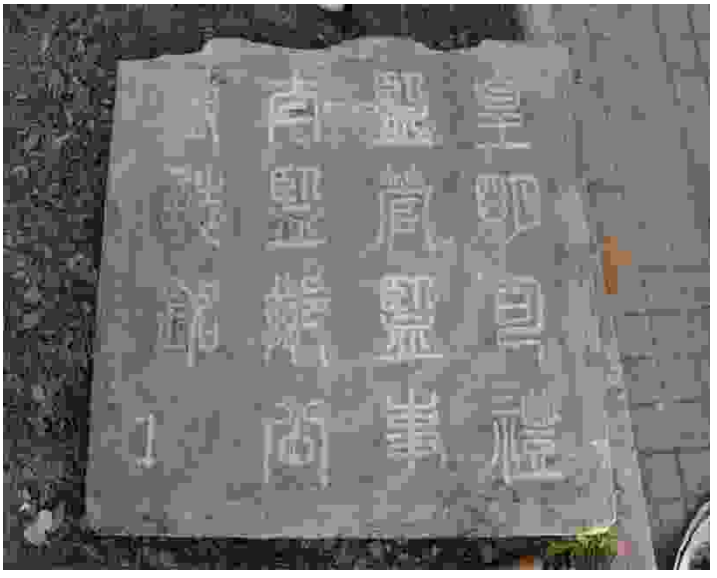
明朝大司礼郑真墓志考

苗天娥

2010 年 11 月 9 日，石景山区五里坨隆恩寺路东 100 米处，施工出土两座古墓，经过 3 天抢救性清理，发现：西墓仅存砖砌墓门；东墓为砖室拱券墓，早年被盗，墓门南向，上方被破坏，墓室内淤泥高达 2 米，出土明代嘉靖及万历通宝十余枚、买地券一方及墓志铭一盒。铜钱氧化严重；买地券字迹模糊；墓志基本完整，青石质，边框线刻祥云图案，长、宽 83 厘米，厚 11 厘米，文字清晰，现存石景山模式口田义墓中。志盖上篆文“皇明司礼监管监事太监郑公墓志铭”，篆盖者为奉政大夫通政使司左参议李勋[①]。志铭 37 行，满行 50 字，全文 1100 余字。墓主郑真，历侍三朝，备受宠遇，历任司礼监各种要职，官至秉笔，参与朝廷机密，徐阶赞他“大司礼”[②]，与太监田义的位高权重不相上下，且权阉王振之墓借此呼之欲出。

一、起家两位司礼大珰名下

郑公讳真，字惟诚，别号化庄，生于正德十二年（1517），河南开封府阳武县人，《明史》无传。净身之初，养育在司礼监秉笔张钦名下。“内竖初入宫，必投一大珰为主，谓之名下”[③]，小宦官先得拜师，最好拜有权有势的太监，拜对了师傅有利于日后发迹。《明史》有两位张钦，一位是正德年间太监，按正德末年算，郑真才 5 岁，入宫的可能性小。后一位张钦是嘉靖初司礼太监，死于嘉靖二年（1523），郑真刚好 7 岁，与墓志记载吻合，应是郑真的第一位师傅。这位张钦，很受嘉靖宠遇：“帝初即位，尽斥先朝传奉官。已，太监丘福、潘傑等死，诏官其弟侄锦衣。及司礼太监张钦死，以家人李贤承荫，贤死复欲官其子儒。献民先后执奏，帝皆不从。”[④]嘉靖皇帝从藩王入嗣大统，屏斥先朝的传奉官，培植亲信，对心腹太监后代极为照顾，任命张钦家人李贤为锦衣卫指挥，李贤死后又“官其子儒”，大臣金献民等认为比功臣后代荫职还高，超越礼制。



明朝大司礼郑真墓志盖

嘉靖拒谏，“诏荫中官张钦义子李贤为锦衣卫世袭指挥”[5]。李贤死后又荫其子李儒，这说明张钦极受嘉靖的倚重。太监阶层非常特殊，很讲究垂直的师徒关系，张钦是皇帝的心腹，郑真投靠了他，就等于投靠了皇上，从此走上了一条别的宦官无法比拟的捷径。

张钦去世后，郑真又被派到司礼秉笔温祥名下，温祥成为他的第二位嫡传师傅。温祥，《明史》无传，他是正德时的司礼太监，正德皇帝驾崩之际，擒杀意欲谋反的江彬时，温祥立过大功，为嘉靖帝入嗣大统扫清了障碍，故得到嘉靖的重用，任司礼秉笔。温祥还是石景山国保单位承恩寺的创建者，正德赐额并敕谕不得侵占庙产、蠲免赋税等。可见，温祥与张钦一样位高权重，对郑真日后的升迁颇为有利。

二、青云直上嘉靖、隆庆两朝

在两位司礼大珰的栽培下，嘉靖丙申（十五年，1536），郑真被遴选入内书馆。内书馆即内书堂，太监王振首创，是司礼监下设的宦官读书专门机构，只有聪慧的小宦官才被选入。明代宦官能批阅奏章、传达诏谕，得益于内书堂的教育。两年后，郑真被提升为司礼监六科廊记室，时年 21 岁，比田义出道早十多年。他管理章疏和内官档案，精熟礼仪，“凡我国家冠婚丧祭典夫册立册封诸项礼仪，赖公力居多”[6]。

嘉靖壬寅（二十一年，1542），郑真被提拔为司礼监长随，正六品。充任答应长随者，皆身躯伟壮有力，圣驾外出时负责抬弓箭、赏赐用箱等，兼夜间巡视火情、护送赏赐之物、藩王贡品等。这一年发生“壬寅宫变”，皇帝险些被宫女杨金英等缢死，随后加强了贴身护卫，魁梧的郑真被选中长随，专管皇帝外出时的安全。嘉靖乙巳（二十四年，1545），“钦升奉御，冠裳伟然，名实相孚”[7]。奉御为答应长随的首领，“其为首者数员，有官帽曰答应牌子，即司礼监奉御”[8]，皇上钦升奉御，说明受宠非同一般。嘉靖壬戌（四十一年，1562），郑真又被推荐为司礼监典簿，签押管事。“典簿典记奏章及诸出纳号簿”[9]，虽与奉御同为正六品官，但典簿掌朝廷机要。“丙寅（四十五年，1566）夏四月，奉命前往河南赵府公干，所经无扰”[10]。这是奉皇命到家乡出外差，正值黄河决口，或许与此有关。“事峻复命，上嘉其廉，升右监丞”，正五品官。[11] 嘉靖在位 45 年，郑真从没有名分的小内侍，晋升为正五品的右监丞，上升速度可观，赢得了嘉靖帝的高度信任，嘉奖其廉洁。隆庆改元（1567），穆宗爱惜他勤勉，依旧重用。九月，奉命前往山西晋府公干。时值蒙古俺答汗寇大同，攻陷石州，杀知州王亮采，掠交城、文水。加上土蛮乘机犯蓟镇，京城告急。皇帝下诏宣大总督侍郎王之诰还驻怀来、巡抚都御史曹亨驻兵通州。也许前往大同宣诏者就是郑真。郑真出宫不肆张扬，沿途不扰民，办事得力，“美誉升闻”，龙颜大悦，“钦升左监丞，寻升右少监”[12]，



发掘现场

升为从四品，看得出来郑真又得到了隆庆帝的垂青。

隆庆二年（1568），郑真被委以重任，担任东宫侍卫、典玺局局郎。东宫是太子的居所，侍卫至为重要，事关皇权接班人的生命安危。典玺局隶属东宫，局郎正五品，掌太子印玺，相当于皇帝之尚宝监，职任甚重。郑真“兢业自持，辅道尽善”，当好小太子的贴身保镖，还辅佐他通晓事理，这与宣德朝大太监王振的身份相似。郑真谨慎操劳，太子平安成长，隆庆皇帝非常满意，特赐蟒衣玉带，朝野羡慕。

这是超出常规的特例。明朝的舆服制度等级森严，亦有尊卑之分，不许随便僭越。《明宫史》记载：“……自奉御而上，左右监丞五品，少监从四品，太监正四品。自太监而上，方敢穿斗牛补。再加升，则膝襕之飞鱼也、斗牛也、蟒服也。再升则受赏也。特升，方赐玉带。……再升，则内府骑马。再升，则每岁禄米十二石。如再升，但凡一级，止岁加禄米十二石耳。”[13]飞鱼是一种龙头、有翼、鱼尾形的神话动物，斗牛为牛角龙形，蟒衣（服）即绣两条行蟒纹于衣襟左右，面斜向。飞鱼服、斗牛服、蟒衣的纹饰，都与皇帝所穿的衮服相似，不在品官服饰制度之内，是明朝宦官、宰辅蒙恩特赏的赐服。只有太监以上再升特升才能获得蟒衣玉带，而郑真只是从四品的右少监，与太监还差着两级，就提前享受了太监之上的尊贵服饰，自然让同僚艳羡不已。两年后，他又升职为左少监。隆庆皇帝在位六年，郑真的职位从正五品上升为从四品，连升四级，奉命外差一次。关键的是从前任皇帝的宠臣过渡到下任皇帝的贴身护卫，还破格受赏，这充分证明了他在隆庆帝心目中的地位。

三、荣耀显赫于万历初年

隆庆壬申（六年，1572）五月，穆宗升遐，10岁的神宗登基，改元万历，他就是此前的东宫太子。万历感念旧情，晋升郑真为太监，“在乾清宫近侍司礼监办事，随赐坐蟒服，仍岁与禄米十二石，许在禁内骑马及坐檐杌”[14]。郑真的待遇又连升好几级。太监，是明朝宦官职衔中最高职位，代表身份、地位、资历、能力。司礼监办事，即司礼监管监事。乾清宫近侍也称御前近侍，由皇帝最宠信的人担任。“御前近侍，曰乾清宫管事，督理御用诸事，曰打卯牌子，掌随朝捧剑，俱位居司礼、东厂提督守备之次……”[15]。冯保是司礼监掌印兼东厂，郑真班次仅次于冯保，担任司礼监秉笔、办事。秉笔太监，不但字写得好，还要知识渊博，挑秉笔太监就像选拔进士一样严格。“坐蟒”是太监官服中最尊贵的式样，大红色。蟒衣分单蟒和坐蟒两种，单蟒即绣两条行蟒纹于衣襟左右，坐蟒即除左右襟两条行蟒外，在前胸后背加正面四爪蟒纹，有别于明帝和贵戚所穿的五爪“蟒龙”袍。“按大政记，永乐以后，宦官在帝左

右，必蟒服，制如曳撒，绣蟒于左右，系以鸾带，此燕闲之服也。次则飞鱼，惟入侍用之。贵而用事者，赐蟒，文武一品官所不易得也。单蟒面皆斜向，坐蟒则面正向，尤贵”[16]。“橙杌”是专门赏给司礼监掌印、秉笔中年事已高和最受宠信的人，形状像靠背椅，插棍人抬，“所以曰杌者，禁地不敢乘轿之意也”[17]。《万历野获编》卷八载：“又贵珰辈承恩，有赐内府骑马者。最贵，则云著于内府坐橙杌。其制如腰舆而差小，直臾至乾清宫。”明臣中仅严嵩因年龄大获得坐腰舆的殊荣，而太监受宠遇和年高者获得的最尊贵恩赐就是坐橙杌，橙杌形制和腰舆相似略小，坐上可直达乾清宫。郑真获此殊荣时年未及花甲，不能算是年高受赏，应是最受皇帝宠眷者获得的额外恩典。郑真所受的恩典还有：“自公初任及至秉笔以来，累荷恩赍斗牛、鱼、麒麟彩织服各三季者九件，如禄米加积岁支者计九十六石矣，公荣遇可谓极也。”[18]

万历乙亥（三年，1575）夏六月，“命公掌内府供用库印”[19]。内府供用库掌印是肥缺，“专司皇城内二十四衙门、山陵等处内官食米，每员每月四斗。……其印非九重倚畀最有宠眷者不得掌也”[20]，兼掌御用黄蜡、白蜡、沉香等。内府供用库隶属内承运库，为皇帝的“小金库”之一，皇帝任意支取，朝臣无权监督，漏洞颇多。掌管内府供用库的是皇帝最倚重的心腹，有的公然营私舞弊、中饱私囊，如万历年间的张明、孙成等。“丙子（万历四年，1576），礼仪房提督”[21]，掌管“一应选婚、选驸马、诞皇太子女、选择乳妇诸吉礼”，一般由司礼监掌印或秉笔兼摄。

纵观郑真的宦官生涯，始终在司礼监任职。无论是育养在两位司礼大珰名下、受教育的内书堂，也无论是六科廊记室、长随、奉御、典簿，直至秉笔太监、提督礼仪房、掌内府供用库印等，都没有超出司礼监范围。司礼监秉笔，这一职务举足轻重，王振、刘瑾、冯保等均担任过此要职。明代的宦官机关按工作性质和范围设十二监、四司、八局，中叶后司礼监跃为宦官机关的领导部门，直接听命于皇帝。司礼监掌印相当于外朝的内阁首辅（即宰相），司礼监秉笔职同次相，享有极大的特权和崇高的地位，只有皇帝的亲信才能担当。《明宫史》述：“掌印太监一员，秉笔、随堂太监八九员或四五员，……凡每日奏文书自御笔亲批数本外，皆众太监分批。遵照阁中票来字样，用朱笔楷书批之。间有偏旁偶误者，亦不妨略为改正。掌印秩尊，视元辅。其次秉笔，其次随堂，如众辅焉。……其余大小衙门，遇有应题奏之事，皆先关白司礼监掌印、秉笔、随堂而始行。”[22]《万历野获编补遗》记载更详：“司礼今为十二监中第一署。其长与首揆封柄机要，佥书、秉笔与管文书房，则职同次相……”[23]明中叶，阁臣的“票拟”由司礼太监转呈皇帝，代皇帝审批阁票，与内阁对柄机要，实为“内相”。皇帝用红笔作批示，称为“批红”。“然内阁之票拟，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于寺人。于是朝廷之纪纲，贤士大夫之进退，悉颠倒于其手”[24]。寺人是宦官的别称，“批红”权操纵在他们手中，为宦官干政专权提供了契机，实则削弱了相权，太监头目成了实际的宰相，手握朝纲，口含天宪，甚至监管吏治，朝官对司礼监太监只得拱手听命。更可叹的是，大臣入阁时要拿着名片、捧着礼物，先拜谒司礼太监，然后才能正式就职；平时路上遇见叩头跪拜，尊称“上司”。这种扭曲现象恰似黄宗羲所说：司礼监首领“无宰相之名而有宰相之实”。由此观之，郑真的权势炙手可热，位极人臣。郑真的仕途，不少和田义相似，他是田义的前辈，职位略低于田义，受到的宠遇、赏赐和田义不相上下，仕途比田义升迁快，这也许与他投身司礼大珰名下、充任东宫侍卫有密切关系。

万历丁丑（五年，1577），郑真患病，皇帝恩恤颇多：“赐假摄养，颁给猪、羊、酒、米、白金、彩弊，遣医诊治，弗瘳。公默忖自以为不胜荣耀。夏六月，恳辞乞允私

第调理，恩给月米十石、岁夫十名，用示优礼。”[25]七月初八，郑真寿终正寝，万历闻讣大为伤悼，给予他隆重的葬礼待遇：“遣官谕祭，越例加至四坛，宝钞三万贯，仍敕有司治诸葬具，赐祠额曰嘉贤祠，上意报典未尽，特出帑银五百两、纻丝八表里兼香烛油米等仪，俾赙丧费。”[26]从皇帝谕祭、赐祠额、宝钞、赐祭四坛、派有司治葬具、出帑银助葬来看，郑真得到的哀荣胜过田义，比田义赐祭多一坛，还赐祠额、出银助葬，据此推断其墓园规模不亚于田义墓，应有神道、祠堂、寿域等地面建筑，他两次出外公干，应也像田义墓有圣旨碑亭，在当时是引以为荣的事。

生荣死哀，郑真得到的天恩已超越礼制，且荫及弟侄，弟郑琚，“藉公勋贵，历蒙荫升锦衣卫指挥佥事，擢礼仪房管事”，侄郑据臣为锦衣卫西司房小旗，恐怕也和他有关，因其兄郑琁早卒。同年七月二十七日，郑真葬于都城西山净德寺界内。

四、余论——郑真葬地或可牵出王振虚冢

郑真墓志中有一句关键话语：“葬于都城西山净德寺原公祖公司礼太监王公寿域之侧”，顿时令人疑窦丛生：净德寺是谁创建的？司礼太监王公又是谁？

《日下旧闻考》载：“净德寺明碑二：一朝列大夫三山邵文恩撰，嘉靖己丑年立；一嘉议大夫昌黎王槐撰，万历丁丑年立。”其援引“邵文恩重修净德寺碑略”云：“都城之西，距六十里，顺天府宛平县治，其乡曰玉河。斯境者，山环水回，地舆秀衍，多为古昔名蓝所据。正统改元，建立隆恩寺。仍于寺之东南二里许，再构寺一所，赐名净德”，山场四至“东依白水峪，南经五里坨，西接小孤山，北抵隆恩寺”[27]，可知先有隆恩寺，后建净德寺，位于隆恩寺东南二里处，附近的敬（净）德寺村由此得名。隆恩寺的历史可以上溯到辽道宗年间的大昊天寺，《帝京景物略》记王振在正统四年（1439）重修，英宗赐额[28]。《宛署杂记》曰净德寺建于成化四年：“净德寺，在童子山，成化戊子（四年，1468）太监李棠建，奏请敕赐今名。祭酒吴节记。成化十一年敕谕护持。”[29]嘉靖二十八年（1549），司礼监掌印、提督东厂太监麦福和其弟麦祥修缮过隆恩寺，预建坟茔于此，嘉靖三十二年（1553）立《重修隆恩寺碑》，张文宪撰文。隆庆二年（1568），获得护坟《敕谕》碑。[30]麦福的墓地修得相当宏丽，万历三十五年（1607），宋懋澄游滴水崖后投宿隆恩寺，见麦福墓“钜丽拟于至尊”[31]，大发感慨。

根据大量明朝太监建寺修庙惯例，笔者斗胆推断，郑真的“祖公司礼太监王公”疑似大太监王振。为什么作此推测呢？理由有四：其一，明朝太监建庙往往假借修佛寺来掩饰预建坟茔的动机，正如王廷相在《西山行》中所言：“人间富贵尔所有，不虑生前虑身后。高坟大井拟王侯，假借佛宫垂不朽。”可谓一针见血。宦官净身后六根不全，不得葬入祖坟，只好捐修寺庙，为出宫后有养老之所和死后有葬身之地，图的是春秋僧人祭祀洒扫。如李童创法海寺、温祥建承恩寺、慈有方捐慈祥庵、李荣兴善佛寺等。“环城四野，往往有佛寺，宏阔壮丽奇伟，不可胜计。询之，皆阉人之葬地也。阉人既卜葬于此，乃更创大寺于其旁，使浮屠者居之，以为其守冢之人”[32]。西山是公认的风水宝地，许多太监选择这里作为寿域，极个别为皇帝赐葬。王振重建隆恩寺，不排除他也有这种打算。其二，隆恩寺作王振的葬地，既现成又理想。王振曾经伴读东宫，英宗即位后他便执掌司礼监，势焰熏天，为所欲为。英宗非常敬重他，称先生，公侯勋戚尊他为“翁父”，他则以周公辅成王自居，《明史》中称王司礼。正统十四年（1449），他唆使英宗御驾亲征蒙古，导致“土木堡之变”，英宗沦为阶下囚，王振死在异乡。英宗复辟后于天顺元年（1457）下诏恢复王振官职，

以香木雕刻王振像，招魂以葬，并在智化寺里为之立旌忠祠，褒奖其以身殉国。王振尸骨无存，英宗招魂以葬，葬地在哪里，史书没有交代，即便是衣冠冢之类的虚冢，也得有个像样的地方。隆恩寺地处风水吉壤，又是王振生前建的寺庙，做他的千年福地不用大动土木，现成简易，最理想不过。其三，郑真作为太监，盲目崇拜王振。尽管王振专权祸国，但英宗对他评价很高，对他的恩宠格外优厚，诸帝对王振的看法大不同于谋反的刘瑾，认为他死于国事。王振的家庙——智化寺有明一代香火很盛，然胜等住持相传十几代，太监许安等接奉香火，皇家屡屡赏赐，内监们不断重修。为了迎合皇上，太监们对王振也是尊崇有加，羡慕王振的大有人在，刘瑾等一些宦官认为王振是他们阶层的精英人物。郑真比王振晚一百多年，也崇拜王振，视为前辈、祖公，因为就在他去世前三个月，公然率领众太监重修了智化寺。现存智化寺山门西侧石额上的文字可以为证："万历五年三月三日，司礼监管监事，兼掌内府供用库印，提督礼仪房太监都督等重修。"[33]这里虽然没提到郑真，但对照年代、官职、头衔，与郑真的一模一样，重名的可能性不大。又据《北京市志稿·金石志》记载"明智化寺门额"："横额'敕赐智化寺'，上（题）[款]'正统九年九月奉旨建'，下（题）[款]'万历五年三月太监郑真等重修'。在禄米仓智化寺。"[34]这条资料正好弥补了上条的不足，两条资料说的是同一件事，可以互相印证，它阐明重修智化寺的为首者郑真就是墓志中的郑真。宦官生前爱扎堆儿、抱团儿，死后又有从葬习俗，郑真临终前四个月重修王振家庙智化寺，死后埋葬在王振寿域之侧亦在情理之中。第四，此地曾出土过明代王太监墓遗物。隆恩寺、净德寺界内，至今三次发现明代墓葬。1996 年 4 月 17 日，隆恩寺村出土明中期王太监墓石碑碑额一块，碑是方形的，类似田义的方碑，可惜残缺，无法得知此王公到底是谁，或许就是郑真"祖公司礼太监王公"墓的遗物。2010 年 6 月 10 日，这里又出土两座明式石室拱券墓，未发现带文字的实物，位于本次两座墓西侧约 20 米处。对照出土墓葬和史籍记载，证明这里是明中后期司礼大珰的墓葬群。

入清，隆恩寺和净德寺一带被划为清太祖第七子饶余敏亲王阿巴泰家族墓地。民国元年（1912），冯玉祥驻军隆恩寺，看到石像生明人装束，墓碑上有"大明"等字[35]。此后军阀混战，墓园被盗。亲王后裔卖古树、石料度日，1927 年卖给张学良 62 件石刻营建"元帅林"。2004 年 7 月，石景山区政协到抚顺"元帅林"考察，有的碑文被磨掉，仍残留"大明"、"司礼监"的字迹，应是明代隆恩寺一带太监墓遗存。

五、墓志铭的作者和书者

郑真墓志内容翔实，罗列了司礼监的多种职位和特殊待遇，是研究明代宦官制度的可靠实物资料。同时，墓志中提到多位司礼监大珰，对研究明朝宦官人物史也不无裨益。这是郑真墓志的独特之处。此外，墓志撰者为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徐阶，书者为嘉议大夫工部左侍郎王槐，一位阁老，一位廉吏，亦值得一书。

徐阶（1503～1583），字子升，号少湖，又号存斋，松江府华亭县人，《明史》有传。嘉靖二年（1523）以探花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因忤张孚敬，被斥为延平府推官。延平多盗，因善捕盗而东山再起。皇太子出阁，擢为国子监祭酒。嘉靖三十一年（1552）入阁，密疏揭发咸宁侯仇鸾罪行，且擅写青词，为嘉靖帝所信任。他谨慎侍奉首辅严嵩十载，嘉靖四十一年（1562），巧用智谋斗倒了奸相严嵩，天下称快，取代严嵩为首辅，人称"徐阁老"，隆庆二年（1568）致仕。徐阶身居显位，能保全善类，善选拔英才，起用黄光、张居正等，在朝政方面多所建树。

徐阶早年即工诗文，善书法，请他撰

写碑文、墓志的比比皆是。在明朝，朝官阁臣为寺庙、宦官撰写碑文、墓志习以为常。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如法海寺的碑是礼部尚书胡濙和吏部尚书王直撰写的，御用监太监李童的墓碑也是胡濙执笔；承恩寺的碑、内官监太监梁宣的墓志是大学士李东阳撰的；田义的墓志是阁臣沈一贯撰写的；内阁首辅杨一清曾为宦官张勇写过墓志铭；大学士万安也为御用监太监钱义、尚膳监太监宁英撰过墓志。徐阶名气大，诗文、书法俱佳，请他写墓志能提升墓主地位，太监麦福、黄锦、赵举的墓志就是他写的，麦、黄二人职权在郑真之上。他还为黑山护国寺写过碑文，为宣城伯卫守正撰写墓铭。当然，撰碑写志润笔费不菲，谀墓之词难免，“从来志状之属，尽出其家子孙所创草藁，立言者随而润色之，不免过情之誉”[36]。墓志中说郑真出身河南阳武县巨族，显然不实；又说皇上嘉其廉，他担任内府供用库掌印时“为国惜费，任怨自若”，许是溢美之词。《明史纪事本末》载：“万历十年，居正故。御史李植、王国、郎中陈希美，尽发保奸贪妆。……故太监郑真、曹宪、孟充、王臻家资金银重货，悉输保宅。”[37]王春瑜、杜婉言在《明朝宦官》中说郑真家资至少有白银十万两，说他廉洁恐怕不实。徐阶受杨兵宪请托为郑真写墓志铭，尽管据状书写，也难免做人情。只在“公祖公司礼太监王公”处留下伏笔，暗示二人乃一丘之貉，还算精明。

王槐，昌黎人，《明史》无传，是郑真墓志和万历五年净德寺重修碑的书法作者。王槐曾官山东布政司参议。嘉靖二十五年（1546），“左通政王槐采矿银于玉旺峪”。[38]万历二十七年（1599）《永平府志》卷6《选举志》有其简略记载：正德年间，王槐为昌黎县学岁贡生，昌黎县曾在学宫附近（源影寺塔南）为其立“廷尉坊”，文曰：“廷尉奉政大夫大理寺丞王槐”（民国二十二年废）。他擅长笔墨，选入中书科，直文渊阁办御典，修玉牒，赐狮麟飞鱼服，从一品俸，官至工部左侍郎。《昌黎县志》卷三《地理志下·墟墓》云：“王侍郎墓，在县西北，南王家柳河西，石羊虎尚存遗迹。有神道碑一通”，评价他“清慎正直，不阿权贵，世庙特嘉其忠”。王槐工书法，其书法流传至今者除郑真墓志外还有：嘉靖三十二年（1553），礼部尚书徐阶所撰陈谨榜进士题名碑；现房山区琉璃河石桥北、嘉靖四十二年（1563）立的“敕修琉璃河桥堤记”。

附郑公墓志铭（标点为作者试加，/代表自然断行）

皇明司礼监管监事太监郑公墓志铭 /

赐进士及第、光禄大夫、柱国少傅兼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知制诰经筵华亭徐阶撰 / 明进嘉议大夫、工部左侍郎兼修玉牒、侍经筵、同修国史、钦赐从一品俸、飞鱼服色兼文华殿侍书昌黎王槐书 / 赐进士第、奉政大夫、通政使司、左参议安德李勋篆 /

万历丁丑新秋日，余静卧林泉，杜门谢客，忽得杨兵宪以状乞铭于余，用垂不朽。余忆昔侍内直，时值大司礼郑公传及 / 纶音，因识既久，睹状固不忍辞。按状郑公讳真，字惟诚，别号化庄，世为河南开封府阳武县巨族。公大父礼，耕织传家。父显，为人重 / 义，时有乡评称善。遂笃生公，公雅重不群，年甫弱冠，选入 / 内庭，系隶司礼监秉笔太监张公钦名下，识公气宇作养异众。时张公奄逝，又奏派本监秉笔太监温公祥名下，育养同前。嘉 / 靖丙申，选内书馆，受诸翰林师，业以进修得名。戊戌因奏擢司礼监六科廊记室。凡我 / 国家冠婚丧祭，与夫册立册封诸项礼仪，赖公力居多。壬寅除长随。乙巳 / 钦升奉御，冠裳伟然，名实相孚。壬戌，推授本监典簿，签押管事。丙寅夏四月，奉 / 命前往河南赵府公干，所经无扰。事竣复 / 命，上嘉其廉，升右监丞。至冬末，伏遇 / 世宗宾天，公预例当谪级。实 / 先帝改元，隆庆初年丁卯，/ 上悯公勤励，敕公职如旧。是年秋九月，奉 / 命前往山西晋府公干，

经途往返不扰于民。美誉升闻，钦升左监丞，寻升右少监。戊辰春二月，/简命公东宫侍卫，擢典玺局局郎。自是公兢业自持，辅道尽善。荷/上皇所知，甚有嘉意，特赐蟒衣玉带，一时缙绅靡不健羡。庚午升左少监。壬申夏五月，恭遇/穆宗升遐，/今上嗣登大宝，轸念公勤悫，晋升太监，在乾清宫近侍司礼监办事，随赐坐蟒服，仍岁与禄米十二石，许在/禁内骑马及坐檐杌。乙亥夏六月，/命公掌内府供用库印。公为国惜费，任怨自若。丙子，礼仪房提督，合署咸服。自公初任及至秉笔以来，累荷恩赍斗牛、鱼、麒麟/彩织服各三季者九件，如禄米加积岁支者计九十六石矣，公荣遇可谓极也。但鞠躬事上，劳瘁致疾。时丁丑春，叨沐/恩恤，赐假摄养，颁给猪、羊、酒、米、白金、彩弊，遣医诊治，弗瘳。公默忖自以为不胜荣耀。夏六月恳辞乞允私第调理。/恩给月米十石、岁夫十名，用示优礼。未几，秋七月初八日卯时，公竟以疾终于正寝。公名下赵公臣辈具书讣闻殊垂震悼/遣官谕祭，越例加至四坛，宝钞三万贯，仍/敕有司治诸葬具，/赐祠额曰嘉贤祠，/上意报典未尽，特出帑银五百两、纻丝八表里兼香烛油米等仪，俾赙丧费。呜呼！公莅事/三朝，懋著忠勋，遐迩称颂，宜享期颐，胡天不吊？呜呼！公虽仙游霄汉，遗有后贤，复何憾焉？距公生于正德丁丑九月十七日巳时，享/年六十有一，万历五年七月廿七日，葬于都城西山净德寺原公祖公司礼太监王公寿域之侧。公兄琁先卒，遗子三，长曰据/德，仲曰据道，俱继世业，季曰据臣，锦衣卫西司房小旗。公存弟琇，藉公勋贵，历蒙/荫升锦衣卫指挥佥事，擢礼仪房管事，子二，长曰据义，次曰据廉，皆习儒学。余窥见公阃门俊伟，足以克昌厥后，异时大振英声，公/垂德不泯，为世所奇，其光前裕后者，舍公而谁哉？铭曰：/嵩山毓秀，阳武先芳。哲人昭灵，从游帝乡。聿修翰业，厥德乃彰。三朝尽节，宠耀台光。德名在称，仁域有疆。禄望固靳，贻/后俊良。纶音褒恤，报典逾常。玄室永辉，神其逸藏。

---

①②⑥⑦⑩⑪⑫⑭⑱⑲㉑㉕㉖见附录郑真墓志铭。

③（清）张廷玉等：《明史》卷305，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4月，第7804页。

④《明史》卷194，第5141页。

⑤《明史》卷208，第5492页。

⑧（明）刘若愚：《明宫史》木集，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11月，第59页。

⑨⑮《明史》卷74，第1819、1822页。

⑬《明宫史》水集，第71页。

⑯《明史》卷67，第1647页。

⑰《明宫史》水集，第72-73页。

⑳《明宫史》木集，第45页。

㉒《明宫史》木集，第24-25页。

㉓（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1，中华书局，1997年11月，第814页。

㉔《明史》卷72，第1730页。

㉗（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卷104，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10月，第1724页。

㉘（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年2月，第319页。

㉙（明）沈榜：《宛署杂记》卷19，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12月，第227页。

㉚（清）周肇祥：《琉璃厂杂记》，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4月，第229-230页。

㉛（明）宋懋澄：《九龠集》卷1《游西山滴水崖记》。

㉜（清）《光绪顺天府志》卷17，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48页。

㉝《古刹智化寺》，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11月，第56页。

㉞《北京市志稿·金石志》卷3，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6月，第206页。

㉟冯玉祥：《我的生活》（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第138页。

㊱（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8，中华书局，1997年11月，第225页。

㊲（清）谷应泰撰、彭孙贻补编：《明史纪事本末》“补编”卷5，中华书局，1977年2月，第1596-1597页。

㊳《明史》卷18，第244页。

（作者为石景山区文物研究所研究馆员）

试论紫砂器的发展及清代紫砂茶具之特色

桑颖新



清嘉庆宜兴窑紫砂粉彩百果壶

在众多的茗器中，紫砂茶具独领风骚，因其自身的优势成为饮茶人的首选用具。它以极好的透气性、细腻亮滑的胎质和造型各异的茶壶式样，成为饮茶用具中的佼佼者。特别是在明代中期以后开始盛行，直至今天紫砂茗器仍为人们所钟爱。

一、紫砂茶具的初创与兴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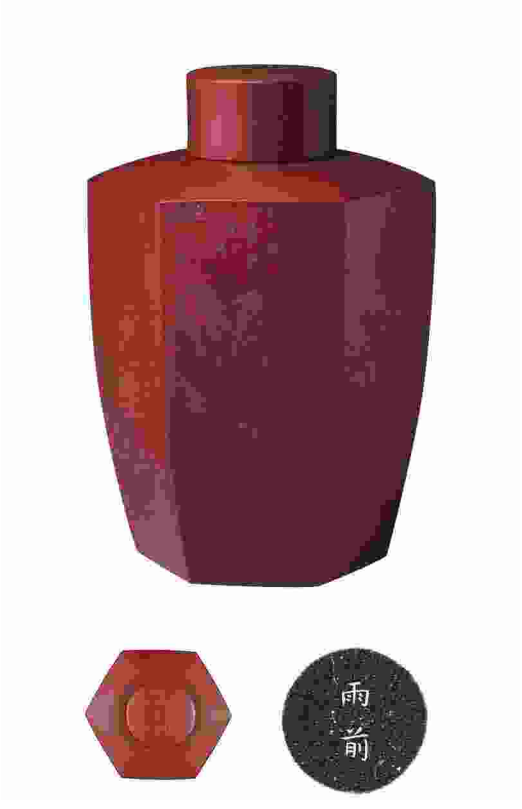
紫砂茶具初创于北宋。在宋代，品茶、斗茶是人们所追求的，也是普遍的饮茶方式。虽然这时紫砂茶具已有生产，但终因宋代饮茶方式的变化，没能兴起。这时期人们饮茶更注重形式，对茶具的使用也是十分讲究。比起精良的瓷茶具，紫砂茶具则显得粗糙、简陋。因此并没有引起饮茶人们的注意，更谈不上喜爱了。高度发达的制瓷业，也让紫砂器在当时显得微不足道。各种瓷茶具占据着饮茶用具的主要地位，陶制的茶具就显得相形见拙了。

紫砂茶具的推动发展是在明代。明初，在饮茶方面，宫廷中由朱元璋率先，皇室提倡将延续已久的煎煮改为冲泡法，民间也纷纷效仿。《明会典》记载：“因太祖下诏，罢造大小龙团，惟采茶芽以进。饼茶日趋衰落，散茶兴起”。[①]自此以后供茶都以散茶、更易于冲泡为主。可以说，这是中国饮茶方法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

明永乐皇帝下旨造大批僧帽壶之后，壶作为茶具在这时得到充分发展，紫砂壶艺得以崛起并发扬。“僧闲静有致，习与陶缸瓮者处，抟其细土，加以澄练，捏筑为胎，规而圆之，刳使中空，踵傅口柄盖的，附陶穴烧成，人遂传用”。[②]这应是紫砂壶的雏形，它能避免盏茶易冷、且有落尘的缺点。使紫砂茶具制作能达到实用与艺术完美结合的，则是在明代正德、嘉靖年间涌现出的紫砂艺术大师——龚春（供春）。供春早年是进士吴颐山的一个书童，后同金沙寺僧学习制作茗壶，他制作的紫砂茶

壶，蕴含着文人的雅志，释家的自然和其自身的朴素之美，被认为是紫砂壶的鼻祖，也正是他所创造的紫砂壶，让以后的紫砂壶艺术长久不衰，并且发扬光大。这也是今天人们在说起紫砂器时很少提及宋代紫砂器，而津津乐道于明代紫砂器的真正原因。

明代饮茶、品茶、论茶风气盛行，制茶技术有了很大进步，加之冲泡法和发酵半发酵茶的出现，紫砂壶的实用效果和紫砂固有的特质，用来冲泡这种茶是最合适不过的，紫砂壶的优势慢慢显现出来，人们发现用紫砂器泡茶比瓷器有更多的优点。紫砂壶的制壶技艺因此也有很大提高，从早期煮茶的大壶逐渐转变为文玩小壶。因为壶小则茶香，壶大则不鲜，尤其是浸泡过久，大壶易使茶味变散失。紫砂壶器小质佳，故符合明代人泡茶所讲究的“壶小则香不涣散，为不耽搁”之原则，加之泡茶要求浓汁，



清雍正宜兴窑雨前铭花鸟纹六方茶叶罐



清乾隆宜兴窑紫砂黑漆描金菊花壶

所以用紫砂小壶泡茶最为可取，一把紫砂小壶拿在手里既不烫手又十分温暖，沏出的茶醇郁芳馨，茶香留存不失本味，盛夏不易发馊等。使用久了色泽越发光润古雅，甚至空壶里注入沸水也有一股香味。正如明人周高起所说：“茶至明代，不复碾屑、和香药、制团饼，此已远过古人。近百年中，壶黜银锡及闽豫瓷而尚宜兴陶，又近人远过前人处也。陶曷取诸？取诸其东山土砂，能发真茶之色香味。”[③]这段记载是说陶壶宜茶。与末茶相比，散茶不易瀹出茶香，陶壶体小壁厚，保温性好，有助于瀹发与保持茶香。

二、明代紫砂茶具的艺术成就

明代宜兴制造的紫砂壶，多采用泥条盘筑及打身筒成型法。从器形看，紫砂壶形分为圆形器、方形器、筋囊器、花形器和仿古器五大类。明代制壶多以筋囊式为主。所谓筋囊壶，就是多仿照自然界中的生物而制成壶样，如瓜果花瓣等，又可依照各种植物筋纹把壶体表面分成若干等份，形成植物的筋纹形状。还有圆式壶、方式壶式样，但从壶式上依稀可以看到受筋囊壶式的影响。在明代，方壶的特点是糅合了筋纹的因素，壶式线条复杂；圆器则造型浑厚圆润，柔中寓刚。明代以前制作紫砂器的名匠，不见于籍典，一般器上不留名。自正德以后，大师名手见于籍典

或留名于壶上的就大有人在了。正德年始，以供春为代表的紫砂艺人的出现，标志着紫砂壶艺正式走上历史舞台。到万历年间著名制壶艺人时大彬的出现，更是让紫砂壶艺走向了成熟。除此而外，还名工辈出，各个身怀绝技。此时期的紫砂茶壶，造型较多吸取铜锡器的造型特点以及明式家具的意蕴。筋纹器造型较多，讲究制壶工艺的难度，盖口筋囊对应的严谨，做工精致，一囊一瓣都交代得清清楚楚，风格简洁凝重，比例协调，蕴含着文人的气质与风采。

传统紫砂壶不论档次高低，都要做到如下几点：壶的容积（容量）适当，高矮得当，壶把便于端拿，出水顺畅，盖与壶口要严密，这是好的紫砂壶应具备的基本条件。紫砂壶分为粗货、精货和特种货三个等级。粗货为一般百姓日常生活之用，价格低廉，有宜茶的功能即可。精货有一定工艺水平，但缺少独特性与艺术性。特种货则是出于名人之手，数量有限，具有很强的艺术性，价格也较高。周澍《台阳百咏注》记有供春小壶“一具用之数十年，则价金一笏”；[④]奥玄宝著《茗壶图录》也提到“明制一壶值抵中人一家产”。[⑤]可见其价格的昂贵。

明代紫砂茶壶多以筋纹造型，明万历四大家都以制筋囊货为主，如董翰的菱花式壶、时大彬的十八瓣菊蕾壶等，皆体现着壶体线条的生动与流畅，严紧的壶盖与壶身则体现出数学般的精巧和秩序之美，严谨规矩中又显端庄与灵秀，给人以美的感受。

三、清代紫砂茶具的发展与特色

历代紫砂壶是反映时代风尚的产物，具有深深的时代烙印，同时也规范着每个时代紫砂壶的纹饰和造型。随着紫砂茶具生产的精进，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帝对紫砂茶具格外喜用。紫砂茶具独有的特性，深得宫廷喜爱。宫中造办处绘出图样命宜兴烧制，宜兴也会把上好的紫砂茶具呈进宫中。特别是乾隆皇帝更是喜欢在紫砂壶上镌刻诗文，紫砂发展到乾隆、嘉庆年间达到了艺术的巅峰。虽然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紫砂的出现是最晚的，又仿佛是突然蓬出，从民间迅速走入皇宫，它的发展得到了宫廷达官、文人雅士及平民百姓的普遍喜爱。所以在今天无论是故宫博物院旧藏的紫砂器还是民间收藏的紫砂器，我们都可窥见清代紫砂的丰富多彩。



清乾隆宜兴窑御题诗烹茶图壶（一对）

康熙皇帝一生博才多学，他对西方的许多事物都十分感兴趣，并怀有探索的愿望。珐琅彩就是在他统治期间开始使用的，他尝试在各种质地的器皿上使用珐琅彩，包括紫砂



清嘉庆宜兴窑杨彭年款紫砂镶玉锡包壶

器。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件康熙宜兴窑邵邦祐制珐琅彩花卉壶，壶底用楷书刻：“乙酉桂月臣憎实诚进，邵邦祐制”13字，故宫博物院只有一件入藏，大批的康熙宜兴珐琅彩茶壶和盖碗均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在清代内务府造办处档案中，记录有康熙、乾隆时期珐琅彩紫砂器：“九月二十九日，七品首领萨木哈、催总白进秀来说，太监胡世杰交宜兴画珐琅碗十件，宜兴画珐琅茶圆四件，宜兴画珐琅茶吊一件，俱康熙年款……”康熙开创了紫砂彩釉装饰，使原本不上釉的紫砂壶开始施五彩，以后又出现了珐琅彩、粉彩。尽管康熙本人十分喜爱珐琅彩，但在紫砂器的使用上还略显粗糙与稚嫩，而这时期的紫砂泥质普遍较粗且含有较亮的云母，胎壁大多较厚实，康熙时以光货或自然植物形状的花货为主，并保留着明代痕迹，自然朴素，没有太多装饰，庄重简洁、沉稳大气，是一种用心呈现的内在之美。康熙本人对紫砂器皿的喜爱，更体现出对科学的兴趣和探究的态度，在艺术上则略逊一筹。

雍正皇帝特别喜爱水墨山水画，在艺术上也有较高的造诣。特别是在瓷器的制作上，他直接干预，很多瓷器的纹样装饰皆由他本人钦定。这时期宜兴紫砂开创了一种新工艺，就是在烧成的紫砂器上加以色釉彩绘，再经低温焙烤。这是紫砂工艺和景德镇釉上彩工艺相结合起来的一种新尝试。雍正皇帝更是喜爱紫砂器天然的肌理美韵以及造型变化万千、优雅柔美的形态，《清宫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记载：“雍正四年十月二十日，郎中海望持出宜兴壶大小六把，奉旨：此壶款式甚好，照此款造银壶几把，珐琅壶几把。其柿形壶的把子做圆些，嘴子放长。钦此。”[6]由此可见，这时期的紫砂壶式样很多，并且根据需要在细微之处有所改进，雍正还命景德镇的官窑仿造宜兴壶式样烧造瓷器。雍正朝虽然只经历了短短的13年，但在清宫造办处档案中就有11次提到宜兴紫砂，由此可见雍正皇帝对紫砂器的喜爱程度。

与雍正皇帝相比，乾隆皇帝更是一位薄科技、重艺术的皇帝，应该讲乾隆皇帝对科学毫无兴趣，甚至把西方国家进贡的科技仪器束之高阁，不以为然。他以“天朝上国”自居，曾鄙夷地说：“天朝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从不贵奇巧，更无需尔国制办物件。”[7]乾隆皇帝是个风流才子，附儒风雅，且在艺术上有极高的造诣。在今天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紫砂器中，我们可以看到其艺术上的成就。嗜茶如命的乾隆皇帝自然对茗饮用具十



清光绪宜兴惠斋款提梁壶

分讲究，特别是对紫砂茶壶更有特殊的要求。第一，要保留最佳的品饮功效。第二，在造型上要变化多样。第三，把诗、书、画、印移植到紫砂壶上。第四，紫砂壶的装饰手法要丰富，戗金、描金、模印、刻划、雕刻、彩泥、堆绘、罩涂漆衣、地漆彩绘等大胆运用在紫砂装饰上。乾隆初年，壶工竞相施艺，把制壶艺术发展到了极致，雕镂繁缛，精致入微。乾隆七年（1742年）这些精致的紫砂壶被选入到承德行宫，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又有四件（套）茶具被选入到皇宫。这些茶具大多用珐琅彩，上面都有乾隆所题诗句。美艳的彩绘使这些原本略显光洁朴素的紫砂，如同穿上了光彩的罩衣，显得富丽堂皇。特别是到了乾隆中期，为皇宫特制的紫砂壶上常常镌刻有乾隆皇帝的诗句，用以博得皇帝的欢心。件件奇巧，华丽而典雅，集诗、书、画、印、浮雕、镂空、镶嵌、泥绘、彩釉等各种工艺技法与艺术之大成。还根据器物不同的造型，配之技艺手法，一器一样，变化丰富，体现着艺术与审美的价值。乾隆之后国力日渐衰退，虽然紫砂器还在不断发展，但像康乾盛世的杰出之作很难出现。集诗词、书画、金石、雕塑于一体的紫砂壶艺，在乾隆之后一直保留至今，并形成紫砂茶壶特有的艺术形式。

嘉庆、道光年间的紫砂壶艺在形制和装饰上发生了重大改变，这种改变起于文人参与紫砂壶的设计。其实文人参与设计紫砂壶艺已不是先例，前代已有，但在这时期的参与较之前代更为广泛与盛行。这时期的壶艺皆带有浓郁的文人气质，并把紫砂壶技艺与艺术性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这时期的壶艺大师要数陈鸿寿（号曼生），相传他创作的壶式有18种，并由制壶名手杨彭年等人配合完成制作，世称“曼生壶”。这时的紫砂壶艺，充满着文人所特有的意趣，特别是书法中的篆、隶、楷、行诸体，表现在壶体之上，笔法洒脱遒劲，体现出文人制壶别有的风韵，有着浓郁的书卷气。

晚期的道光、咸丰年间，紫砂陶壶开始出现了砂胎锡壶，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创新品种。除了紫砂内胎外，外体用锡制包裹，流和鋬采用白玉琢成，别具特色。这时的紫砂茶壶成为人们馈赠亲朋好友的佳品，文人墨客又爱在壶上题诗作赋，使这种上等的特制茶壶身价陡增，深受收藏者的喜欢。仿古器造型在这时期盛行，另外仿漆器、木制和一些自然界生物等作品也应运而生，异彩多样。

紫砂茶器从宋代开始出现，到明清的崛起、盛行，一直延续发展到今天，特别是紫砂茶壶在紫砂艺术中更是特立独行，而成为一门独特的艺术，与中国茶文化的发展和中华民族这片沃土是分不开的，只有茶文化发展才有紫砂陶壶的用武之地，只有中华民族这块沃土才能孕育出紫砂茶壶的独门绝技。中华的茶文化让中国茶具在不断变化创新，茶具反之又对茶文化作以诠释，二者并肩同行，共同推动了中华茶文化与茶具的向前发展，紫砂茶壶的万形千色，展现出的就是中华茶文化与茶具的璀璨与多姿。

①（明）申时行等修：《明会典》，中华书局影印万历朝重修本，1989年。

②③《阳羡茗壶系》，《丛书集成续编》第90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1年，第597页。

④ 周澍：《台阳百咏注》。

⑤［日］奥玄宝著:《茗壶图录》,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10月。

⑥《清宫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雍正四年“珐琅作”。

⑦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掌故部编：《掌故丛编》第二辑，1928年2月。

（作者为故宫博物院展览部馆员）

清初著名收藏家孙承泽的鉴赏著述及其特色

刘仲华

孙承泽（1592-1676），字耳伯，号北海，晚年又号退谷逸叟，顺天（今北京）大兴人。他生活于明清易代之际，当时明宫中珍藏多散逸人间，睹物思旧，便将许多珍迹名画购入家中，“以寄牢骚”，而且他与当时众多名流唱和往来，“各携所蓄名迹相玩赏”[①]，因此，孙承泽得以遍观古今碑帖字画。据《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在金石字画方面，孙承泽著有《庚子销夏记》、《砚山斋珍赏历代名贤图绘集览》、《研山斋珍赏历代名贤墨迹集览》、《研山斋珍赏历代名贤法书集览》和《闲者轩帖考》等。其中，最后成书的只有《庚子销夏记》八卷，其余几部则是孙承泽观赏字画时所作的随手笔记，即《庚子销夏记》成书前的底本。

《庚子销夏记》八卷成书于顺治十七年（1660）孙承泽退居之后，始自四月，迄于六月，故以“销夏”为名。其内容卷一至卷三，为孙承泽本人所藏晋、唐至明代书画真迹，卷四至卷七评古代石刻，每条先标其名而各加评骘于其下，卷八为寓目记，皆他人所藏而曾为承泽所见者。乾隆时纂修《四库全书》，对孙承泽诸多著述都颇有微词，唯独对此书评价颇高，其称“鉴裁精审，叙次雅洁，独有米芾、黄长睿之遗风，视董逌之文笔晦涩者实为胜之，固考古者所宜取资也”[②]。乾隆初年游幕京师的著名学者卢文弨在黄叔琳家见此书，也称赞有加，他说：“《庚子销夏记》者，北平孙退谷先生评骘其所见晋唐以来名人书画之所作也，钩元抉奥，题甲署乙，足以广见闻而益神智。其鉴裁精审，古人当必引为知己。余尤爱其有恬旷之怀，萧闲之致。”[③]清代有不少学者著书以“消夏”为名，如高士奇《江村消夏录》、吴荣光《辛丑消夏记》、黄任《消夏录》、谢甘澍《消夏集》、郭麐《樗园消夏录》、江瀚《吴门消夏记》、俞曲园《九九消夏录》、端方《壬寅消夏录》等，清人这种“消夏”式著述大多是受了孙承泽的影响。

在完成《庚子销夏记》的过程中，孙承泽先是按照前人墨迹、古画、法帖、碑拓等分类作题跋、收集资料，在这些分类手稿的基础上，最后完成了《庚子销夏记》八卷。但《庚子销夏记》成书后，孙承泽并未停止，又在原来的手稿基础上继续有所增删。这些稿本，孙氏后人又抄录成编，流传下来，即我们今天看到的《砚山斋珍赏历代名贤图绘集览》、《研山斋珍赏历代名贤墨迹集览》、《研山斋珍赏历代名贤法书集览》和《闲者轩帖考》等。

《研山斋珍赏历代名贤墨迹集览》一卷，主要品评前人墨迹，《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为“艺术类存目”，南京图书馆藏有清抄本，字体清秀工整，疑似孙氏本人笔迹。卷前有“小引”，即《庚子销夏记》之序。其文曰：“庚子四月之朔，天气渐炎，晨起坐研山斋注《易》数行，闭目少坐，令此中湛然无一物。再随意读五经白文及诸家语录，偶有所得，即入之《藤阴札记》中，



无所得则已，倦则取古柴窑小枕偃卧南窗下，自烹所蓄佳茗，连啜数小盂，或入书阁整顿架上书史，或抱膝藤下，抚摩双石，或登小台，望郊坛烟树。徜徉少许，复入书舍，取古名贤法书墨迹一二种，反覆详玩，领其蕴，然后仍置原处，闭扉屏息而坐。家居已久，人鲜过者，然亦不欲晤人，老年畏热，或免蒸灼之苦矣。退谷逸叟记。”[④]卷末有“七十九老人孙承泽书”字，另“黄山谷书阴真君诗”条后有“纂修臣程昌期恭阅”字样，可见此本应是励守谦家藏并送呈四库全书纂修馆、经纂修官程昌期所校阅的底本。

如题名所示，此卷主要内容是孙承泽本人所藏或过目他人所藏的唐、宋、元三代名人墨迹的题跋笔记，自“怀素千字文”至“宋四先生墨迹”，共 38 条。卷中绝大数条目都编入了《庚子销夏记》中，惟有前后编次颇异，如“张长史旭草书”等 23 条编入《销夏记》卷一，“赵子昂书千字文”等 4 条编入《销夏记》卷二，“怀素小字千文”等 9 条编入《销夏记》卷八“寓目记”。在条目的名称上，也稍有改动，如“徐季海书心经”改为“徐季海浩书心经墨迹”、“苏东坡米南宫墨宝小册”改为“苏米墨宝小册”等。在内容上，个别文字亦略有不同，总体而言，《销夏记》胜于《墨迹集览》，也正为此，《四库全书总目》认为此本“盖即《销夏记》之稿本也”[⑤]。所不同的是，“赵子昂千字文”、“书朱元晦、吕东莱、张南轩、杨诚斋四先生墨迹后”以及卷后所附录《元人破临安所得故宋书画目》，未入《销夏记》。

《砚山斋珍赏历代名贤图绘集览》二卷，主要评论前人画作，《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为“艺术类存目”，湖北省图书馆藏有清钞本二册。此抄本字体与前面的《墨迹集览》迥异，书中钤有“北海孙承泽思仁晚号退翁”、“北平孙氏珍藏书画印”、“孙炯之印”、“挚庵”、“文博”等印；文中讳“玄”字，不讳“弘”；集中凡孙承泽跋语前皆加“先宫保评云云”等字，可见此本由承泽之孙（很可能出自孙炯之手）抄成于康熙年间。

其内容多采用旧文，为古来 87 位画家作传，先列画主人物传，述其生平以及前人评述（如米芾《画史》、《宣和画谱》等），然后是孙承泽所见真迹及其跋语。上卷起顾恺之讫包鼎，共 42 家，末附不知姓名“洛神图”一则；下卷起苏轼讫邹之麟，亦 42 家，末附“总题明四家画册”一则及“题冬日赏菊卷”二则。前有《小引》曰：“甲申后，铜驼在荆，玉碗亦出人间，二三同好日收败楮残墨，以寄牢骚。余有墨绿居，在室之东，或有自携所藏，间相过从，千秋名迹幸寓吾目焉。追忆记之，以备披阅。八十二老人退翁识。”[⑥]自序称“八十二老人”，则又在《庚子销夏记》之后，为其晚年所记矣。

此书内容多录入《庚子销夏记》中，“其中同异之处皆以《庚子销夏记》为长。”[⑦]如孙承泽题识，除了题识末尾的“以备披览”四字外，悉入《庚子销夏记》卷八《寓目记》之首，其它入于此卷各篇，只是语言更加简略，有的地方仅存跋语，故《四库全书总目》怀疑此书为孙承泽当时随笔记录的

初稿。

《研山斋珍赏历代名贤法书集览》三卷，主要内容是法帖、碑拓，《四库全书总目》将此书与《研山斋珍赏历代名贤墨迹集览》一卷一同著录为“艺术类存目”。湖北省图书馆藏有此书抄本，二册，字体与《图绘集览》相同。书中有“北海孙承泽字思仁晚号退翁”、“北平孙氏珍藏书画印”、“孙炯之印”、“挈庵”等印。文中三处有“先宫保”字样。文中凡“玄”字缺笔，而“弘”字没有缺笔。可见，此本与《图绘集览》一样，出自孙炯之手，时间亦在康熙年间。

前有“小引”曰：“庚子五月之末，久旱不雨，林居始觉有热意，静坐青藤下，取古石刻翻阅，日以两卷为率。忆丁亥之冬曾著《帖考》，今冉冉十三年矣，旧所见者失去大半，存者重一寓目，聊借以潇洒送日月而已，烟云过眼，宁敢谬执而常有乎？北平退谷八十二老人孙承泽记。”“小引”中称“北平退谷八十二老人孙承泽记”，且谓其于丁亥（顺治四年，1647）冬曾著《帖考》（疑即《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之《闲者轩帖考》），十三年中失去大半。可见这一前言作于顺治十七年，时年 68 岁，而非 82 岁，出现这样的歧异，或是孙承泽晚年修改时未及详审，抑或是后来抄录者所误。

其内容主要是唐宋碑帖，共三卷：卷一载“宋本淳化阁帖”等古代法帖、碑拓 67 条，卷二载“夏禹衡岳碑”等 25 条，卷三著录“柳公权神策军纪圣德碑”等 67 条，都是孙承泽个人所藏之物。无论法帖还是拓碑，孙承泽都是论以书学。而且他对金石碑帖的嗜好丝毫不亚于后来乾嘉学者的热情，但孙氏收藏鉴赏的兴奋点是书学，与乾嘉学者以金石文字佐证经、史的兴趣大相径庭。

通过排比其篇目，《法书集览》的内容也大多收入《销夏记》中，只是文字上略有异同，前后编次亦有不同。大体上来说，本书卷一、二对应《销夏记》卷四至卷六，卷三对应卷七，故《四库全书提要》疑其为《销夏记》稿本。

此外，湖北省图书馆亦藏有一册稿本，内容分别是“历代图绘姓氏备考”、“历代图绘要论”、“历代图绘要诀”、“历代图绘定评”，书稿未题总名，该馆定名为《历代图绘挈要四种》。其中“历代图绘姓氏备考”二卷，存卷下，记金、辽、元、明四朝各等画家一千二百余人之姓名、籍贯、简历、擅长之画，个别还指明其授受师承，各朝代后附“女史”、“释”、“道”，元代后附“外国”。“历代图绘要论”一卷，分列绘画中需要注意的“十二忌”，即布置抽塞、远近不分、山无气脉、水无源流、地无夷险、路无出没、石止一面、树少四枝、人物伛偻、楼台错杂、浓淡失宜、点染无法。“历代图绘要诀”近三十则，涉及画家人品、形象取舍、书画关系、画可临不可摹、神似与形似、画家须居胜地及古代画坛轶事等。“历代图绘定评”约三十则，收宋苏轼论宋汉杰画、黄庭坚跋赵令松永年画等历代名画评语，间杂画坛轶事。[8]该书稿未题撰者姓名，钤有“孙炯之印”、“文博”、“北平孙氏珍藏书画印”，其字体、纸张、版式与湖北省图书馆藏的《研山斋珍赏历代名贤法书集览》、《研山斋珍赏历代名贤图绘集览》相同，因此，也可以断定此书稿也是孙氏后人整理的手稿。

孙承泽还著有《砚山斋杂记》，也是关于文房四宝、文体和书画古玩等的鉴赏，其中有关于眼镜的记载，记载眼镜的传入和发展。另外还著有《闲者轩帖考》，所记上自《兰亭序》，下至文征明的《停云馆帖》，一一考其源流。该书作于顺治四年冬，至顺治十七年，因“失去大半”，又“取古石刻翻阅，重辑成书”，内容多为唐宋碑帖，故又名《庚子销夏录碑帖考》。当时，孙承泽正在撰写《庚子销夏记》，因此上书大部分内容被收入其中，只是文字稍有异同，前后编次也有变化。

总之，《砚山斋珍赏历代名贤图绘集览》、《研山斋珍赏历代名贤法书集览》、《研山斋珍赏历代名贤墨迹集览》和《闲者轩帖考》、《砚山斋杂记》等，都只是

孙承泽收藏金石字画的随手笔记，也可以说是《庚子销夏记》成书以前的底本。当时孙承泽闲居之时择取家中所藏披阅观赏，随手记述所见所闻，并按照古画、法帖、碑拓等不同类别分卷著录，并逐渐形成了现在所流传的《砚山斋珍赏历代名贤图绘集览》、《研山斋珍赏历代名贤法书集览》和《研山斋珍赏历代名贤墨迹集览》等著述。顺治十七年四月至六月，孙承泽将这些内容汇总编辑，遂成《庚子销夏记》八卷。但以上那些书画、碑帖的随手杂记在《庚子销夏记》成书以后，还有陆续增加、整理。正因为此，现存的这些著述抄本中有顺治十七年（即孙承泽 68 岁）以后所写的内容以及《庚子销夏记》中所没有的内容，而且出现了《研山斋珍赏历代名贤墨迹集览》序言与《庚子销夏记》序言完全相同的情况，同样也出现了《闲者轩帖考》自序中所记述时间前后不能吻合的现象。

孙承泽金石书画收藏、鉴赏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梳理流传脉络。孙承泽所作题跋尽可能详细地记述了这些书画碑帖在清初的收藏情况，为我们今天研究古代书画流传提供了史料。如，《研山斋珍赏历代名贤墨迹集览·徐季海浩书心经》：“唐人墨迹传世者少，沧桑后如曹嘉禾溶所收《林纬乾帖》、李江右元鼎所收《韦庄乐章》、李西蜀迎睿所收《怀素小字千文》、东孝廉荫商所收《颜鲁公送刘太冲序》，皆唐迹之佳者。余借之研山斋把玩诵日。今书与人散香如海外三山矣。”以此可知，在清初，曹溶收藏有唐代林藻的书帖，唐代韦庄的《乐章帖》藏于李元鼎，怀素的《小字千文》藏于李迎睿，颜真卿的《送刘太冲序》藏于东荫商之手。如，史道硕所绘《八骏图》，此图“万历中藏王元美家”，“元美官太仆时摹刻太仆署中，今归龚合肥芝麓寓”。[9]如，陆探微《金縢图》，“图在西川向氏寓，余曾再玩之。”[10]孙氏的这些记述，为我们梳理古画的存佚状况以及流传脉络提供了确切而且重要的资料。

其二，寄托兴亡沧桑之感。在明亡以前，孙承泽就开始收藏字画、碑帖，但当时仅仅是出于文人雅士的爱好。入清以后，金石字画也像人逢乱世一样，漂流人间，所谓“甲申之变，名画满市”。[11]睹物思情，此后孙氏的收藏寄托了更多的兴亡沧桑之感。他说：“甲申后，铜驼在荆，玉碗亦出人间，二三同好日收败楮残墨，以寄牢骚。余有墨缘居，在室之东，或有自携所藏，间相过从，千秋名迹幸寓吾目焉。”[12]孙承泽在书画题记中经常以“沧桑”指代明清鼎革，如“沧桑后，西川柳凤占收得，余借之，上石后回扬州，竟归余。”[13]孙承泽先后在明清两朝做官，作为出处不正的“贰臣”，他在收藏和鉴赏的“退居”生活中也寄托了自己感悟“沧桑”的内心世界。

其三，孙承泽的收藏态度不是出于好古、居奇，而是为了保存字画免遭厄运，有时甚至为此而花费不少。如，孙承泽曾经在商贾手里看到北宋淳化四年（993 年）宋太宗赐给学士毕士安的《淳化阁帖》，称其“搨法佳妙，纸色墨色如古漆版，诚海内第一部也”。为了不使这样精妙绝伦的法书散乱，尽管商贾“索值甚昂”，但他还是担心商贾为图利将此帖割裂出售。承泽说：“余与子朴极力搜措衣物，一时俱罄，盖恐市贾图利分析售之，使此奇宝无复珠联璧合之日，非为一人耽清玩也。”[14]

不少著名的字画碑帖经过数百年的流传尤其是战火纷扰，已经散乱残缺，孙承泽则四方搜求，不遗余力。仍举淳化阁帖，自北宋太宗刊刻后，世间转相传刻，出现了各种传刻本不下数十种。其中，宋徽宗赐给宰相余琛的大观帖“字法精妙，宛如手书”，但到了清初时该本已经散乱各处，孙承泽为了搜求完整，先是从商贾手里购买，再从吴姓医人那里用银酒杯交换，又从熟人李元鼎、左旦明、张学曾、曹子固等人那里寻求，又从姜图南那里用自己珍藏的独一无二的颜真卿《大字麻姑坛帖》交换。[15]真可谓费尽周折，终成珠联璧合！

孙承泽收藏字画不是为了奇货可居，

这一点从他晚年将大量字画、古玩赠送他人也可见一斑。尤其在退官以后，兴趣便转向了经史研究，“刻意读经史之书”[16]，而将所藏大量书画碑帖转赠他人。孙承泽先后收藏有北宋著名画家李公麟的《莲社图》、《罗汉图》、《临顾斩琴图》、《临陆布发图》，后来“皆散在友人家”。又所收佛像如《贯休罗汉》，“宇内久推者”，孙承泽将其赠顺德白含三；宋人《应梦罗汉卷》赠嘉禾曹溶；又《罗汉渡江卷》赠王崇简之子王熙。对于孙承泽将这些好不容易搜集来的珍藏转手赠送的做法，有人“咲为迂者”，但他本人不以为然，自称“老人自行其胸臆，未可为时人道也”[17]。

其四，弥补、纠正前人著录的缺失与错误。这主要表现在金石碑帖方面。在《研山斋珍赏历代名贤法书集览》和《庚子销夏记》中，著录有不少金石碑帖，其中绝大部分孙承泽都有相关收藏，至少亲眼目睹过。在金石碑帖的著录鉴赏中，孙承泽很注意参考前人的金石学名著，如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洪适《隶释》、《隶续》、郑樵《通志·金石略》，以及明代杨慎、赵涵、郭宗昌等几位学者的金石研究成果。尤其留意著录那些前人缺漏或者有误的碑帖。如“鲁峻碑阴”，“完美可读，益为可珍”[18]，而《金石录》、《集古录》及《隶释》俱遗而失载，即使是明人赵涵极力搜访，所著《石墨镌华》也没有著录。又如，“巴郡太守樊敏碑”，“书法遒劲古逸，尤为可珍”，但是“《集古》、《金石》二录俱不载”。[19]又如，“荡阴令张迁碑”，“《集古录》、《金石录》及《隶释》、《隶续》并不载”，“近代人如秦中赵涵及郭宗昌搜访旧碑亦不之及”。[20]关于金石文字的著录问题，孙承泽也提出了“存旧”的思想，反对妄自改动，“古文之缺，当存其旧，若妄加改窜，非其质矣”[21]。

孙承泽家富藏书，身后多归同乡黄叔琳，卢文弨即称：“退谷万卷楼藏书，今大半在黄氏昆季家中”。[22]孙氏所藏字画后来多归梁清标，再后来又多转入清宫内。可以说，孙承泽是清初书画碑帖的鉴赏大家，所著《庚子销夏记》对后来的王澍、何焯、翁方纲等人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他大量收藏从明宫中散出的稀有字画，为在兵荒马乱之际保存这些珍贵的文化财富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

①易宗夔：《新世说》卷七，见《清代传记丛刊》，台北文明书局，1986年。

②《四库全书总目》卷113，《庚子销夏记》提要，中华书局，2008年。

③《抱经堂文集》卷五《庚子销夏记序》，中华书局，2006年。

④《研山斋珍赏历代名贤墨迹集览·小引》，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72册，齐鲁书社，1997年。

⑤《四库全书总目》卷114《研山斋墨迹集览》一卷《法书集览》三卷提要。

⑥《砚山斋珍赏历代名贤图绘集览·小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73册。

⑦《四库全书总目》卷114《研山斋图绘集览》提要。

⑧《中南、西南地区省市图书馆馆藏古籍稿本提要》，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8年。

⑨《研山斋珍赏历代名贤图绘集览》卷上《史道硕》。

⑩《研山斋珍赏历代名贤图绘集览》卷上《陆探微》。

⑪《研山斋珍赏历代名贤图绘集览》卷上《荆浩》。

⑫《闲者轩帖考》自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78册。

⑬《研山斋珍赏历代名贤墨迹集览·王右军裹鲊》。

⑭《研山斋珍赏历代名贤法书集览》卷一《宋赐毕文简淳化阁帖》，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72册。

⑮《研山斋珍赏历代名贤法书集览》卷一《宋赐大观帖太清楼帖》。

⑯⑰《研山斋珍赏历代名贤图绘集览》卷上《李公麟》。

⑱《研山斋珍赏历代名贤法书集览》卷二《鲁峻碑阴》。

⑲㉑《研山斋珍赏历代名贤法书集览》卷二《巴郡太守樊敏碑》。

⑳《研山斋珍赏历代名贤法书集览》卷二《荡阴令张迁碑》。

㉒《抱经堂文集》卷五《庚子销夏记序》。

（作者为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



紫禁城内随安室探源与室内布局

刘鸿武

一、关于随安室的设置

随安室作为乾隆青宫时的书室名，在宫内的使用最早见于雍正五年（1727 年）。十七岁的弘历迎娶富察氏，始自毓庆宫迁居于乾西五所的头所和二所。乾隆即位后，改乾西二所为重华宫，头所为漱芳斋，此时的随安室位于漱芳斋的后殿。为何使用“随安室”名，乾隆是这样解释的：“随安室青宫时书屋名也。盖所遇而安，昔时藉以淑己而已，今则四海之广，兆民之众，无不欲其随时随地而安，抑亦难矣。故凡宫禁园庭仍以是名之，触目警心，亦识其安之艰致云尔。”[①]“随安”即随遇而安之意，指能顺应环境，在任何境遇中都能满足。昔时年轻的弘历产生如此的想法，与他当时所处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雍正初政时的政治环境十分严峻，不仅有康熙遗留下的由争储而引发的恩怨，还有对雍正继承皇位合法性的种种猜测。初登皇位的雍正为巩固皇权采取了极为严厉的措施，不仅无情地处置了新老政敌，以至监禁和处死，甚至对同父所生的骨肉同胞，也残酷虐待，或阴谋杀害，或革爵监禁。成婚后入住乾西二所的弘历深知自己所面临的一切，皇父的严政和太子的身份，迫使无奈的弘历，只能以韬光养晦和儒家内求诸己的传统做法来避其风险。“随遇而安”平抚了少年太子心中太多的不安和忧虑，使其较为平稳地度过了皇储时期，顺利地接掌了其皇父雍正遗给的大清政权，“随安室”成了乾隆的“琅嬛福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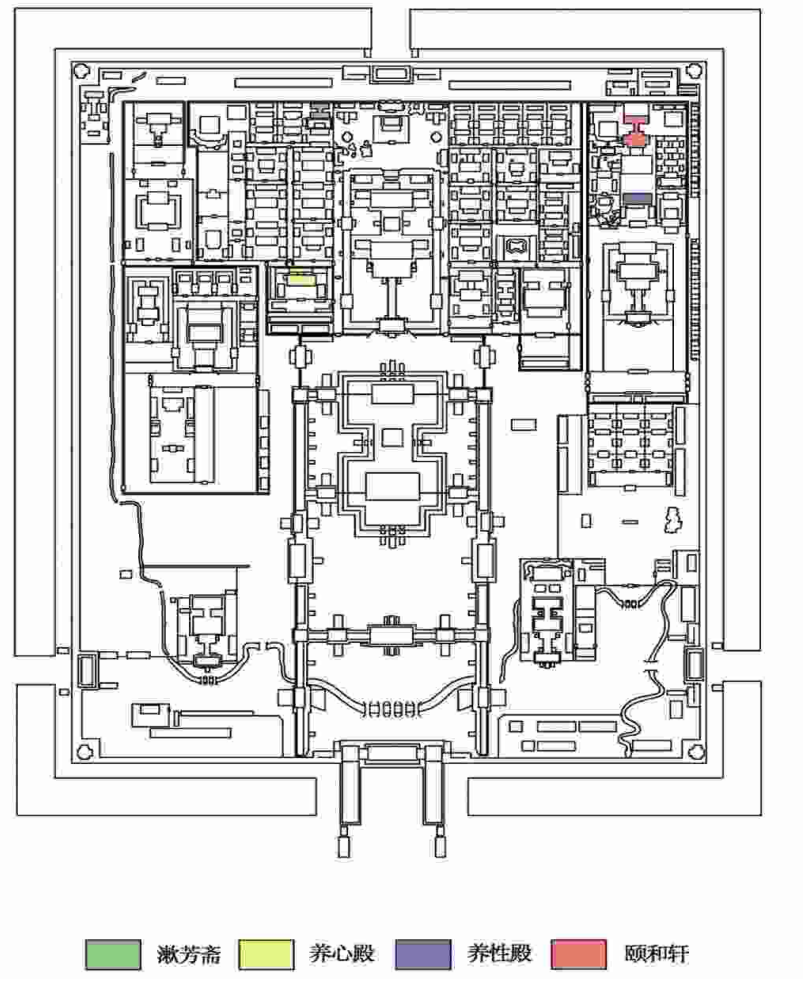
如果说“随安室”的室名是乾隆用来“淑己”和“触目警心”，那么真正的书房又在何处？其时，在乾隆的潜邸另有两处主要的读书场所，一处是重华宫西配殿的“抑斋”[②]，另一处是重华宫第三进院落翠云馆的长春书屋[③]。抑斋位于重华宫西配殿浴德堂，面阔三间进深一间。翠云馆面阔五间，进深一间，长春书屋位于东次室。就书房的功能而论，漱芳斋随安室封闭狭窄的空间和设施远不如以上两处，而是更多地体

现出休憩和随遇而安的氛围。根据清代宫廷建筑使用习惯，室内匾额应是依据主人意愿在建筑内部进行分隔和装修后悬挂的。用一处狭窄封闭的居室作为太子的书房，并悬挂随安室匾名，可以说是弘历对自己的慰勉和座右铭。在同一区域和相连的院落内，设置三处书房，显然带有“装点”的成分。对于弘历来讲，漱芳斋随安室的使用功能远不如“触目警心”的作用大，正像其晚年在御制《颐和轩随安室》诗中所说：“随安随地励斯志，欲冀他年无事坐此恣盘桓。”[④]表面看似一生追求平平安安，实际中宫廷斗争的复杂性和随之带来的烦恼，需要经常保持随遇而安，以克服各种各样的政治险境。为此，“凡宫禁园庭仍以是名之”，这也是四处随安室设于乾隆不同历史时期的原因。

据《国朝宫史续编》记载，紫禁城在乾隆时期共有四处随安室，分别为：漱芳斋堂后东室、养心殿东暖阁西室、养性殿东暖阁后室、颐和轩东暖阁南室。由于乾隆身份的变化，其位置与室内布局亦有很大差异。

二、位置与室内布局

四处随安室分别位于紫禁城内四个方向，即漱芳斋和养心殿位于内廷西路的北部和南部，养性殿和颐和轩位于外东路宁寿宫建筑区中轴线的中部和北部，其都处



图一　紫禁城平面图

于宫殿的东间。除养性殿外，随安室都设于工字殿内（图一）。

（一）漱芳斋随安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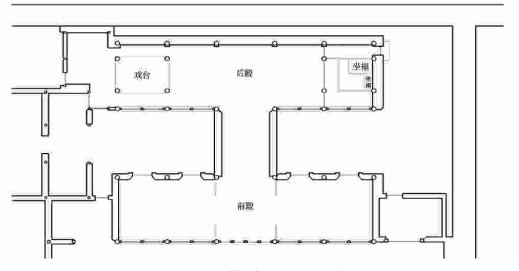
1、位置

漱芳斋位于内廷西路北端，西与重华宫相接，东与御花园相邻，北是宫墙。建筑平面呈工字形，前后各五间，中有穿堂相连。前殿五间相通；后殿西侧为戏台，东次间以落地罩与明间相分；东梢间与东次间用灯笼框夹纱槛窗和槅扇门相隔，槛窗上现悬“高云情”夔龙木匾。现在的建筑格局与历史相同（图二），文献记载如下：

《国朝宫史》记载：“重华宫之东为漱芳斋，……殿后穿堂匾曰：‘稽古佩文’，……堂后西向匾曰：‘金昭玉粹’，联曰：‘瑞景琼楼开锦绣，欢声珠阁奏云韶。’ 东室匾曰：‘随安室’。”[5]

《国朝宫史续编》记载：“重华宫之东为漱芳斋。……东室匾二，一曰‘庄敬日强’，一曰‘高云情’。后殿北墙悬大宝箴一篇，殿后穿堂。堂后东向匾曰：‘金昭玉粹’，联曰：‘瑞景琼楼开锦绣，欢声珠阁奏云韶’。东室匾曰：‘随安室’。皆高宗纯皇帝御笔。”[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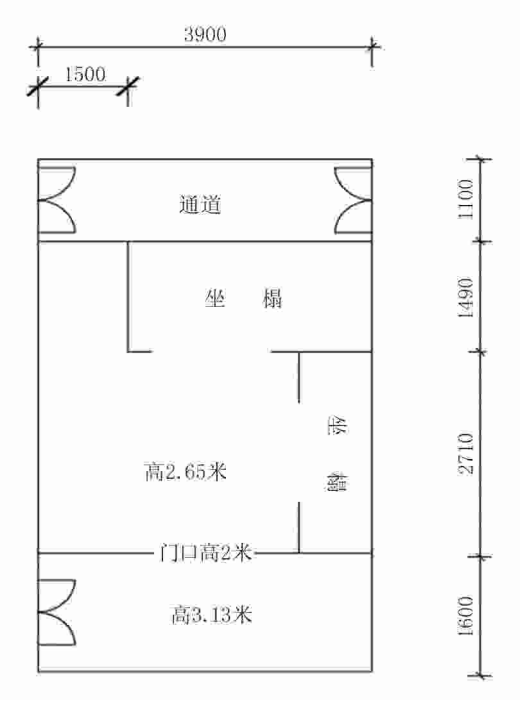
《国朝宫史》成书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国朝宫史续编》嘉庆五年（1800年）编纂，成书于嘉庆十一年（1806年）。由此看出，此时后殿东室仍为随安室，且嘉庆朝继续沿用这一布局。又如《清仁宗御制诗集》中所述：“……漱芳斋东室为高云情，东次室曰静憩轩，斋后为金昭玉粹，东室曰随安室。”对于文献的记载，在这里应该弄清两个概念：（1）殿室面阔开间的称谓，文献上记载的“东室”和“东次室”，与我们现在的说法有所区别，以漱芳斋面阔五间为例，我们现在称“东室”为“东次间”，称“东次室”为“东梢间”或“东尽间”；（2）匾额朝向的识别，“东向”就是“向东”，也就是面朝东方。据此分析，漱芳斋后殿东室当是东次间，而东次间是以落地罩分隔空间的，开敞空透，显然与“室”不符，“东室”应是用槅扇分隔的东梢间。分析结果是：随安室位于东梢间内。



图二　漱芳斋平面示意图

2、室内布局

从图三中可看出，板墙将室内隔为3个空间，南为临窗小室，室内高度为3.13米；中为坐榻，北为通道，中间以板墙相隔，室内高度均为2.65米。坐榻与槛窗之间留有1.5米的隔离空间，其效果将会消弱因大堂内人员走动传给室内的噪音。坐榻前所设炕罩，形成了私密的个人空间。中部与临窗小室之间，有高2米，宽1.1米的门口相通。室内面宽3.9米，门口的宽度与其相比不足三分之一，这样两个相临的空间，在分隔的时候不是采用实体墙面把两者完全隔绝，而是以木质板墙增设门口



图三　漱芳斋后殿随安室平面示意图

的方式使之互相连通，使两个空间彼此渗透，相互因借，从而扩大了空间。临窗小室空间高度的抬升，将窗外的阳光更多的引进室内。与下面养性殿随安室示意图相比，可以看出：身为太子时用的漱芳斋随安室比起太上皇的随安室不仅狭窄，且较为封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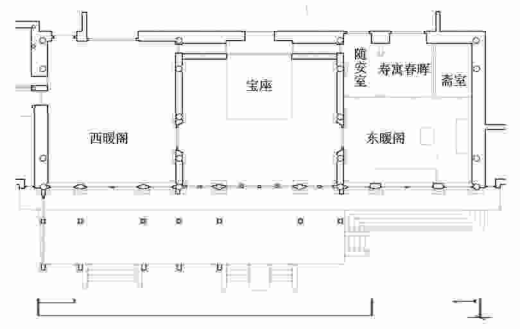
（二）养心殿随安室

1、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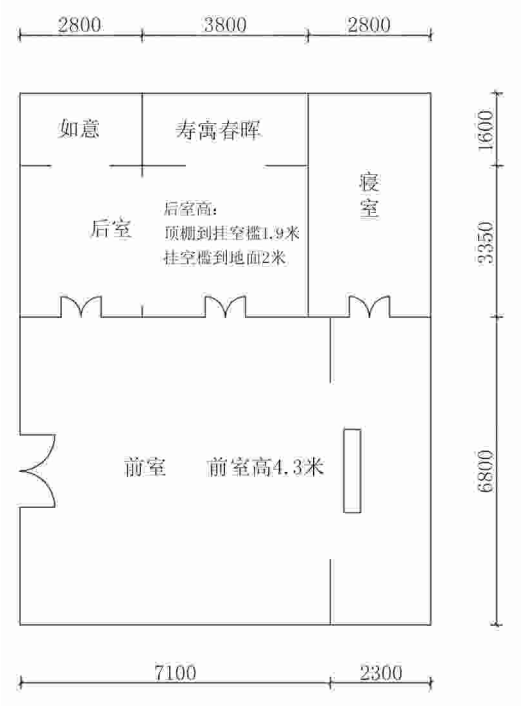
养心殿与大清历史关系密切，位置紧要。从顺治入主紫禁城开始，清代各朝皇帝在此处理日常政务、召见大臣。此处是乾隆即位后在宫内设置的第一个随安室，与其它三处相比，未独立成“间”，而是虚分为室。

在建筑平面上，养心殿是一座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前出抱厦单檐歇山顶大殿（图四）。殿中明间设宝座，西暖阁设“三希堂”和“勤政亲贤”殿。东暖阁由东次间和梢间组成，阁内用隔扇划分前室、后室。前室靠窗设通炕，靠东一侧背东面西设前后宝座，以花罩相隔。由西北折而东南，上为仙楼，现用贴落画遮挡。后室实为东、西两间。东间小室以板墙分隔，内有炕罩，罩内设床，上悬光绪御笔“随安室”纸匾，室内后墙无窗，东侧贴墙有楠木博古壁挂，西缝板墙中设纱窗与西室相隔。西间用几腿罩虚分两室，各有北窗。西小间北窗下设宝座，宝座上方悬“如意”纸匾，东小间北窗下设桌几盆景，罩上现悬光绪御笔“寿寓春晖”纸匾。

从纸匾的悬挂可看出这是清末光绪朝的陈设布局，如同付连仲《清代养心殿室内装修及使用情况》[⑦]一文的分析，这一点没有问题。那么，乾隆时的随安室具体位置是哪儿呢？据《国朝宫史续编》载：“阁后室，高宗纯皇帝御笔匾曰：‘寄所托’。东室为寝宫。西室，高宗纯皇帝御笔匾曰：‘随安室’，联曰：‘无不可过去之事，有自然相知之人。’”[⑧]（《国朝宫史》与此描述相同，不再摘录。）此段描述了三个地点，即“寄所托”、东室和西室。显然“寄所托”位于西室和东室之间，也就是现在阁后室中间“寿寓春晖”的地方（图五）。再看《清仁宗御制诗集》记载：“养心殿我皇祖所缮治，乃宵旰寝兴之所也，凡办理庶政召对引见一切皆如乾清宫。殿中三楹设宝座。殿内东暖阁阁上曰：‘如在其上’，阁之西南曰：‘明窗’，阁后室曰：‘寄所托’，东室为寝宫，西室为随安室。”[⑨]还有《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佐证：“月华门之西，相对者为遵义门。门西，南向者为养心门。门内为养心殿，殿之东暖阁上恭奉龛位。阁后室，东为寝宫，西曰随安室。”[⑩]从嘉庆朝和光绪朝《钦定大



图四　养心殿平面示意图



图五　养心殿东暖阁随安室平面示意图

清会典事例》的记述，可看出嘉庆以后各朝未曾改变这一格局。由此可知，现在“如意”匾处应为随安室，寝宫的随安室匾是清末时换挂在此处的。

2、室内布局

这是一处政寝合一的宫室，为满足使用上的功能，在前室与后室间，除使用古代建筑常用的槅扇分隔空间外，还在随安室与“寿寓春晖”之间，采用了几腿罩虚分空间的方法，使得细分功能空间后，保持了两个功能空间的过渡与联系。由于几腿罩构造简洁，抱框不像花罩和落地罩那样占用空间，故大多用在进深较小的殿堂。从图五中可看出，在面宽 6.6 米、进深不足 5 米的空间内，划分空间的同时，为增加室内空间层次感，使用此式装修是如此恰当。用在前室与后室划分的槅扇风格一致，使在处理政务的场所，庄重整齐。

即位后的乾隆将随安室设于“办理庶政”的养心殿，不仅是对青宫读书场所的一种怀念，同时也是昭显随遇而安的处事态度。从室内的陈设和读书环境看远不如此殿前室的“明窗”处更加适宜。随安室在此设置，说明这只是一个象征性空间，又一次体现出随遇而安的意境。

内檐装修是室内划分空间常用的一种手段，通过对槅扇和几腿罩的巧妙设计，可以营造不同的使用空间。养心殿随安室，位于政寝合一的场所，为使皇帝处理政务和召对大臣室内环境的庄重，使用槅扇分隔前室和后室，合闭自由，形成了室内的流动空间。在后室为满足随安室功能的需要，又无需占用更多空间，使用几腿罩将后室空间虚分，形式与内容结合完美。

（三）养性殿随安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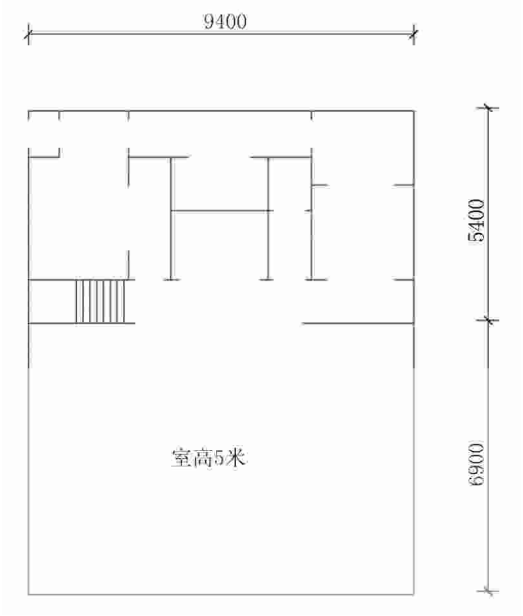
1、位置

养性殿位于外东路的宁寿宫后面。关于构筑养性殿的目的，乾隆在《墨云室记》中说：“予构筑养性殿于宁寿宫，以为倦勤后寝兴之所，其义已见向年之什。而其清温室宇，一如养心殿之式。”[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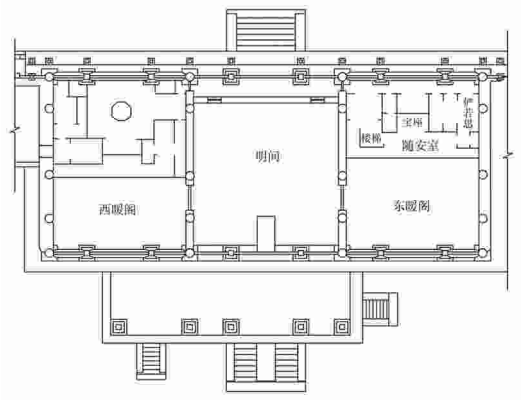
文献中提到养性殿是仿养心殿构建，建筑形式相同（图六），面阔三间，东西次间为暖阁。东暖阁内前面临窗通透明亮，阁后上下两层，上层为仙楼通为一室，下层正中面南设宝座床。依据《国朝宫史续编》载：“东暖阁后匾曰‘随安室’，室东匾曰：‘俨若思’”[12]，宝座处当为随安室，后有小室，东为“俨若思”，西为楼梯间（图七）。

2、室内布局

此处随安室虽依养心殿随安室而建，但不是处理政务的“正规场所”，也无需



图六　养性殿随安室平面示意图



图七　养性殿平面图

为了斋戒而设“寝宫”，使用功能相对于养心殿较为简单。宝座居中，前厅未作分隔，较为宽敞。宽大的宝座占据了随安室的主要空间，形成了以宝座为中心的室内布局。[13]宝座上仙楼通为一体，楠木雕倒挂楣子与栏杆置于仙楼前沿，楠木挂檐板雕刻的云纹嵌满了姿态各异的珐琅蝙蝠，与暖阁板门红漆描金的蝙蝠图案交相辉映，充满了祥瑞祝福的意愿。板门两侧嵌进墙内的多宝格，不仅巧妙地利用了室内空间，同时也为居住室内的主人增添了生活情趣。无论是装饰主题还是空间布局，都体现了“太上皇”居住的环境和氛围。

由于受到地理条件的制约，宫内随安室难于建造出像宫外御园中“书室依林俯碧澜，文窗纱绿称遐观”的书房环境，但在室内确可以作到“数轴牙籤悬座侧，一窗风月入毫端”。随安室除了室名有着特定的思想外，作为书房的使用，除按照宫殿建筑的规范建造外，还有在意境方面的追求。这里说的“意境”，是指通过对随安室的装修及装饰图案所表现出的一种意境与氛围。养性殿随安室的蝙蝠图案，用写实的艺术处理手法表现得栩栩如生，加之飘动的云纹，如同蝙蝠在空中飞舞。蝙蝠是一种象征幸运与幸福的吉祥物，人们常用 “福如东海”、“五福捧寿”表达对老人的祝愿，所以蝙蝠图案用在此处，表达对归政皇帝的祝福，恰如其分。由于中国古代建筑受到外形和体量的限制，宫廷匠师和宫殿主人便把对建筑的情感倾注在室内的布局和装修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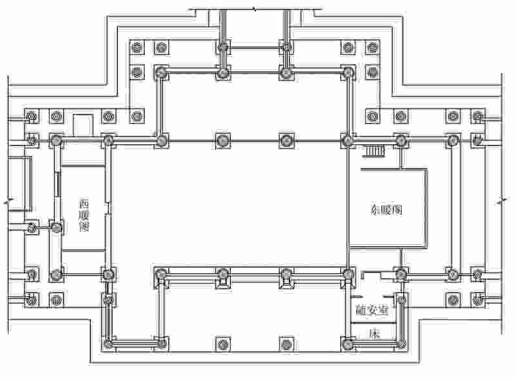
（四）颐和轩随安室

1、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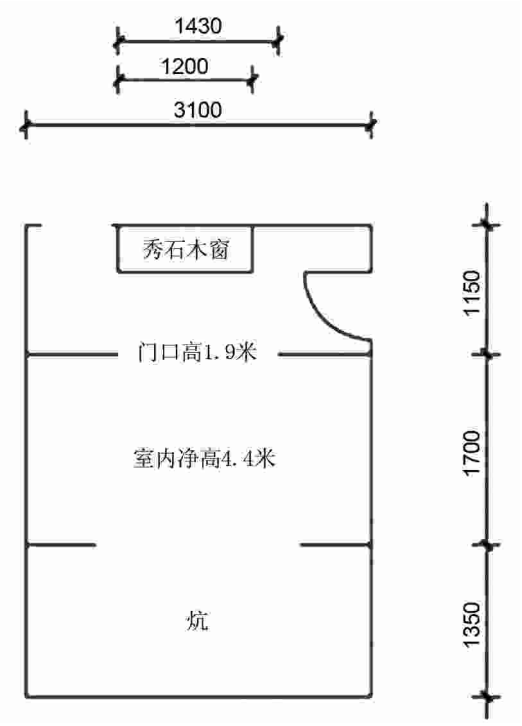
《国朝宫史续编》载：“乐寿堂后为颐和轩，匾曰‘太和充满’，……后间匾曰‘导和养素’，……东暖阁南向匾曰：‘随安室’，联曰：‘庆烟纠缦笼青锁，淑景和闾丽紫宸’”[14]。这是一座形制独特的殿宇，平面显示前凹后凸。面阔七间，进深一间，前檐出抱厦五间，后檐出抱厦三间。除前檐抱厦外，余各间均出廊。轩内东、西暖阁用板墙封护，靠南窗设小门。西暖阁位于西稍间，而东暖阁位于东次间和东稍间，不对称的封闭造成东暖阁的空间大于西暖阁。东暖阁内中为敞厅，上为仙楼，下有楠木雕花栏板分隔。随安室由东暖阁靠南窗小门进入，迎面板墙上悬挂贴落，上为仙楼，左与佛堂相通，右设门口与随安室相连。室内靠窗设炕，附设楠木回纹夹纱炕罩，对面设秀石木窗，随安室匾应悬挂于此窗之上（图八）。

2、室内布局

在宫内四处随安室中，这是唯一紧靠正殿南窗的一处，其他三处均在宫殿后室。在实际测量中，测得室内净高 4.4 米，这在四处随安室中是最高的一处。从图九中可看出，室内高度大于室内的面宽和进深，特别是由板墙分隔后形成了 3 个空间，更显空间的竖向感。而竖向空间给人的精神感受是挺拔和兴奋，这大概是设计者出于对在此使用者是一位年迈老人的考虑，有意为之。在炕罩的对面设计的门套也宽于正常尺度，其效果是靠窗而坐看全对面的堆石木窗。炕罩为紫檀嵌竹丝回纹夹纱灯笼框隔心、裙板是嵌竹丝龟背锦地紫檀贴雕。由于空间过高，又是在封闭的空间内，室内采光仅靠底部槛墙上的两扇窗是不够的，为增加室内的亮度，设计者巧妙的将炕罩上的横披窗与外檐下的上亮窗相通，使室内不因封闭的竖向空间显得光线过于昏暗。细致与精巧的室内装修和夸张的竖向空间布局，将高大的宫殿建筑与主人的



图八　颐和轩平面图



图九　颐和轩随安室平面示意图

使用意愿结合在了一起(从历史文献得知，乾隆在宁寿宫设计和施工过程中多次参与其中）。

颐和轩与养性殿的随安室虽然都是乾隆归政后使用的处所，且是同一时期建筑，但前者与漱芳斋随安室相同，狭窄封闭；后者与养心殿随安室相比，使用空间更为宽敞明亮。身份的变化改变了使用功能，使用功能的变化改变了室内布局。

窗子是整个建筑中引人注目的视觉重点之一，因此，它也是建筑中重要的装饰部位。颐和轩随安室的堆石木窗和背景中的树木高山，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自然界中陡峻连绵的群山和茂密的树林，进而想到避暑山庄的“万壑松风”。在有限的空间内利用板墙的厚度造窗置景，不仅使立面与空间有机结合，还让室内焕发出自然意趣。

三、结 语

通过对文献的解读，清楚了四处随安室的历史位置，了解了随安室书房匾名的用意。由于四处随安室是依据乾隆身份的变化而设于宫内，其室内布局各自呈现出不同的特点：1、身为太子时的随安室封闭狭窄，其更大的作用是装点；2、贵为天子时的随安室在多功能空间中虚分为室，既满足了使用功能上的需要，又不影响殿内整体环境的庄重；3、为即将归政而设的养性殿随安室宽敞明亮，布局简单，装修主题突出；4、颐和轩随安室靠窗设床和巧妙置景及夸张的竖向空间。以上特点反映了宫廷生活与宫廷建筑的密切联系。随安室依据主人身份的不同所呈现的布局变化，表现了中国古代建筑划分室内空间呈现出“随心所欲”的特征。

①（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第5册，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344页。

②“予向居重华宫，洁治西厢为书室，而名之曰抑斋。”（清）庆桂编纂：《国朝宫史续编》，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457页。

③“曩时蒙恩尝读书于此，即长春之号亦系赐予者，故各处书屋率以此名之。”《日下旧闻考》第1册，第245页。

④《日下旧闻考》第1册，第245页。

⑤（清）鄂尔泰、张廷玉编纂：《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

⑥《国朝宫史续编》，第458页。

⑦ 付连仲：《清代养心殿室内装修及使用情况》，《故宫博物院院刊》1986年第2期。

⑧《国朝宫史续编》，第464页。

⑨《清仁宗御制诗集》第三册，《故宫珍本丛刊》，海南出版社，2000年6月。

⑩《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嘉庆朝卷六百六十一，光绪朝卷八百六十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76年。

⑪⑫《国朝宫史续编》，第485页。

⑬ 关于宝座的概念，朱家溍先生在《明清宫殿内部陈设概说》一文中说：“皇帝坐的位置，不论是椅是榻是炕，都可以称之为宝座。”故宫博物院编：《禁城营缮纪》，紫禁城出版社，1992年12月。

⑭《国朝宫史续编》，第490页。

（作者为故宫博物院古建部馆员）

北京夏商西周考古学文化的类型谱系

张智勇

北京位于华北平原的西北边缘地带，其西部、北部以太行山和燕山山脉为屏障，东南呈向渤海缓缓倾斜的平原，这里的山前台地和平原低地宜于人类休养生息。同时，北京处于中原文化与北方草原文化的交接地带，其古代文化特别是青铜时代文化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原与北方文化的相互影响。多种文化的汇聚与碰撞、冲突与交融使这里考古学文化面貌显得错综复杂。因此，对北京地区夏商西周时期考古学文化类型谱系进行探讨，对于把握这一时期该地区诸考古学文化演变轨迹、认识这一时期历史发展面貌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北京地区已发现的夏商西周考古学文化资料进行梳理，以探讨其各自的文化属性和发展脉络。

一、遗存类型与文化特征

通过对已经发表资料的整理，北京地区夏商西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主要包括了大坨头文化、围坊三期文化、张家园上层文化以及西周燕文化。

1、大坨头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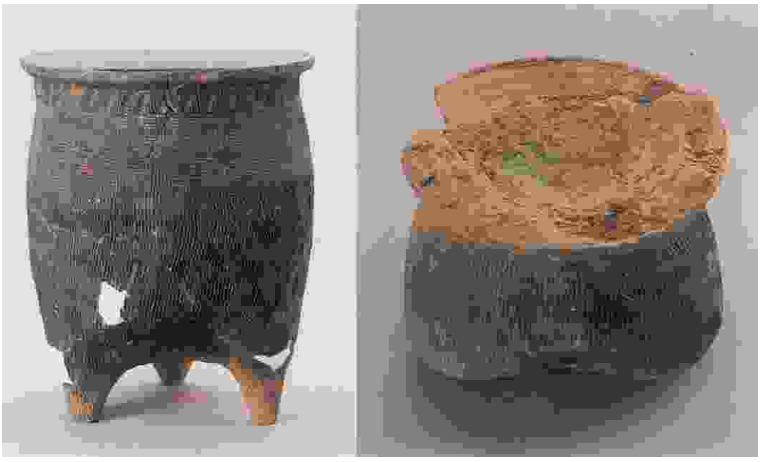
北京地区已被确认的年代最早的青铜文化是大坨头文化。该文化以河北省大厂县大坨头遗址的发掘[①]而得名，是分布在燕山南麓潮白河、海河、滦河下游及其支流的京津唐地区夏至早商时期的考古学文化。

北京地区属此文化的遗存有昌平雪山第三期[②]、房山镇江营与塔照第一期[③]、张营遗址第一二段[④]、刘李店墓葬[⑤]、西营[⑥]、平谷刘家河陶器墓[⑦]等。该文化陶器以夹砂褐陶为主，纹饰常见拍印绳纹，有少量彩绘陶；典型器物有无实足跟素面鼓腹鬲、素面折肩鬲、折腹盆、折肩罐等。生产工具和武器以石器为主，包括斧、锛、凿、铲、镞等，此外还有刀、镞、锥、凿等铜器和纺轮、垫、拍、网坠等陶器以及镞、锥、针等骨器。装饰品有喇叭口铜耳环、铜指环等。



大坨头文化陶器组合（昌平张营）

遗迹有房址、窑址、灶址、灰坑、墓葬等。房址有圆形半地穴式和方形地面式两种，一般由居室、灶、门、柱洞等部分组成，居住面多为黄土垫底，均经烧烤。窑址近椭圆形，分为火道、窑室、烟囱三部分，底部有陶片铺底现象。灰坑数量最多，分为圆形、椭圆形和不规则形状口等类型。墓葬有长方形竖穴土坑墓、瓮棺墓两类。土坑墓多为木棺，少数无棺，葬俗多东西向，仰身直肢或侧身屈肢，二次葬占有很大比例；瓮棺墓均为陶质葬具，南北向，遗骨均不见；随葬品基本组合为鬲、盆、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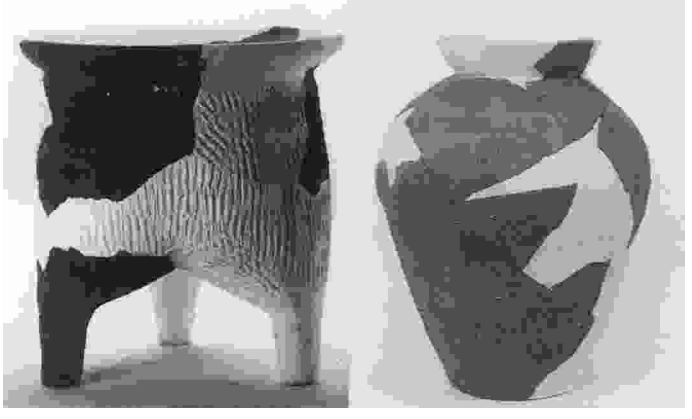
筒腹陶鬲　　袋足陶鬲

张家园上层文化器物（房山镇江营）

2、围坊三期文化

北京地区大坨头文化后出现的围坊三期文化，以直领、敛口、袋足、口沿外饰一周压印锯齿状附加堆纹的花边鬲独具特征。该文化由蓟县围坊遗址第三期[8]而得名，主要分布于燕山南麓和太行山北端以东的京、津、唐地区。有研究者以永定河为界将其划分为东、西两个类型[9]，北京地区的即是以西面塔照遗址为代表的塔照类型，时代为早商至周初。

北京地区属此文化的遗存有房山镇江营与塔照第二期、平谷龙坡早期[10]、昌平雪山第四期、平谷刘家河铜器墓[11]等。该文化陶器以夹砂陶居多，纹饰以粗而僵直交错绳纹常见；器类有鬲、甗、瓮、罐、豆、甑、盆、钵等，其中鬲又有花边高领、袋足、柱足之分，而以口沿外饰一周附加堆纹的高领花边鬲最有特色。刘家河墓葬随葬有小方鼎、旋纹鼎、饕餮纹鼎、鬲、甗、爵、卣、罍、盉、三羊罍、饕餮纹瓿、盘等青铜容器，此外还有铁刃铜钺、铜人面形饰、铜泡、铜当卢、喇叭口金耳环、金臂钏、金笄等武器、马具或装饰品。遗迹有墓葬、灰坑。灰坑有圆形、椭圆形和不规则形口三种。墓葬仅见平谷刘家河墓，为南北向长方形土坑竖穴墓。



陶鬲　　陶瓮

围坊三期文化陶器（房山塔照）

3、张家园上层文化

张家园上层文化是分布在燕山南麓、太行山北段东麓商末周初的考古学文化，由蓟县张家园遗址上层遗存的发掘[12]而得名。有研究者介绍，北京地区最早见有张家园上层文化遗存的是西便门外古庙村[13]。陈光先生以永定河为界，将张家园上层文化划分为镇江营、张家园两个类型[14]，北京地区的即是南区以镇江营遗址为代表的镇江营类型。

北京地区属此文化的遗存有房山镇江营商周第三期、平谷龙坡晚期，另外在琉璃河遗址中也发现大量包含张家园上层文化因素的遗物。该文化陶器以夹云母褐陶为主，有筒腹鬲、鼓腹鬲、袋足鬲、甗、盆、甑、罐、簋及有特色的制陶模具、角制工具、陶拍和骨板。石器有斧、锛、凿、铲、镰、刀等。此外还有骨、角、贝器等。遗迹有灰坑、房址和墓葬。房址均为圆形半地穴式，大房屋为浅穴，地面用黄土铺垫，其周围有众多的圆形小房屋，深穴，地面铺垫干草、树皮。灰坑有圆形、椭圆形、方形、长方形口四种，底面留有铺草或树皮类植物的痕迹。墓葬均为单人仰身直肢，头向东，基本无随葬品，几乎所有未成年儿童都葬在房屋附近的灰坑里。

4、西周燕文化

武王克商，封召公于燕，建立燕国政权，因而在燕山山地产生了以周文化为主体、大量吸收商文化和土著文化的新的考古学文化，称为姬燕文化或燕文化。北京地区的西周燕文化，以房山琉璃河遗址和镇江营商周第四期遗存为代表和最为典型。此外在昌平白浮[15]、顺义牛栏山[16]也发现了西周时期的墓葬，但其文化性质与族属尚存很大争议，有待进一步研究。

西周早中期陶器多为夹细砂和泥质灰、褐陶，盛行交错绳纹；器类有筒腹鬲、联裆鬲、袋足鬲、折沿甗、深腹盆、浅腹盆、小口瓮、罍、小口罐、甑、鼎、圈足簋、钵等。西周晚期陶器多为夹细砂绳纹灰陶，泥质陶则多素面压光或饰旋纹；器类有袋足鬲、联裆带足跟鬲、高圈足簋、小口罐、小口瓮、深腹盆、浅腹盆、甑、钵、豆等。青铜器中礼器以鼎、簋为核心，其次为甗、鬲、爵、盉、觚、觯、尊、罍、卣、壶、盘、匕等，器腹内壁时见铭文。还有戈、戟、剑、矛、镞、胄等武器，斧、锛、刀、凿、锥等工具以及车马器和装饰品等青铜器。此外还有漆器、玉器、骨角器、象牙器、蚌器、玛瑙器、水晶器等。遗迹有城址、居址、灰坑、墓葬等。城址以董家林古城为代表，墙体直接坐落在生土上，系用版筑法分层夯筑而成。墙体分为主墙和内、外护坡三部分。墙体内发现有用鹅卵石构筑的排水沟，城外有护城河。城内中部偏北分布着一些夯土台基和祭祀坑，应为宗庙或宫殿区所在。居址除大型宫殿建筑外，多见筒陋的半地穴式房基，一般作圆形，有柱洞。灰坑以不规则圆形口、坡底浅坑常见，此外亦有圆形和长方形口平底坑。墓葬按规模可分为大、中和小型墓，一般呈南北向，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大、中型墓有棺椁，附有车马坑，有的带有墓道。墓主人头向北，仰身直肢。随葬有铜器、玉器、陶器、原始瓷器和漆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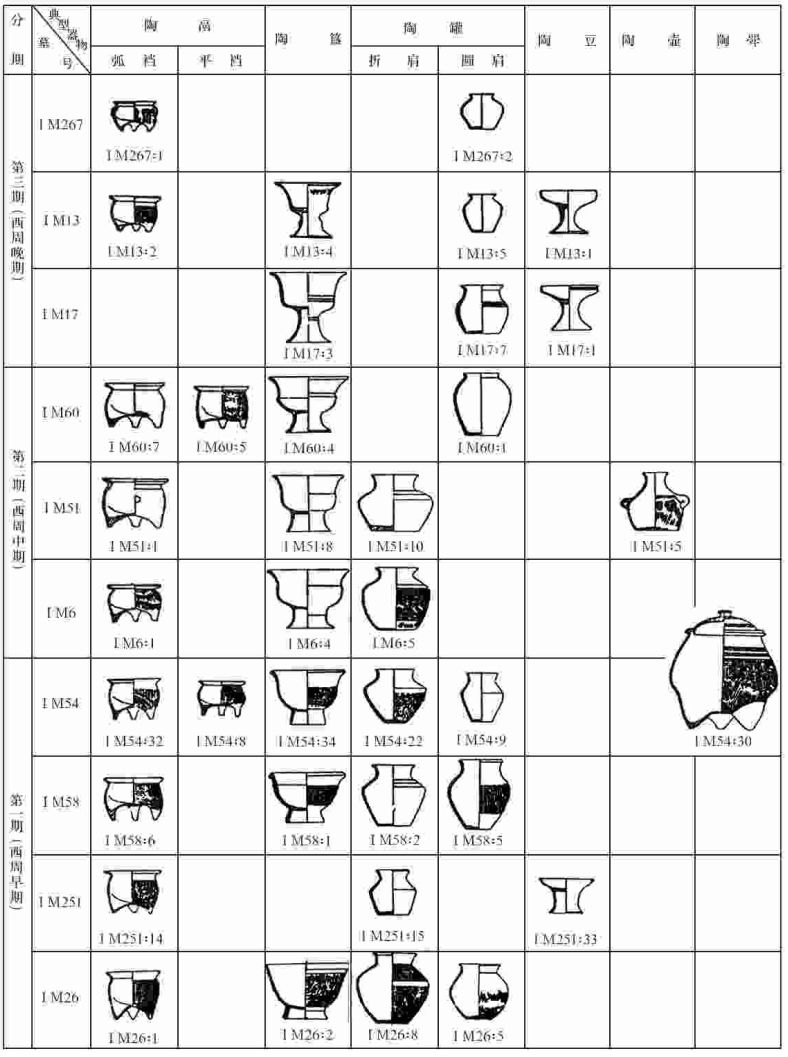
除以上四种考古学文化遗存外，还有其他两种在北京地区尚未发现其典型遗址、但与本地区有着密切关系的青铜文化，即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商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是中国北方地区夏、商早期的青铜时代文化，主要分布在燕山山地和辽西及内蒙古东南部地区。北京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因其多属发掘其它时代遗址时的偶然发现，且多为与大坨头文化兼存的混合类型，故资料较为零散，典型、完整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遗址还未能发现。如平谷刘家河灰坑[17]、密云凤凰山墓葬[18]发现有夏家店下层文化因素的遗物。北京地区商文化遗存发现较少，主要是在平谷、房山、昌平等区县发现的灰坑等小型商代遗迹和零散器物以及包含于房山琉璃河、镇江营与塔照、平谷刘家河及昌平张营等遗址中带有商文化因素的遗物，经过科学发掘所获得系统的商文化资料尚未发现。

二、诸考古学文化关系分析

通过上面的分析，北京地区夏商西周时期相继存在着大坨头文化、围坊三期文化、张家园上层文化、西周燕文化四种考古学文化。纪烈敏先生以武王封燕为界，将燕山南麓青铜文化分为前后两大阶段，即燕国建立前以土著文化为主导的阶段和

燕国建立后以融合并取代土著文化的西周燕文化为主导的阶段[19]。其中大坨头文化、围坊三期文化和张家园上层文化是北京土著文化联系发展的三个阶段，这种阶段划分同样适用于北京地区。

大坨头文化发现之初，由于对发掘资料及遗存内涵认识的局限，并未确立为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因其有较多文化因素和夏家店下层文化相通，故被看成夏家店下层文化或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韩嘉谷先生通过文化内涵的全面比较将其从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区分出来，将包括北京地区在内的该类遗存称为大坨头类型，后又明确命名为大坨头文化[20]。虽然这种观点仍有不同意见，但随着科学发掘所获材料的日益丰富，人们逐渐认识到，燕山南北地区的这两种遗存确实是渊源有别、性质不同而又密切联系的，其作为独立考古学文化的观点已逐渐得到了学界的认同。北京地区大坨头文化受到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强烈影响，经常包含有较多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因素，后者的典型器物在大坨头文化遗址或墓葬中时有发现，因此，以往的考古发现经常把属于大坨头文化的遗存归于夏家店下层文化，未能将两者区分开来。大坨头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关系，一直为学界所关注。已有研究表明大坨头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在陶器、石器、青铜器等方面存在共同之处，如陶器均以夹砂为主，都具有折腹盆、敛口钵、甗、簋等器形，都有一定的彩绘陶等；石器均以斧、锛、凿、镰等磨制石器为主，有少量的细石器；青铜器均为小件青铜制品。但大坨头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在陶器、墓葬葬俗、居址特征等方面区别亦较明显，如陶器中前者以夹砂褐陶为主而后者以夹砂灰陶为主；前者葬俗多东西向，随葬陶器组合为折肩罐、折腹盆、折肩鬲，后者墓主多头向西北，随葬陶器组合为筒形罐、折腹盆、曲腹盆；前者居址面积较大且有细砂铺底而后者面积较小



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主要陶器演变图

且不见细砂铺底。有研究表明，大坨头文化是在继承相当于龙山时期的雪山二期文化某些因素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夏家店下层文化则是燕山以北的小河沿文化在龙山文化的强烈影响下形成的。可见，大坨头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之间的差别要远远大于两者之间的共性，理应作为一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看待。就北京地区而言，典型、完整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尚未发现，多为一种与大坨头文化兼存的混合类型，反映了两者间文化交往的频繁。

围坊三期文化早期的主要陶器都可以在大坨头文化中找到原型，前者基本器类如鬲、甗、罐、盆、钵等与大坨头文化相似，墓葬亦保持大坨头文化的葬俗，表现出与大坨头文化因素一定的承接关系。在已划分的两种类型中，永定河以西的塔照类型和以东的围坊类型都各自与当地早先遗存有较多联系。有学者研究表明，围坊三期文化独具特征的花边鬲，在相当于龙山文化时期的朱开沟遗址第一期已经出现[23]，表现出两文化间的传承关系。平谷刘家河墓葬的属性及年代问题仍有争议，有研究者论证其属围坊三期文化[22]，观点可信，此不赘言；墓中出土的一批具有商文化风格的青铜礼器、铜人面形饰和铁刃铜钺，表明商文化对围坊三期文化施加了很大的影响。可以认定，北京地区的围坊三期文化是在当地大坨头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西边的朱开沟文化和北上的商文化因素而发展起来的。围坊三期文化和大坨头文化亦存在明显差别，突出表现在前者鬲类口沿明显变高出领，花边鬲盛行，而后者鬲类只是折沿或翻缘，没有明显的领部，鬲口沿饰花边的现象还很少见，表明这两支文化在发展中都各自保持着固有的传统特征。围坊三期文化富有特色的花边鬲，到晚商时期广泛流行于长城地带，与之相应出现了独具特征的北方系青铜器群。

北京地区张家园上层文化是继围坊三期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考古学文化。关于张家园上层文化与围坊三期文化的关系，学界存有两者是否为同一考古学文化的不同认识。随着材料的积累和对文化内涵的分析，将两者区分为不同考古学文化的观点为更多的学者所接受，笔者经过对两者遗存陶器、年代关系的重新分析，亦赞成这种观点。此外，在认为两者属不同考古学文化的观点中，对两者关系又有前后相继的两种文化[23]或具有文化谱系差别的两类遗存[24]的不同意见。近来有研究者通过年代、分期和类型划分的讨论，将围坊三期文化和张家园上层文化的关系进一步细化，认为永定河以西的围坊三期文化塔照类型和张家园上层文化镇江营类型在文化谱系上具有明显的承继关系，而在永定河以东的围坊三期文化围坊类型和张家园上层文化张家园类型则主要表现为替代关系[25]。值得注意的是，张家园上层文化中包含有典型的周文化系统因素，如联裆鬲、无足跟袋足鬲、细绳纹簋等，均为西周早期常见器物。无足跟袋足鬲、细绳纹簋虽属商文化因素遗物，但在西周早期已经融入到周文化系统中，表明张家园上层文化在形成过程中受到了周文化的强烈影响。此外，张家园上层文化还包含有以筒腹鬲、青铜短剑为代表的北方文化因素，表明两种文化之间的交往与联系。概之，就北京地区而言，张家园上层文化（镇江营类型）是在承继围坊三期文化(塔照类型)的基础上，吸收融合了包括周文化在内的多源头文化而形成的一体文化。西周早期召公封燕，随着周人代表的中原文化系统的到来及周燕文化的北进扩张，张家园上层文化逐步解体并最终消亡。

综合西周燕文化遗存可以发现，西周早期陶器种类丰富，西周、商、土著诸文化因素共存。西周中、晚期，陶器种类较早期减少，殷墟晚商文化因素基本不见。这一现象表明西周早、中期是燕文化的形成时期，表现出周文化对当地土著文化以及周边文化的借鉴吸收。从西周中期开始不同的文化因素逐渐融为一体，文化面貌发生了变化，燕文化形成。表现出一方面

周文化将当地文化影响日益排出，扩大了周文化在该地域及其周边地区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受到当地文化和其他文化影响后也日益形成自己的文化特征。由此，以北京为中心的西周燕文化的渊源，是在中原周文化的基础上，融合了大量商文化和当地土著文化即张家园上层文化的某些因素而形成的。可见西周燕文化是中原地区西周文化向周边地区传播的结果。

三、结 语

北京地区夏商西周时期存继的大坨头文化、围坊三期文化、张家园上层文化、西周燕文化四支考古学文化可以武王克商封燕为界，分为以土著文化为主导的阶段和以西周燕文化为主导的阶段。其中的土著文化即大坨头文化、围坊三期文化、张家园上层文化年代相继、分布地域部分重合且部分文化因素作为传统而承继下来，表明这几支土著文化是北京地区具有一定渊源关系且连续发展的考古学文化。西周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结束了土著青铜文化居主导地位的局面，使北京地区青铜文化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①天津市文化局考古发掘队：《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大坨头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66 年 1 期。

②⑥⑱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考古四十年》，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 年。

③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镇江营与塔照——拒马河流域先秦考古文化的类型与谱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 年。

④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市昌平区文化委员会：《昌平张营——燕山南麓地区早期青铜文化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 年。

⑤北京市文物管理处等：《北京琉璃河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考古》1976 年 1 期。

⑦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平谷刘家河遗址调查》，《北京文物与考古》第三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 年。

⑧天津市文物管理处考古队：《天津蓟县围坊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83 年 10 期。

⑨㉕蒋刚、王志刚：《关于围坊三期文化和张家园上层文化的再认识》，《考古》2010 年 5 期。

⑩王鑫、楼朋林：《平谷县龙坡遗址发掘简报》，《北京文物与考古》第 6 辑，民族出版社，2004 年。

⑪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市平谷县发现商代墓葬》，《文物》1977 年 11 期。

⑫天津市文物管理处：《天津蓟县张家园遗址试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一），文物出版社，1977 年。

⑬⑲纪烈敏：《燕山南麓青铜文化的类型谱系及其演变》，《边疆考古研究》（第 1 辑），科学出版社，2002 年。

⑭陈光：《西周燕国文化初论》，《中国考古学的跨世纪反思》，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9 年。

⑮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地区的又一重要考古收获——昌平白浮西周木椁墓的新启示》，《考古》1976 年 4 期。

⑯程长新：《北京顺义县牛栏山出土一组周初带铭铜器》，《文物》1983 年 11 期。

⑰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市拒马河流域考古调查》，《考古》1989 年 3 期。

⑳韩嘉谷：《大坨头文化陶器群浅析》，《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1 年。

㉑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朱开沟遗址》，《考古学报》1988 年 3 期。

㉒刘绪、赵福生：《围坊三期文化的年代与刘家河 M1 的属性》，《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 年。

㉓韩嘉谷、纪烈敏：《蓟县张家园遗址青铜文化遗存综述》，《考古》1993 年 4 期。

㉔陈雍：《考古的天津》，《庆祝张忠培先生七十岁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4 年；梁宝玲：《论张家园墓地的年代和文化属性》，《北方文物》2001 年 2 期。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馆员）

北京地区出土的几方唐代女性墓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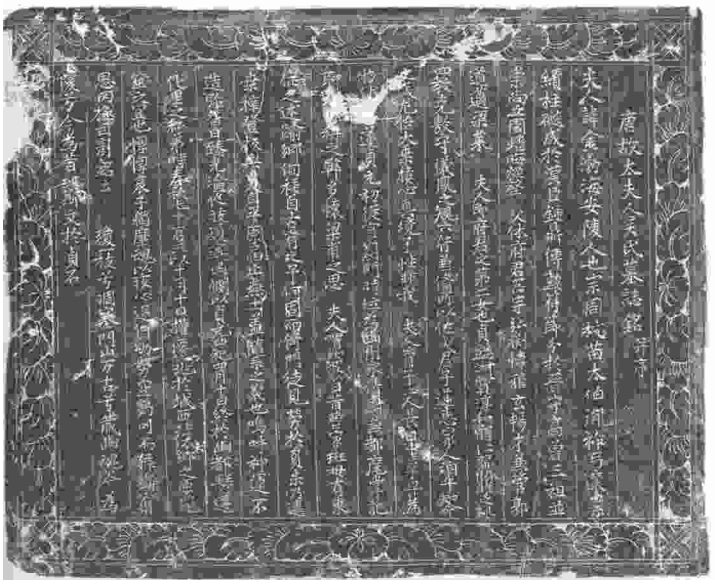
高智伟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墓志最为繁多的一个时代，“皇族贵戚、达官显宦、一般官吏、庶民百姓、宫女尼姑、僧人道士，无不有墓志入藏”[①]，而这其中女性墓志又占据了相当的比例。由周绍良和赵超主编的《唐代墓志汇编》和《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分别收录了唐代墓志 3543 篇和 1575 篇，在这五千余篇墓志中，大概有一千五百余篇的志主为女性，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②]而其余的男性墓志中也往往会或多或少的提及其女性家庭成员的情况。

唐代墓志的写作比较形式化，对志主的描写多为歌功颂德的词句，但正是这些形式化、理想化的事迹和品德十分集中的反映了一个时代的规范性观念和价值认同。以唐代女性墓志为例，唐代女性往往都是“三岁知让，五岁知戒，七岁能女事，善笔札，读书通古”[③]，出嫁之后则是“睦友娣姒，由中履顺，德礼无为”[④]，教育子女则是“训女四德，示男六经”[⑤]。北京地区出土的唐代女性墓志虽然数量不是很多，但同样有比较相似的描述，可以对当时妇女在社会中的角色、结婚年龄以及唐代幽州地区的乡村里坊等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一、几方唐代女性墓志的大致情况

《新中国出土墓志·北京》中共收录了 36 方完整的唐代墓志，时间跨度从载初元年（690 年）到文德元年（888 年）。其中有10方女性墓志，分别为：宝应元年（762 年）的《大燕游击将军赵公故赵郡李氏太原王氏二夫人墓志铭并序》、永泰二年（766 年）的《唐处士田公故夫人北平阳氏墓志铭并序》、贞元四年（788 年）的《唐故太夫人吴氏墓志铭并序》、长庆三年（823 年）的《唐故妫州怀戎县令杨府君夫人河南达奚氏墓志铭并序》、太和元年（827 年）的《唐卢龙征马使游击将军守左武卫大将军赐紫金鱼袋曹朝宪故夫人太原陶氏墓志铭并序》、太和七年（833 年）的《唐故彭城夫人刘氏墓记铭并序》、会昌六年（846 年）的《唐故蔡氏夫人墓志铭并序》、大中元年（847 年）的《唐故游击将军守左金吾卫大将军试鸿胪卿纪公夫人张氏墓志铭》、咸通十一年（870



《唐故太夫人吴氏墓志铭并序》

年）的《唐故幽州副将乐安郡孙府君夫人太原王氏合祔墓铭并序》以及乾符六年（879年）的《唐高道王尚准故夫人窦氏墓志铭并序》，除此之外，在16方志主为男性的墓志中也提及了志主夫人的家庭情况等内容。

这10方女性墓志的大致情况如下表所示：

志主	年龄	去世时间	去世地点	葬于何处	子女情况
赵郡李氏	廿有九	开元十四年		郡城西北桃花源	子一人
太原王氏	享年五十六	大燕圣武二年			
北平阳氏	春秋七十有三	永泰二年	蓟城平朔里之私第	蓟城西南廿里正礼乡南胡	子二人
渤海吴氏	春秋七十有三	贞元四年	幽都县遵化里之私第	城西北保大乡之原	子二人
河南达奚氏				良乡董村原	子一人，女一人
太原陶氏	春秋五十七	太和元年	幽都县来远坊私第	蓟城东南八里会川乡从善村东北原	子一人，女三人
彭城刘氏	年卅有七	太和七年	蓟县开阳坊之私第	幽府东南十里燕台乡高义村之原	一男二女
蔡氏		会昌六年	蓟县燕都坊之私第	幽都县界礼贤乡龙道村西南一百廿步之原	子六人，女三人
清河张氏	春秋卅九	大中六年	幽陵之东潞邑接肆坊临衢之第	蓟城西幽都县幽都乡石槽之原	子一人，女一人
太原王氏	春秋九十七	咸通八年		良乡县金山乡韩村管西南三里大塋	子二，孙男二，孙女一
窦氏	降年□十有五	乾符六年	蓟县檀州街之私第	蓟县城北十里樊林之原	子三，女一

注：1、表格所填写内容均为墓志中的语言，空缺处是因为文中没有明确的说明。

2、太原王氏的去世时间根据志文的内容推算应为咸通八年，上文所说的咸通十一年应为其与丈夫合祔的时间。

二、唐代女性的几个重要角色

关于唐代女性的几个重要角色，《新唐书》中有比较明确的说明：“女子之行，于亲也孝，妇也节，母也义而慈”[16]。这段话的性质是价值判断，但比较清晰的指出

了“女儿”、“妇”、“母”是任何一位女性在生命中要扮演的三个基本角色。虽然说《新唐书》是北宋时所修撰，但其观点应该与唐代没有太大的区别。

比如《大燕游击将军赵公故赵郡李氏太原王氏二夫人墓志铭并序》中称赞其夫人：“（李氏）性实贞顺，生而惠和，婉容神姿，柔德天假……奉舅姑也，配觿以听晨鸡；佐君子也，倚梧以谐鸣凤。内睦宗族，外和姻亲。”

再如吴氏夫人，“贞懿淑质，淳和体仁。习《关雎》之训，四教克敷；守仪凤之规，六行兼备。所以佐成君子，通惠家人”[7]。

通过以上两例可以看出，唐代的女性在婚前是如何的知书达理以及婚后如何尽心的侍奉公婆，充分体现其“女儿”的角色，那以下几例就更多的体现其“为人妇”、“为人母”的角色了。

“（陶氏）罄礼则以奉舅姑，秉谦卑用和娣姒……埙篪合韵，琴瑟和鸣。举案梁鸿之妻，贤明柳惠家室。断织教子，闻夫徙邻，继美前贤，垂裕来史”[8]。

蔡氏婚后“齐眉之敬无失，断织之教亟闻。正肃闺闱，外和内理，辅佐君子，著清慎公平之名”[9]。

同样，彭城刘氏在婚后“琢磨礼范，修持德门，尽爱敬以事舅姑，尚友睦以和娣姒。自乐得好逑，《关雎》之义备矣。抚儿育女，《尸鸠》之仁积矣。采苹藻而修法度，休穆之声著矣”[10]。

此三例重点突出其婚后夫妇二人的良好感情及悉心教育子女、在家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形象。

三、从“笄年”、“及笄”看唐代女性的婚姻年龄

在这 10 方女性墓志中，有两方在志文中比较明确的写出了志主人出嫁时的年龄。其一是北平阳氏“年十有八，作嫔于田□□”，出嫁时年龄为 18 岁；其二是嫁给孙英的那位太原王氏，“二八笄年，归于孙公”，出嫁时 16 岁。

另外还有几方墓志中没有很明确的写出志主出嫁时的年龄，如在开元十四年去世的李氏，“及笄之岁，以羔雁之礼，归我赵公”；陶氏“年在初笄，适兹全族”，其志文中又说“夫人作配君子，合卺结缡，垂四十春”，陶氏去世时 57 岁，而她与丈夫共同生活了四十个春秋，由此推算陶氏出嫁时应为 17 岁。

笄，《说文》释曰“簪也”，是头饰的意思。笄年表示女子已经成年，到了可以结婚的时候了。《礼记·曲礼上》记载：“男二十冠而字，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女子许嫁，笄而字”，按郑玄注，笄年为 15 岁。但《礼记·杂记下》又提到：“女虽未许嫁，年二十而笄，礼之。”由此可见，笄在古时候所代表的年龄也可以有浮动的余地。另外，在唐代的女性墓志中，有“初笄”、“幼笄”、“笄初”、“弱笄”等多种说法，如元和年间的任氏，“才及笄初，慕适君子，乃以龟筮娉嫡，即故试太常卿李府君”[11]。显庆年间的李氏，“年甫初笄，出适张氏”[12]。

唐初为了使社会经济从战乱中快速恢复过来，大力鼓励婚嫁，而且法定的结婚年龄比较低。贞观初年，太宗李世民“诏民男二十、女十五以上无夫家者，州县以礼聘娶；贫不能自行者，乡里富人及亲戚资适之”[13]。到了唐玄宗时候，“（开元）二十二年敕，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听嫁娶”[14]。玄宗之后，唐代再没有颁布过新的有关婚姻年龄的规定，大概“男十五，女十三”已成为约定俗成之婚龄。有学者经过研究指出，“笄年”、“初笄”的年龄大致为 15 岁，而“及笄”、“幼笄”的大致年龄是 14 岁。[15] 如果按照这个标准，那 10 方墓志中的陶氏、王氏、阳氏就属于晚婚的类型了。由此可见，“初笄”、“笄年”之类的词语与其说是表示志主出嫁的年龄，倒不如说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强调志主成婚的年龄小。

四、夫妻合葬问题

唐高宗仪凤二年（677 年）的《大唐故常州江阴县丞贾府君墓志铭并序》中有“合葬非古，兹言徒设，生则移天，死则同穴”的语句，[16] 另外武则天久视元年（700 年）的《大周故刘郡君墓志铭》中也有同样的语句。[17] 女子在婚前以父为天，出嫁后则以夫为天，“移天”就是从以父为天转换为以夫为天，而“同穴”则可以说是“移天”的必然结果。由此可见，夫妻合葬在唐代是比较流行的葬俗，且带有相当的正统性。

但在这 10 方墓志中，李氏和王氏作为其丈夫的前后两任妻子，死后葬于一处，但不清楚其丈夫是否与她们葬在一处。另有 7 方墓志中只提及志主的埋葬地而没有明确指明是否为夫妻合葬。剩余的两方墓志，志主在去世后都与其丈夫“合祔”：达奚氏“先府君而终”，待其丈夫去世以后才“会葬于良乡玄寝”；王氏的丈夫孙英开成二年（837 年）去世，葬于“良乡县金山乡韩村管西南三里大茔”，王氏死后“权窆于丘园”，三年之后才“龟筮祔于府君旧茔”。说明合祔之前进行了占卜，得到吉兆之后才得以与丈夫葬于一处。

夫妻二人死后未能合葬，可能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二人去世的时间间隔比较长，合葬就会比较困难，或者无力迁葬、错过了时机，或者是占卜的原因等。达奚氏和王氏能和丈夫合葬，不排除二人在生前就已经有过约定的可能，或者是后人的特意安排使然。这说明，唐代夫妻合葬虽然比较流行，但也没有成为绝对的规律，夫妇二人死后不合葬的情况也比较普遍。

五、墓志中体现出的两个问题

1、“安史之乱”期间的伪号使用问题

《大燕游击将军赵公故赵郡李氏太原王氏二夫人墓志铭并序》中，赵公的官职是“大燕游击将军”，而夫人王氏的去世时间是“大燕圣武二年七月五日”。说到“大燕圣武”，就不得不提到安禄山，提到“安史之乱”。天宝十四载（755 年）十一月，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南下，“明年（756 年）正月，僭称雄武皇帝，国号燕，建元圣武”[18]，圣武二年也就是唐肃宗至德元年（757 年）。在墓志的志文中如此使用“伪号”，在“安史之乱”期间还是比较常见的。冻国栋先生曾经利用墓志资料对“安史之乱”期间“伪号”的使用做过专门研究，以此来探讨当时的吏民心态。[19] 可以说，墓志当中“伪号”的使用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安史之乱”对唐代中央政权带来的严重冲击。

2、唐代女性的佛教信仰

关于唐代女性的宗教信仰问题，已有学者从墓志的角度加以关注，此不赘述。[20] 而唐代自武则天崇佛抑道之后，佛教一直比较繁盛。而幽州地区的佛教也发展得比较迅速且日益兴盛，究其原因，不外乎幽州政治军事地位重要、中央朝廷的关心扶持及幽州当地统治者的崇佛弘法等因素，[21] 就连发动安史之乱的安禄山、史思明都曾各为幽州城内的悯忠寺（今法源寺）建塔一座。[22] 此处只从墓志中举两个例子来佐证唐代女性的佛教信仰：

其一，吴氏夫人“洎乎知命之岁，尤悟大乘，棲心真境，了性非我”[23]。“大乘”当指代佛法，说明吴氏夫人在知天命之岁，更加醉心于佛法了，此前也应是一名虔诚的信徒。

其二，达奚氏去世之后，她的女儿“纯孝所至，誓不从人，身桂法衣，以终丧事”[24]。《法苑珠林》载：“出家着法衣，威仪具美，舍离烦恼而复得一切神智入其身内”，可知法衣乃出家之人所穿的衣服，达奚氏之女应也是皈依了佛教。

六、墓志中的幽州乡村里坊名称

唐代的里坊及乡村名称，由于年代久远，流传下来的多有讹误之处。赵其昌先

生曾根据考古发掘资料，尤其是出土墓志，复原了唐代蓟县和幽都县部分乡、村名称和大致范围。[25]此后，鲁晓帆、陈康等先后利用墓志资料对幽州的坊名和村乡进行过考证。[26]在这10方女性墓志中，有个别的村乡名称在前人的考证中没有出现过，现列举如下，以期对以往的研究成果做一点儿补充：

1、正礼乡，出自北平阳氏墓志，“卜其宅兆于蓟城西南廿里正礼乡南胡……礼也”。

2、良乡董村，出自河南达奚氏墓志，“葬于良乡董村原，礼也”。

3、良乡县金山乡韩村，出自孙府君夫人太原王氏合祔墓志，“归葬于良乡县金山乡韩村管西南三里大茔，礼也”。

4、樊林（村），出自窦氏墓志，“筮宅于蓟县城北十里樊林之原，礼也”。

①于平：《中国历代墓志选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一册第1页。

②姚平：《唐代妇女的生命历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4页。

③《唐郎州员外司户薛君妻崔氏墓志》，载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元和075，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853页。

④《有唐卢氏故崔夫人墓铭并序》，载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大中128，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350—2351页。

⑤《唐朝议郎行凤州司仓参军上柱国司马君夫人新安孙氏墓志铭并序》，《唐代墓志汇编》，元和153，第2057页。

⑥《新唐书》卷205《列女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5816页。

⑦㉓《唐故太夫人吴氏墓志铭并序》，载《新中国出土墓志·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9页。

⑧《唐卢龙征马使游击将军守左武卫大将军赐紫金鱼袋曹朝宪故夫人太原陶氏墓志铭并序》，载《新中国出土墓志·北京》，第16页。

⑨《唐故蔡氏夫人墓志铭并序》，载《新中国出土墓志·北京》，第20页。

⑩《唐故彭城夫人刘氏墓记铭并序》，载《新中国出土墓志·北京》，第17页。

⑪《唐故任氏夫人墓志铭并序》，《唐代墓志汇编》，元和007，第1982页。

⑫《大唐故显庆四年二月二日张达妻李夫人墓志铭并序》，《唐代墓志汇编》，显庆091，第285页。

⑬《新唐书》卷2《太宗本纪》，第27页。

⑭《唐会要》卷83《嫁娶》，中华书局，2006年，第1811页。另外《新唐书·食货一》中也有“诏男十五、女十三以上得嫁娶”的类似记载。

⑮李斌城、李锦绣、张泽咸等著：《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49页。

⑯《唐代墓志汇编》，仪凤008，第631页。

⑰《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久视006，第379页。

⑱《新唐书》卷225《逆臣上·安禄山》，第6418页。

⑲冻国栋：《墓志所见唐安史乱间的“伪号”行用及吏民心态——附说“伪号”的模仿问题》，《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0辑，2003年。

⑳焦杰：《从唐墓志看唐代妇女与佛教的关系》，《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万军杰：《从墓志看唐代女性佛道信仰的若干问题》，《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9辑，2002年；苏士梅：《从墓志看佛教对唐代妇女生活的影响》，《史学月刊》2003年第5期。严耀中先生曾根据《唐代墓志汇编》和《唐代墓志汇编续集》进行过统计，不包括女性出家者在内，共有235个妇女信仰佛教的例子，可见佛教在唐代女性中的巨大影响，具体参见其《墓志祭文中的唐代妇女佛教信仰》一文，载邓小南主编：《唐宋女性与社会》，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

㉑黄春和：《隋唐幽州佛教的发展及其原因》，《首都博物馆丛刊》第8辑，1993年。

㉒《日下旧闻考》卷60《城市》，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972—973页。

㉔《唐故妫州怀戎县令杨府君夫人河南达奚氏墓志铭并序》，载《新中国出土墓志·北京》，第15页。

㉕赵其昌：《唐幽州村乡初探》，载《中国考古学会第一届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赵其昌：《唐幽州村乡再探》，《首都博物馆丛刊》第9辑，1994年。

㉖鲁晓帆：《唐幽州诸坊考》，《北京文博》2005年第2期；陈康：《唐代幽州蓟城里坊、村乡之我见》，《北京文博》2006年第1期。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馆员）

首都博物馆藏北京地区出土明代火铳火炮

于力凡



明代是中国古代火器发展的鼎盛时期，火器在战争中已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自明朝建国，北京地区就成为明政府打击元蒙残余势力的军事重地。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迁都北京后，北京地区关隘城防更是成为明朝军事防御的重中之重。首都博物馆馆藏一批北京地区出土的明代火铳火炮，笔者整理归类甄选其中一部分，集中在永乐、嘉靖时期。永乐、嘉靖时期是明代火器发展史上两个重要阶段。笔者在对实物资料自测考察的基础上，结合历史文献记载及已有的研究成果做进一步的探讨。

一、铳炮铭文

明代火铳火炮上很多都镌刻铭文，铭文内容有铳炮制造时间、制造机构、制造人、编号、名称、重量、装药装弹量等等。

1. 制造机构。明代“私贩硝磺之禁固严，而火器私造之禁尤严。我太祖自平群凶之后，火器收之神机库，库曰神机，言不欲轻泄也。虽边镇总兵，也不得私藏私置，盖谓此无敌之器，不敢轻用，亦不容人人晓其制度而私相授受也”。[①]洪武初期火器由宝源局制作，后设军器局、兵仗局。《明史》：“明置兵仗、军器二局，分造火器。”[②]兵仗局隶属内府衙门，为宦官官署八局之一。军器局隶属工部。洪武铳炮铭文有卫所制造，说明洪武时期各地方卫所也可以制造火器。明成祖朱棣称帝后加强了对火器制造的控制，铳炮铭文内容只有以“天”、“胜”、“英”等为字头的统一编号和制造年月，数字均为大写，镌刻规格一致，反映了永乐时铳炮由中央政府统一制造的制度。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正统开始朝廷有限制的批准一些边镇可以制作火器，正德、嘉靖、崇祯时逐渐增多。

序号5、6、9、10、11铭文“兵仗局造”。实物显示嘉靖年“兵仗局造”款识均为干支年款，数字大写。《中国通史》：“明初火器的成造主要由内府兵仗局负责，正统以后渐由军器局分造。兵仗局所

甄选明代火铳火炮一览表

序号	名称	自测量（厘米）（克）	出土地点	自测铭文
1	永乐款铜铳	长36，前膛长22.3，外口径3，内口径1.5，药室长6，銎长7.7，銎外径4，銎内径3，重2193g	密云	銎：天字叁萬肆千伍佰肆拾玖號 永樂拾貳年叁月 日造
2	永乐款铜铳	长43.5，前膛长29.6，外口径7.2，内口径5.1，药室长8.7，銎长5.2，銎外径7.5，銎内径5.2，重8300g	居庸关	筒：英字壹萬伍千叁拾肆號 永樂拾叁年玖月 日造
3	正统款铜铳	长36，前膛长22.2，外口径3.1，内口径1.5，药室长6.2，銎长7.6，銎外径4.3，銎内径3.1	密云	銎：天字玖萬貳千捌百捌號 正统元年叁月 日造
4	铜佛朗机	母铳：长131.5，前膛长58,外口径8.3，内口径3.8，槽18×7.6，尾长41 子铳：长23.7，前膛长11.5，外口径5.3，内口径3.2，药室长6	延庆	母铳：嘉靖二十八年造胜字四十二号 刘桂 子铳：胜字十七号
5	流星铜炮	母铳：长120，前膛长74，外口径7，内口径4，槽27×7.5 ，銎长11.5，銎外径6.8，銎内径4 子铳：长29.6，前膛长16，外口径3.6，内口径2.5，药室长6.8	延庆	母铳：銎正面：胜字捌百伍拾玖號流星砲筒 嘉靖辛卯年兵仗局造； 銎背面：重叁拾捌斤 子铳：重陆斤拾口两
6	流星铜炮	母铳：长120，前膛长74，外口径6.8，内口径4，槽28×7.5，銎长11.5，銎外径6.8，銎内径4 子铳：长29，前膛长16，外口径3.6，内口径2.5，药室长6.8	延庆	母铳：銎正面：胜字壹千贰拾壹號流星砲筒 嘉靖辛卯年兵仗局造； 銎背面：重肆拾陆斤 子铳：口口百玖拾柒號流星砲嘉靖庚寅年造；重柒斤肆两
7	佛朗机式铜铳	母铳：长63.7，前膛长40，外口径5，内口径2.5，槽12×4，銎长7，銎外径5，銎内径3.1，重4620g	延庆	筒：嘉靖二十四年造胜字四千六十四号 銎：铸匠谷口
8	佛朗机式铜铳	母铳：长64.5，前膛长40，外口径4.8，内口径2.5，槽12×4，銎长7，銎外径5.1，銎内径3.3，重4656g	延庆	筒：嘉靖二十四年分年例胜字三百七号 銎：作头阮义
9	马上佛朗机铜铳	母铳：长73.7，前膛长46，外口径4.8，内口径3.1，槽11.6×4.2，銎长8，銎外径4.9，銎内径3.1，重5004g	昌平	銎：马上佛朗机铳筒柒千捌百陆拾壹號 嘉靖甲辰年兵仗局造　重玖斤捌两
10	马上佛朗机铜铳	子铳：长15.5，外口径2.7，内口径1.7	延庆	马上佛朗机铳贰千伍百伍拾柒号 嘉靖庚子年兵仗局造　重壹斤拾贰两
11	马上佛朗机铜铳	子铳：长15.2，外口径2.8，内口径1.6	延庆	马上佛朗机铳贰千肆百肆拾号 嘉靖庚子年兵仗局造　重壹斤拾两
12	铁三眼铳	长47	延庆	
13	铜药匙（铳炮附件）	长15.1，匙宽2.7，深1.0，柄长6.8	延庆	柄：天字八万八百九十九号

造……火器四十多种。其火器主要供给各边关使用。兵仗局设掌印太监一员，提督军器库太监一员，该局的工匠人数基本在一千七百人左右，最多时达三千多人。兵仗局附设火药局，实则是兵仗局的军器库。内府兵仗局是明代很重要的军事手工业，它与军器局、南京兵仗局、各地方卫所的军器生产共同支撑起明代的军事工业，并在其中起着一定的主导作用，兵仗局所造兵器有时成为各卫所成造兵器的标准。”[③]

《大明会典》：“隆庆五年题准，军器局年例造完，开数送部，委官查验如式贮库。”“军器局嘉靖二十二年……又停年例铳炮”。[④]序号 8“嘉靖二十四年分年例

胜字”应该是属年例铳炮。明代铳炮大部分都是由中央兵器机构主造。能肯定的是表中嘉靖年铭文铳炮均为中央兵器机构制造，地方造铳炮的铭文款识有别于中央制造的统一编号规格。嘉靖时中央制造火器机构是兵仗局、军器局。序号4、7、8铭文嘉靖某年造是用纪年款，数字简写，有别于“兵仗局造”款识规格。序号8又属年例铳炮，《大明会典》有关于军器局造年例铳炮的记载，据此推断镌刻序号4、7、8这类款识铭文的有可能是军器局制造。但是由于实物及文献上都没有查到明确记载，所以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2. 编号。明代铳炮编号包含两部分内容：命名和编次。出土实物显示洪武铳炮就已进行编号。表中永乐铳炮命名“天字”、“英字”。嘉靖铳炮命名“胜字”、“年例胜字”。表中编号反映了明代铳炮编号的三种情况：1、同类型铳炮在同一时期用同一种命名编次，例如永乐轻型火铳都以“天字”命名编次。2、同类型铳炮在同一时期有不同命名编次，例如嘉靖二十四年造64厘米火铳，序号7以“胜字”命名编次，序号8以“年例胜字”命名编次。3、不同类型铳炮在不同时期用同一种命名编次，例如序号4嘉靖二十八年造130厘米佛朗机、序号7嘉靖二十四年造64厘米火铳都以“胜字”命名编次。《大明会典》对火器编号也有些记载：“凡火器编号正统十年题准，军器局造碗口铜铳编胜字号。景泰元年改编天威字。天顺元年仍编胜字。成化四年题准，手把铜铳编列字。”[5]

3. 铳炮制作时间。《大明会典》：“弘治以前定例军器、鞍辔二局三年一造，碗口铜铳三千个、手把铜铳三千把。”[6]永乐铳炮上铭刻的制造时间有永乐七年、十二年、十三年、十九年、二十一年，没有局限三年。据永乐铳炮制造时间推断其有可能是和明成祖在永乐八年、十二年、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五次亲征漠北的战事有关，是依据战事或军队编制需求决定铳炮制造时间。序号8铭文“年例胜字”，“年例”谓历年如此的常例，所以应该是每年有造。《大明会典》记载兵仗局“又有弓弩火器，本局不时成造。”[7]

《大明会典》：“洪武十九年，令籍诸工匠验其丁力，定以三年为班，更番赴京。轮作三月，如期交代，名曰轮班匠。”“上一以一季为满。完日随即查原勘合，及工程明白，就便放回”。[8]这说明当时是以三个月即一季为一工期。永乐七年、十三年、十九年、二十一年铳炮铭刻制造时间“九月”，永乐十二年、正统元年火铳铭刻制造时间“三月”。“三月”、“九月”应该是和当时“轮作三月”、“上一以一季为满”的工期制度有关。“某月”即是完工日期，可以认作为某一批次的记载。

4. 铳炮制造人。序号4“刘桂”、序号7“铸匠谷□”、序号8“作头阮义”即火器制造人。铭刻制造人是采用了“物勒工名”的传统方法。明政府认为“中国之长技莫过于火器”、“今知慑虏者火器耳”，因此火器的质量就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胜负，所以对火器制造质量尤为重视。《大明会典》：“嘉靖四十二年题准，内局铸各边火器，演试炸破者，发局陪料改造，仍查究经造员役。”[9]《陕西四镇军务事宜疏》上奏固原各兵营的火器“损失大半”，建议朝廷“立法追赔选匠督造”。[10]万历时兵部广东巡按田生金等人上奏：“仍将督造及工匠姓名刊刻于战船火器之上，如遇绽裂炸损，即将工匠及督造之人从重究治。”[11]洪武中期铳炮铭文中出现制造人。建文、永乐、成化、弘治年铳炮未见铭刻制造人。嘉靖时铳炮铭文又现制造人。铳炮上铭刻制造人是火器制造建立以备核查制度，出现质量问题可以直接追究当事人的责任，进而起到保证铳炮质量的作用。

5. 铳炮重量。明代铳炮铭刻重量开始见于洪武铳炮，永乐至弘治铳炮未见铭刻重量，嘉靖、万历一直到崇祯铳炮又出现了铭刻重量。序号5、6、9、10、11这三组母铳、子铳都铭刻了重量。就序号5、6母铳分析，这两件规格基本一致，都是嘉靖

辛卯年兵仗局造，都是以胜字编号，序号6母铳“重肆拾陆斤”、序号5“重叁拾捌斤”，重量差了8斤，这个差额还是比较大的，说明当时的制造技术还不能完全做到同一规格的铳炮重量一致。嘉靖以后明军作战很多时候是在舟船、车辆上安装铳炮，因此在铳炮上铭刻具体重量让使用者一目了然，更有利于铳炮的安装。自嘉靖始铳炮铭刻重量再起可能是迎合战事的需要。

6. 铳炮名称。序号5铭文“流星砲”、序号9“马上佛朗机”都是铳炮的名称。《大明会典》：“兵仗局造：流星砲”。“军器局造：（嘉靖）二十三年造马上使用小佛朗机一千付。”[12]

二、铳炮类型及使用

1. 序号1永乐手把铳属单兵轻型火铳。由前膛、药室和尾銎三部分构成。前膛从药室到铳口逐渐变细，前膛与药室相通。药室为椭圆形空腔，室壁有一长方形小槽称火门，火门有一小孔与药室相通，上铸活动扣盖。尾銎中空，与药室不通，尾銎口沿稍大呈喇叭形，可安木柄，便于发射者把持。使用方法是：先将火药由铳口装进药室，再塞入木马子，然后将散弹装入前膛，用火绳通过火门点火，引燃发射药。由于存在弹药装填费时、发射速度较慢的缺点，战术上也有采用三排轮放法。“令军中置火铳、神机箭为三行，列阵中，待象进，则前行铳箭俱发；若不退，次行继之；又不退，三行继之。”[13]永乐手把铳实物出土较多，从已知实物的编号显示当时的生产数量很大。《明代前期有铭火铳初探》一文中提供两件实物“天字伍万叁千肆拾壹号 永乐拾玖年玖月 日造（后刻：皇字二号 隆庆三年□运）”，“天字叁万肆千陆佰陆号 永乐拾贰年叁月 日造（后刻：居台子二十二号居路石峡隆庆伍年领）”，显示直到一百多年后的隆庆三年、五年，永乐火铳还在用于装备军队。[14]这一规格火铳的制造从永乐七年起至正统年止，基本没有大的变化，是明初军队主要火器装备之一。

2. 序号2永乐中型火铳。形制构造与轻型基本一致，所不同的是铳筒较粗，前膛为直筒形，重量较轻型火铳重。序号1銎长7.7厘米，内径3厘米，序号2銎长只有5.2厘米，内径却是5.2厘米。考虑上述因素序号2的銎可以安装木柄，但是用手把执可能效果不是很好，安放在炮架上使用效果会更好。《明史》：“神器制作以铜、铁为之，大小不等。大者用车，小者用架、用托，大利于守，小利于战。”[15]

3. 药匙是装填火药的专用工具，永乐天字铳已开始配用药匙。馆藏北京地区出土的药匙铭文有“天字号药匙”、“天字某某号”、“胜字某某号”三种，尺寸基本相同，匙呈撮箕状，前端口部宽1厘米左右，能直接插入火铳口内。使用规格一致的药匙，目的是使装药实现定量化。

永乐铳炮比较洪武铳炮在构造上有显著的改进。药室火门增加了活动盖，装填火药后把活动盖盖上，火药不受风雨灰沙的侵蚀保持干燥清洁。配用药匙，使装药实现定量化。《练兵杂纪》：“药多子轻，则未出腹而化如水；药少子重，则出腹至半途必堕地”。[16]装药定量化既防止因药量过多而导致铳炮爆裂，也避免了因药量过少而发射无力。使用“木马子”塞紧火药，压缩空气，可以增强火药的爆发力，使安在“木马子”前的弹丸受力瞬时集中，增加了射程和力度。

《大明会典》：“凡火器成造，永乐元年奏准，铳炮用熟铜或生熟铜相兼铸造”。[17]实物显示永乐铜铳炮铜质精良、铸作精细、规格统一、形制规整，其工艺质量和制作规范化程度在明代铜铳炮中堪称上乘。所以永乐奠定了明代火器发展史上第一个重要阶段。

4. 三眼铳。单管铳装填费时，而且火力较弱。于谦上疏：“贼之所恃者，弓马冲突而已。贼知我火器一发之后，未免再装迟慢，以此我军放罢火器，就便驰突前来。”[18]《英宗实录》：“军中手把铳发辄不继，贼已习知，每乘隙进兵。”[19]为

提高火铳射击速度和火力密度，嘉靖时开始创制了多管枪，三眼铳是其中一种。序号 12 三眼铳，铳管成品字排列，每个铳筒各有 1 个药室和火门，共用一个尾銮，尾銮中空用以安装木柄，供发射者把持。点火后可以轮流发射，也可以齐放。格斗时以铳头作锤砸击敌人。《兵录》：“三眼铳一杆三铳，每铳可著铅子二三个，伺敌三四十步内对准方放，一炮三放，其声不绝，未有不中者。虏马闯至则执此铳以代闷棍，虏纵有铁盔铁甲，虽利刃不能入者，唯以此铳能击之，故在北方鸟铳不如三眼铳。”[20] 明骑兵和神机营部队多配备三眼铳。

5. 序号 4 佛朗机铳。永乐以后中国火器发展出现了停滞状态，直到嘉靖时才有改善，从葡萄牙船上缴获佛朗机的引进，成就了明代火器发展史上第二个重要阶段。嘉靖九年（1530 年）右都御史汪鋐上言：“‘今塞上墩台城堡未尝不设，乃寇来辄遭蹂躏者，盖墩台止瞭望，城堡又无制远之具，故往往受困。当用臣所进佛郎机，其小止二十斤以下，远可六百步者，则用之墩台。每墩用其一，以三人守之。其大至七十斤以上，远可五六里者，则用之城堡。每堡用其三，以十人守之。五里一墩，十里一堡，大小相依，远近相应，寇将无所容足，可坐收不战之功。’帝悦，即从之。炮之有佛郎机自此始。”[21] 佛朗机由母铳和子铳构成，《练兵杂纪》有图及详尽记载。每佛朗机一架配备“子铳九门、铁闩二根、铁凹心送一根、铁锤一把、铁剪一把、铁锥一件、铁药匙一把、备征火药三十斤、合口铅子一百个、火绳五根。”[22] 佛朗机规格有“二尺、二尺五寸、三尺、三尺五寸、四尺、五尺不等”。[23]“其放法先以子铳酌大小用药。旧用木马又用铅子以轻马摧重子，每致铳损又多迟滞。今用入药不必筑，不用木马惟须铅子合口之半。旧以平顶送杆将子打平，出则不利。今制铁凹心送一根，送子入口内陷八分，子体仍圆而出必利，可打一里有余，人马洞过。”[24] 佛朗机发射后将子铳退出重新放入装填好弹药的子铳，装填弹药和射击分别操作，连装连发，不间断射击，提高了发射速度。母铳与子铳之间要用驻笋扣牢，避免母铳与子铳脱离。铳身两侧各备一个铳耳置于炮架上，铳尾可以上下左右转动。左右转动是调整射击角度，炮身俯仰能调整射程远近。《西法神机》：“铳弹远近，全赖铳口低昂；铳口低昂，复凭铳尾高下，则架铳耳之车不可不讲矣。”[25]《火攻挈要》：“小铳狼机，用弹重半斤至一二斤者，平放可到三五百步，仰放可到二三千步。大铳狼机，用弹重三斤至五斤者，平放可到七八百步，仰放可到三四千步”。[26]《武备志》中记载了五种佛朗机装弹装药量：“一号长九八尺，口必容铅子每丸一斤，用药一斤。二号长七六尺，口必容铅子每丸十两，用火药十一两。三号长五四尺，口必容铅子每丸五两，用药六两。四号长三二尺，口必容铅子每丸三两，用药三两半。五号长一尺，口必容铅子每丸三钱，用药五钱。”[27] 佛朗机依照其型号分为守卫要塞及舰炮、随军机动、单兵使用等各种功能。

6. 序号 5、6 流星炮。《大明会典》：“兵仗局造：流星炮‘嘉靖七年用黄铜铸一百六十副，发各边实验，式如佛朗机，每副炮三筒共重五十九斤一十四两。’”[28] 流星炮是明政府在仿制佛朗机的同时进行了改良，它的构造、性能及操作与佛朗机基本一致。不同的是佛朗机为圆形腹，流星炮为方形腹。流星炮有尾銮不带尾柄，铳管长，“母铳管长长则直而利远”，[29] 所以射程远。流星炮口径细，减少了重量，使用轻便。明代铳炮上都铸有多少不等的加强箍，这是为了防止火药炸膛。流星炮前膛较佛朗机壁薄，长度却更长，虽然有轻便和射程远的优点，反之也有更容易炸膛的缺点，前膛加铸了更多的加强箍应该是避免火药炸膛的措施。《请敕兵工二部速议修造战车火器疏》：“内库所贮铜铸火器，如灭虏炮佛朗机之类，略一试用，便即炸碎。此也须逐一试验，另行改造者也。”[30] 可见容易炸膛是明代铳炮一弊病，虽然铸制了加强箍但炸膛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完全解决。

7.《大明会典》：“军器局造：（嘉

靖）二十三年造马上使用小佛朗机一千付，四十三年又造一百付。”[31]序号9“马上佛朗机铳”应该就是记载中的“马上使用小佛朗机”，是骑兵专用的佛朗机式单兵轻型火铳。序号9铭文“嘉靖甲辰年兵仗局造”，虽然嘉靖甲辰年正是嘉靖二十三年，但这一件明确是兵仗局造，不属于《大明会典》记载“军器局造：（嘉靖）二十三年造马上使用小佛朗机一千付”之内，实物资料补充了文献记载。

序号7、8的规格、重量和序号9相近，也是佛朗机式单兵轻型火铳。

三、铳炮出土地点

馆藏北京明代铳炮出土地点有北京昌平、居庸关、延庆、八达岭、密云等地及城区内。明代北京长城从东到西横跨平谷、密云、怀柔、延庆、昌平等地，呈现出拱卫北京的态势。明代沿北京长城关隘建立起一套完整、坚固的军事防御体系。京城九门也是北京军事防御的重点。

四、铳炮装备及防御

史籍文献对明代铳炮在北京地区军队装备及防御战争中均有记载。明成祖永乐年间创建神机营，《明史》：“京军三大营，一曰五军，一曰三千，一曰神机。”“神机肄火器”，[32]“内卫京师，外备征战”，参与了朱棣以北京为基地进行的五次清除元蒙残余的北征。永乐十二年（1414年）征讨瓦剌，“上麾安远侯柳升等发神机铳炮毙贼数百人”，“都督朱崇、指挥吕兴等直前薄虏连发神机铳炮寇死者无算”。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八月“上命诸将于各营外布阵，神机铳居前，马队居后，令军士暇闲操习。且谕之曰：‘阵密则固，锋疏则达，战斗之际首以锐摧其锋，继以骑冲其坚，敌不足畏也。’”[33]由于火器在战争中发挥了巨大威力，明政府更为重视京军及北京周边关隘城防的火器装备及使用。正统十一年（1446年）“给沿边火器……密云铳三百、炮一百”。[34]土木堡之战和北京保卫战中都大量使用了火铳火炮。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户科给事中李侃启：“北虏马健来速，制其奔突宜用车战……京城内外约有千辆取为战车，车列四周步骑处中，车厢用铁索连木板藏神铳于内，俟交阵始发。”[35]正统十四年九月“提督居庸关巡守都指挥同知杨俊奏近奉旨于土木拾所遗军器得……神铳六百余个”，“宣府总兵官昌平伯杨洪言于土木拾所遗军器得……神铳二万二把……炮八百个，量给宣府万全怀安蔚州等卫马步官军领用”。[36]正统十四年十月“武清伯石亨、尚书于谦败虏于德胜门外。初，虏以数骑来窥德胜门，谦等伏兵于两旁空房，先遣数千骑迎战，诈败，虏众万余来追，伏兵起以神炮火器击之，虏遂却。”“敕都督毛福寿等于京城外西南街巷要路堵塞路口埋伏神锐短枪，以待策应。”“王敬、兴武与虏战于彰义门外，兴以神锐列于前，弓矢短兵次之，报效内官数百骑列于后，虏至，以神锐击却之。”“达贼之未入关者，运板木草束以攻居庸关，官军用火器击却之。”“并炮数百，四面夜袭虏营”。[37]《奉旨条上破格整理蓟镇兵食疏》：“窃惟昌蓟二镇，近在畿辅，实为腹心之地。”“大率军以十人为率，八人习火器，二人习弓矢，若使人人火器精熟。倚墙拒守。自当万全。”[38]《覆练火器以壮营伍疏》：“京军十万，火器手居其六”。[39]《四镇三关志》记载隆庆三年（1569年）至五年（1571年）从山海关至北京的长城沿线建空心台一千一十七座。“每台佛郎机八架，约每面两架，随势转用”，“附墙台每佛郎机三架”。当遇战斗时“以上临下，用火器佛朗机子母更番击打”。[40]《练兵杂纪》记每敌台“佛郎机八架，子铳七十二门，合口铅子二千一百六十个”，“神快枪八杆，合口铅子四百八十个”。每烽堠“大铳五个，三眼铳一把”。[41]明军还以铳炮为基础，创建了新型车炮营。“以十座为额，每座战车一百二十八辆”，每

“车上安大佛狼机二架”，“以六名（军士）管佛狼机二架”。每一车营“佛狼机二百六十五架，子铳三千三百四门”。[43]戚继光先后在蓟、昌二镇建立起七座车营，分别驻防在建昌、遵化、石匣、密云、三屯、昌平等地会同同样装备了大量火器的步、骑营联合作战。明政府在北京长城沿线建立了防守出击全方位的火器防御体系。

火器是明军在战争中依仗的绝对优势，明代在京畿地区的防卫中铳炮被广泛运用，北京地区出土的各种类型铳炮数量较多。鉴于北京在明代作为国都兼边塞的特殊地位，北京地区出土的明代火铳火炮反映了明代铳炮最先进的制造技术以及明代京军、北京城防防御、北京长城军事防御中铳炮装备实力，体现了明代军事中最高级别的铳炮装备力量。无疑北京地区出土的明代火铳火炮在上述领域的研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资料价值。

①刘旭：《中国古代火药火器史》，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第70页。

②⑮《明史》卷九十二《兵志四》，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册，第1514页。

③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69页。

④⑫⑰㉘㉛《大明会典》卷一百九十三《工部十三》，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9年版，第5册，第2620—2621页。

⑤⑥⑨《大明会典》卷一百九十三《工部十三》，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9年版，第5册，第2619页。

⑦《大明会典》卷一百九十二《工部十二》，第2607页。

⑧《大明会典》卷一百八十九《工部九》，第2567页。

⑩《陕西四镇军务事宜疏》，《皇明经世文编》卷三百十九，《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26册，第729页。

⑪《明神宗实录》卷五百五十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10509页。

⑬《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八十九，第2858页。

⑭成东：《明代前期有铭火铳初探》，《文物》1988年第5期，第68页。

⑯《练兵杂纪》卷五《军器制解》，《文津阁四库全书》，商务印书馆2006年影印版，第241册，第823页。

⑱《建置五团营疏》，《皇明经世文编》卷三十三，《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22册，第242页。

⑲《明英宗实录》卷一百八十九，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3887页。

⑳《兵录》卷十一《火攻杂说》，《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9册，第653页。

㉑《明史》卷三百二十五《外国六》，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6册，第5648页。

㉒㉓㉔《练兵杂纪》卷五，《文津阁四库全书》，商务印书馆2006年影印版，第241册，第821—823页。

㉕孙元化：《西法神机》，古香草堂刊印，第1662页。

㉖《火攻挈要》中卷《各铳发弹高低远近步数约略》，《故宫珍本丛刊》，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359册，第397页。

㉗《武备志》卷一百二十二，《故宫珍本丛刊》，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356册，第5页。

㉙《纪效新书》卷十五，《文津阁四库全书》，商务印书馆2006年影印版，第241册，第747页。

㉚《请敕兵工二部速议修造战车火器疏》，《皇明经世文编》卷四百四十三，《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29册，第12页。

㉜《明史》卷八十九《兵志一》，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册，第1453—1454页。

㉝《明太宗实录》卷二百六十二，第2396页。

㉞《明英宗实录》卷一百四十六，第2879页。

㉟《明英宗实录》卷一百八十一，第3513页。

㊱《明英宗实录》卷一百八十三，第3572页。

㊲《明英宗实录》卷一百八十四，第3634—3638页。

㊳《奉旨条上破格整理蓟镇兵食疏》，《皇明经世文编》卷二百七十六，《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26册，第239页。

㊴《覆练火器以壮营伍疏》，《皇明经世文编》卷四百四十三，《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29册，第12页。

㊵《四镇三关志》卷六《经略考》，《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10册，第206页。

㊶㊷《练兵杂纪》卷六，《文津阁四库全书》，第241册，第825—826页。

（作者为首都博物馆馆员）



万寿寺创建对明代传统佛事规制的四大改变

孔祥利

有明一代是佛教文化发展的重要时代，这与明皇室对佛教文化的重视与推崇密切相关。明嘉靖时期佛教的发展一度低落，而在明晚期京城佛教文化再度兴盛，以寺院和僧众增多为标志。这个时期的佛教发展以万寿寺的创建为典型事件，也以万寿寺的相关佛事活动掀起了崇佛的新高潮。万寿寺的创建不仅仅是皇家崇佛的一个举措，更是通过改变传统佛事规制达到崇佛意愿的措施。

万寿寺的创建活动，围绕着收藏、传播汉文佛经而展开。在这个过程中，明皇室对传统的佛事规制进行了四大改变，这四大改变使万寿寺成为明晚期最重要的皇室崇佛场所，也是皇室表达对佛祖崇敬和弘扬佛法的重要基地。

万寿寺历史上被称为“藏经香火院”。明皇室为何要建一座寺院收藏《大藏经》以取代汉经厂？这座收藏佛经的皇家寺院又有什么特殊之处？汉文佛经在这里的收藏又有什么意义？探讨这些问题，对于研究和保护万寿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意义，也对明代佛教文化发展研究具有意义。

一、改变佛教经典传统供奉方式以树立皇帝新形象

万寿寺的创建首先改变了明皇室对佛经的传统收藏方式。

明皇室从开国皇帝朱元璋始就尊崇佛教，特别表现出对佛教经典的重视。他曾在南京刊刻《大藏经》，该典籍史称“洪武南藏”。明成祖朱棣继承了这个传统，他在经“靖难之役”取得皇位后，便下令在北京刊刻《大藏经》，该典籍史称“永乐北藏”。这两部佛教典籍收集了许多佛教文献，为弘扬佛教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是佛教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

《大藏经》刊刻后，需要收藏机构进行保管。据载，在兴建万寿寺之前，皇家

的汉文佛经收藏在汉经厂。

据文献记载，在皇城东北角有番经厂和汉经厂，是内府管辖的机构，“其来久矣。庄皇帝（即明穆宗）尝诏重修，以祝釐延贶，厥功未就”[①]。汉经厂就是明穆宗生前欲实施重修工程但未完成之所。

汉经厂和番经厂是明代内府管辖的两个机构，兴建于明永乐年间。永乐皇帝为收藏《大藏经》，下令营建汉经厂和番经厂。这两个厂的厂址建在皇城的东北角，即后来的嵩祝寺遗址（位于今东城区宽街西南）。它们既具有国家库藏佛经文献的功能，又是宫廷举办特殊佛事活动的场所。据载，“皇城内旧设汉经厂。内臣若干员……如遇万寿节、元旦、中元等节，于宫中启建道场，遣内大臣瞻礼，扬幡挂榜，如外之应付僧一般，其僧伽帽、袈裟、缁衣，亦与僧人同，惟不落发耳。圆满事毕，仍各易内臣服色。”[②]

从这个记载中可知，皇家到收藏有佛经的汉经厂做佛事活动，成为一个制度。汉经厂实际成为皇家礼佛的佛事场所。这个场所日常收藏汉文佛典，到了节日时才会派官员扮做僧人的模样去做佛事活动。为什么要扮做僧人的模样举行佛事活动呢？在皇家看来，只有僧人做佛事活动才显得更正规和虔诚。这是一种在宫廷内举行佛事活动的临时性常规措施。汉经厂内存放着佛教经典，佛教经典也是佛界所供奉膜拜的对象。所以在汉经厂做佛事，相当于对佛教三宝之一的佛教经典进行膜拜。因此，我们说，在供奉佛教经典的场所做佛事，等同于宏扬佛法，是对佛教尊崇的表现行为之一。汉经厂的佛事活动意义就在这里。

两经厂从永乐年间建成至隆庆年间，也有了将近二百年的时间，明穆宗决定对二厂进行重修也是势在必行。先是修缮了番经厂，工程未竣，穆宗先逝。隆庆六年（1572 年）番经厂竣工后，汉经厂的重修工程便搁置下来。

万历五年（1577 年）初，面临着次年万历皇帝即将成婚，并到了亲政的年纪，在关系着万历亲政后形象的问题上，宫廷内一位重要的人物决定了万寿寺的出现。这就是万历皇帝的生母李太后。

据载，李太后“顾好佛，京师内外多置梵刹，动费巨万”。[③]在此之前，李太后修建了慈寿寺，表达了对穆宗的怀念。继而想让万历皇帝通过兴办佛事树立天子形象，即选中了穆宗生前汉经厂重修未竟之事。据张居正《敕建万寿寺碑文》载，“今上践祚之五年，圣母慈圣宣文皇太后谕，上若曰：创一寺以藏经焚修，成先帝遗意。上若曰：朕时佩节用之训，事非益民者弗举，惟是皇考祈佑之地，又重之以圣母追念荐福慈意，然不可以烦有司。乃出帑储若干缗，潞王、公主暨诸宫、御中贵亦佐若干缗。”[④]碑文记载称，在万历皇上登基五年之时，慈圣皇太后发布谕旨，说皇上欲创建一座寺院藏经焚修来取代汉经厂。又说皇帝常怀着撙节勤俭的训诫，不益于民众的事不办，只是这汉经厂本是先皇穆宗的祈佑之所，太后为穆宗祈祷祝福，所以必须加以重视。但此事不可以惊动官府，不可动用国库资财。于是李太后和一些贵戚捐出个人资财兴建寺院。

以创建寺院来取代汉经厂，改变明皇室几百年来由皇廷收藏佛经传统的举措，而这个举措的发布是李太后的谕旨中提出的，而她所打的则是万历皇帝的旗号。在万历皇帝还没有亲政的时期，李太后是宫廷内重要的决策人物。这里的“创一寺以藏经焚修”充分体现的是李太后崇佛的思想，是改变传统藏经方式的设想。

这个改变传统的做法，是如何体现新皇帝的形象的呢？首先表明这是在完成明穆宗的遗愿，恢复汉经厂的制度，虽然它改变了传统的藏经方式；继而以不动用国库经费为标榜，变官方筹费行为为个人集资行为，以个人可以兴建的寺院建筑取代宫廷官府建筑。因此，虽然花费了巨资，建造了庞大的建筑群，在名义上却可以标榜皇帝是位节俭爱民的君子，是在继承前朝的传统和规制，祈求佛祖护国佑民等等，

这项工程的启动反映了李太后等人训导万历皇帝的良苦用心。通过这种改变传统收藏方式的活动，达到了树立皇帝节俭爱民形象的目的，皇家崇佛的行动更为彰显的效果。所以万寿寺的创建，绝非简单地对传统佛经收藏方式的改变，它具有更深层次的意义。

二、改变藏经阁的位置以构成新型建筑艺术

万寿寺建成后“为尊藏汉经香火院”。寺院的建制，在张居正《敕建万寿寺碑文》中是这样记载的：“中为大延寿殿五楹，旁列罗汉殿各九楹，前为钟鼓楼、天王殿，后为藏经阁，高广如殿，左右为韦驮、达摩殿各三楹。修檐交属，方丈庖湢具列。又后为石山，山之上为观音像，下为禅堂、文殊、普贤殿。山前为池三，后为亭池各一。最后果园一顷，标以杂树，琪株璇果旁启，外环以护寺地四顷有奇”[15]。

这里所说的“后为藏经阁”中的藏经阁就是收藏佛经的场所。从碑文中可以看出，藏经阁位于寺院中部，它的后面还有一些建筑。这样将藏经阁置于寺院中部，是为了强调寺院的藏经功能，一般寺院的藏经阁都要安置在寺院的最后一进，大都以阁（二层以上建筑）的建筑形制出现。因为佛教经典文献要妥善保存安放在阁楼上。阁楼的建筑高大体量，适合将其安置在寺院的后端，它可以起到院落的屏障作用，是建筑风水格局的重要构成。但是一般寺院并不以藏经作为主要功能，即使藏经也是寺院自身所藏文献，因此它的地位并不重要，故安置在寺院后端，作为佛教殿堂的从属建筑。

然而万寿寺的创建使命是收藏皇家所珍藏的汉文佛经，相当于国库的性质。如果将藏经阁安置在寺院的最后一端，与它寺相同，则不能体现本寺的特殊功能，也不能彰显皇家对佛教经典的重视和尊崇。为了体现尊藏汉经香火院的性质和特殊性，将藏经阁的位置提前是必然的选择。

万寿寺藏经阁建于主佛殿的后面，一方面充分体现了对佛经文献的尊崇，一方面充分表达了寺院藏经功能的特点。

“中为大延寿殿五楹”，大延寿殿是寺院的正殿，内供主佛横三世佛。“后为藏经阁，高广如殿”，是指藏经阁的建筑规模如同正殿一样。这样的建筑规模和体量与正殿相比，充分显示了对该建筑的重视，实际上是把它与正殿等同对待。但是正殿大延寿殿是一层建筑，而藏经阁是两层阁楼式建筑，虽然外表看上去体量大小相近，但是实际上还是稍逊正殿。建筑屋顶形式也有区别，正殿为庑殿顶，藏经阁为歇山顶。这是对寺院建筑格局传统规制的改变。

寺院共有五进，藏经阁建在了第三进，也就是最中间的位置。前面两进院，山门、天王殿、大延寿殿的格局是一般寺院所具有的规制，没有变化。其后，则因藏经阁有了全面的变化。藏经阁的位置从寺后端提前到中间位置，那么它后面的建筑该是什么呢？一般寺院在中路建筑群中均为供奉佛像的殿堂，但是在万寿寺却安排了禅堂。为何要安排禅堂在藏经阁后面呢？这是因为寺院的焚修需要僧人，佛经佛法的传播需要僧众主持。所以在藏经阁之后建筑禅堂有着特殊的意义，正所谓佛法僧三宝的供奉。

由于藏经阁这个高大的建筑建在了寺院的中部，也就影响了寺院后部建筑的格局。在禅堂之后，寺院的最后一进院该如何处理呢，因为这时不能再出现像藏经阁那样的建筑。考虑到建筑群落风水格局的要求，寺后仍应当起架较高的建筑。但是如果出现了供奉佛像的高大殿堂则与正殿相抵触，也不合寺院格局尊卑礼制。

在已经把藏经阁置于中部之后，寺院的设计者们对寺院后部也做了突破性的改变。这就是在寺院后部堆起假山，使本来后部不应当高大的建筑坐落在较高的地基

上，从而解决了寺院后部应当有较高建筑的风水格局要求。

这就是敕建碑文中所描述的“又后为石山，山之上为观音像，下为禅堂、文殊、普贤殿。山前为池三，后为亭池各一”的建筑布局。

我们看到，为了表达“为尊藏经香火院”的目的，不仅藏经阁的位置从传统的寺后移置到寺中，而且对藏经阁之后的各个建筑也做了妥善的处理，使整个建筑群落看上去仍然完美，且具有特色。

万寿寺对传统寺院建筑规制的改变，营造了充满魅力的寺院格局和景观，是明代晚期寺院园林建筑艺术的典型代表。清代皇室在此基础上对寺院后部进行了扩建和美化，将万寿寺的建筑艺术推向了更高的境界。

三、改变寺院佛事活动模式以体现新的崇佛姿态

万寿寺的创建，除了佛经在收藏方式以及藏经阁在建筑格局上的改变之外，在佛事活动方式方面也发生了重大改变。

寺院建成之后，万历皇帝赐寺名为“护国万寿”，又派内官监大太监张进主持寺院事务。这是寺院佛事活动特点发生重大改变的标志。

就一般寺院而言，主持寺院佛事活动的大都是佛界高僧，或者寺院方丈。但是万寿寺的佛事活动却有着与众不同的特点，那就是直接接受内官监的管辖和太监的主持。寺院的僧人接受太监督率开展佛事活动。

据《宛署杂记》载，万历七年（1579年），万历皇帝先是委派太监张进于当地附近增购土地田庄和果园四顷多地，又于当年四月初四日，发布了一道谕旨，向官员军民众人等宣布万寿寺是依其旨意修建的。他说，“朕惟慈悲之教，盖以荫翊皇度，化导群迷，乃于万历五年，命建僧寺一所于西直关外广源闸地方。以崇奉三宝，庇佑民生。赐额曰护国万寿寺。凡殿阁、廊庑、方丈、庖庾规制咸备。复念寺众，无以养赡，于寺基后置果园及白地，共计五顷五十亩。又买到顺天府宛平县香山乡张花村民庄房果园四顷二十亩。其房地所出租课，俱供本寺香火之费，粮草差役，悉照先年大慈仁寺事例，一体优免。仍令内官监太监张进等侍奉香火，率督僧众焚修。尚虑愚顽之徒，罔知禁忌，或致毁亵侵凌，兹特赐寺禁谕。凡内外官员军民诸色人等，俱宜仰体至意，敢有不遵敕旨，辄肆侵犯者，必重罪不宥，故谕”。[8]

万寿寺因是继承汉经厂的制度而兴建的，所以它能够被视为宫廷内府管辖的一个附属机构，享受着与一般皇家寺院不同的礼遇。掌管寺院事务的是内府的内官监。内官监是掌管国家营建之役、皇家库用器材保管等事项的内府机构。内官监太监张进奉命主持寺院事务，总理一切内务。显然，万寿寺作为收藏汉文佛经之所被视为国家库藏管理机构的一个场所，这正是万寿寺与其它寺院区别的主要标志。作为取代汉经厂的藏经香火院，它将汉经厂所收藏的汉文佛经迁移至寺院之中，收藏在藏经阁内。寺院僧人在内官监太监督率下，奉经焚修。

明皇室虽然创建了寺院，但是并未因是佛教寺院的关系而放弃对其实施管辖，从这个角度上看，寺院仅是汉经厂建筑形式的改变，其实质上依然是宫廷的一个机构。这是经厂制度的一种延续。而作为寺院的文化内涵，在这里却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佛殿、经楼、禅堂，及至僧人生活所需要的一切设施规制都齐备了。所以它又不仅仅是形式上的改变，而是完全按照寺院的规制建设了。

一方面是宫廷内府管辖及其制度的延续，一方面是寺院的完整建制，这两方面的结合，就产生了万寿寺独有的佛事活动特点。这也是两种传统规制改变的产物。

这种对传统规制的改变，使万寿寺的

僧人得到了皇家寺院的最高礼遇，他们靠着皇室的恩赐，过着自食其力的无忧生活。据载，寺后“圃百亩，圃蔬弥望，种莳采掇，晨数十僧”。[⑦]可见，每天清晨在田园中劳作的寺僧就多达数十名。

寺院的佛事活动规模更是达到了空前的盛况。以往每当万寿节等节日，在汉经厂只是一些官员到此做佛事活动，而万寿寺取代汉经厂后，再逢这些节日，万寿寺便聚集远近数千名僧众为皇太后、皇上诵经祝寿，其场面十分壮观。据《万历野获编》作者沈德符描述，“其梵呗者几千人，声如海潮音”。[⑧]万寿寺僧人盛大的祝寿佛事活动引得世人注目。在文中沈德符把寺院数千名僧人的诵经之声描绘成“海潮音”。

每逢万寿节为皇帝祈祷祝福做佛事活动是明皇室的传统，万寿寺延续了这种传统，并且发扬光大。所聚集的数千名僧人举办的诵经活动，其震撼力远远超过了汉经厂的规模。可见，万寿寺的使命不仅是延续皇家的传统，更是体现皇家崇佛的虔诚，以及渴望获得佛祖保佑的祈愿。

朱翊钧对万寿寺的重视，还导致了他的替身僧也移至了万寿寺。据沈德符描述，这位皇帝的出家替身“年未二十，美如倩妇”。[⑨]作为皇帝的出家替身，他成为寺院的住持，主持寺院的佛事活动。

作为与皇家具有特殊关系的皇家寺院，万寿寺平日不对百姓开放，只是到了佛祖诞辰日即阴历四月初八，才从当月初一至十五开庙半个月，京城百姓可入寺烧香礼佛。因万寿寺是祈寿之所，故万寿寺庙会吸引着京城的善男信女，每天都有上万人涌进寺院内。

四、改变收藏方式以显弘扬佛法的虔诚

万寿寺不仅继承了汉经厂收藏汉文佛经的传统，还在创建之后，延续了向全国名刹继续颁送佛经的功能。

据《宛署杂记》载，万历十二年（1584年），李太后命续刊《大藏经》四十一函，并与明永乐年间所刊《大藏经》六百三十七函一道通行颁布。[⑩]早在明正统年间，也就是《大藏经》刊刻结束的时期，明英宗就发布谕旨，令将汉经厂收藏的《大藏经》中的各部经典作为皇家颁赐各大寺院之用。凡是得到赏赐的寺院，一定要建立藏经阁并且立碑纪事。至万历以前，仅京师就有17所寺院得到颁赐，如大觉寺、妙应寺、大慧寺、碧云寺等著名寺院。以上这些著名寺院均在寺院的后端兴建起藏经阁，作为收藏汉文佛经之所。

万寿寺作为藏经香火院，继承了汉经厂原有的各项功能，首先藏经阁未建于寺后而是建于寺中，《大藏经》未颁发部分全部入藏藏经阁。万历年间刊刻的《大藏经》又直接藏入万寿寺藏经阁内，以后便根据皇家需要散发全国著名寺院。从万历十四年（1586年）开始，敕颁十五藏，散施天下名山大刹。每次颁发佛经，朱翊钧都依照李太后的旨意颁发同样一道谕旨，要求安置赐经之寺院僧众，务必庄严持诵，妥为珍藏，不得随意处置损坏，特赐护持。[⑪]在藏经和颁经这方面，万寿寺完全继承了汉经厂制度的传统，而且佛经的一进一出，新刊和新颁，更加彰显了万寿寺的功能和作用。

万寿寺创建后，在汉经厂原址，还有一件重要的佛教法物一直到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前还没有迁移至万寿寺，这就是华严钟。这口永乐年间铸造的巨型铜钟，现收藏于觉生寺（大钟寺）内，钟体通高6.75米，直径3.3米，重46.5吨。此钟钟体内外遍铸汉文及梵文佛经、佛咒，共23万余字。由于它周身刻满佛教经文，便被当作佛经文献的一种收藏载体，因此被收藏于汉经厂。

万寿寺既然取代了汉经厂，华严钟随着汉文佛经文献一起迁入万寿寺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移动这样一口巨钟并非易事，而且按当时的规矩自然要择吉而行。

根据择吉结果，移钟时间定在万历三十五年六月十六日午后举行。这一时间的干支恰好是四丁未（年月日时皆为丁未干支），这个八字干支组合被时人认为十分吉利。对此，本人曾发表《万寿寺永乐大钟迁移悬卧考》（《北京文博》1996 年第 1 期）一文，做了相关的说明和论证。

华严钟的铸造早于《大藏经》（永乐北藏）刊刻 3 年，《大藏经》的刊刻与华严钟的铸造都是永乐皇帝弘扬佛法的举措，也是他定都北京后崇佛的重大举措。但是这两件事情的完成都在永乐皇帝去世之后。华严钟在宣德年间，《大藏经》在正统年间。汉经厂由此收藏了这两件佛教经典法物。

华严钟的铸造工期受到择吉时间的约束，开铸工程择吉选在永乐十六年（1418 年），最后浇铸工程择吉在其后的第九年。这时已是明宣德二年（1427 年），华严钟最终铸成。以后，华严钟就迁移至汉经厂存放起来。经历了明代九朝皇帝，这口大钟始终没有被利用，直到万寿寺的修建，它才得以从皇城内移出。相关论证见本人发表的论文《永乐大钟成铸时间考辩》（《北京文博》2001 年第 4 期）。

华严钟移至万寿寺后，安置在寺院东侧前端。据《长安客话》载，“寺有方钟楼，前临大道，楼仅容钟”。[12] 大道即万寿街，隔街即为玉河。这里需说明的是，寺院原有钟楼（即寺院中路一进院东侧钟楼）的体量是不可能安置下这口钟的，而且当时移钟至寺院后也不可能拆除钟楼扩建，因为那样钟楼建筑的体量就不合寺院的规制了。所以，新钟楼只能另择寺院中路之外它处，并作为寺院一路正殿来供奉。另据《宸垣识略》载，“左钟楼，前临大道”，[13] 也说明华严钟楼不在寺院中路，而在寺院左侧即东侧。

华严钟在汉经厂近二百年的时间内，仅仅是卧地存放，而到了万寿寺则以悬挂于钟楼为供奉的形式，这种对佛教法物供奉形式的改变，正是以新的姿态崇奉佛法的表现。

华严钟悬于方钟楼后，“日供六僧击之”，[14] 寺院每天派六名僧人于晨昏时分撞击大钟。由于华严钟质地精纯，钟声非常洪亮，据载，大钟“昼夜撞击，声闻数十里，其声铿铿，时远时近，有异他钟”，[15] 而且钟的音色、音质优美，京城大部分地区都能听到从万寿寺传来的钟声。这样一来，万寿寺的名声大振，京城人士纷纷来到万寿寺一睹御钟风采，聆听优美动人的钟声。许多文人墨客由感而发，赋出众多的优美诗篇，赞颂华严钟的风采。

华严钟在万寿寺不仅改变了以往卧地存放的形式，而且悬挂后每日击钟，对这件佛教法物的供奉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华严钟本是永乐皇帝为超度靖难之役亡灵、修忏而铸，企图通过弘扬佛法、大兴佛事的善举获得解脱和佛的荫庇。而从悬于万寿寺之后，华严钟的这个诞生使命便改变了：因为寺院的佛事活动都是在为皇帝祝福祝寿，所以大钟被撞击也是在为皇帝和皇朝祝福，钟声象征着佛法的传播，象征着对皇家天下永昌和皇帝福寿的祈祷。如当时的文人所称：“每击，八十一卷，三十二分，字字皆声。是一击，竟华严一转，般若一转矣”。[16]

由此，从汉经厂改为寺院到佛事活动的特殊性，从藏经阁位置的改变到华严钟的悬击，万寿寺创建后对明代传统佛事规制的四大改变，使对佛教的尊崇最终达到了空前的境况，近乎极至的局面，形成了晚明时期佛教发展的新高潮。

---

①④⑤ 张居正：《太岳文集·敕建万寿寺碑》。
② 刘若愚：《明宫史·内府职掌》。
③《明史·后妃传》。
⑥⑩⑪《宛署杂记》卷十八“万字”。
⑦⑭⑯《帝京景物略·万寿寺》。
⑧⑨《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七《京师敕建寺》。
⑫⑮《长安客话》卷三《万寿寺》。
⑬《宸垣识略》卷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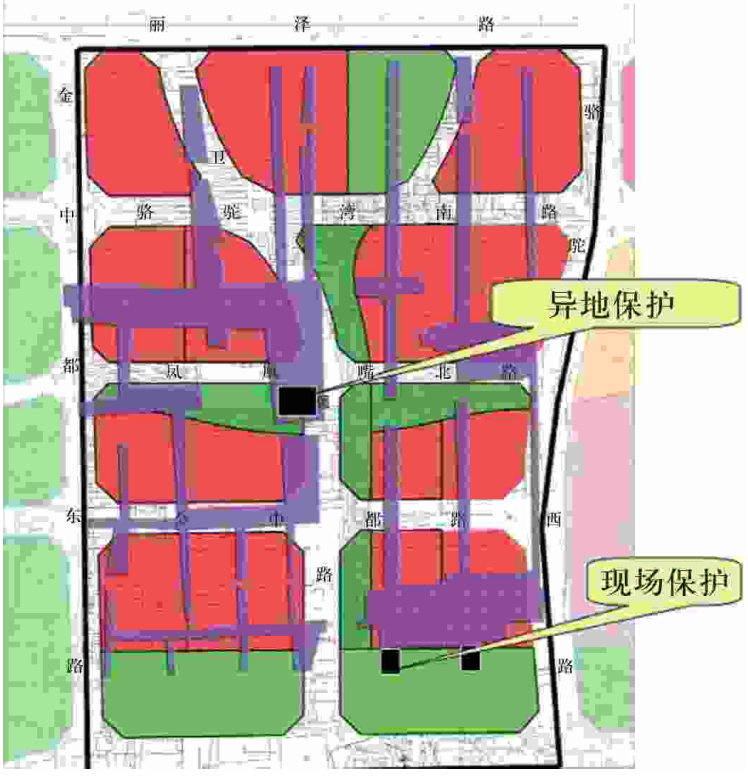
（作者为北京艺术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丽泽金融商务区金中都西营遗址起取保护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2010 年 7—12 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技术室与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共同完成丽泽金融商务区金中都西营遗址起取保护，待丽泽金融商务区工程完工后进行回位复原保护工作。该项工作是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为了配合丽泽金融商务区 B6—B7 地块项目工程建设，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和《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的相关规定，按照北京市文物局的指示，本着既利于工程建设，又利于地下文物保护开展的。

丽泽金融商务区 B6—B7 地块位于丰台区凤凰嘴村的北部，南距凤凰嘴村金中都城墙遗址公园 21 米。该地块东临骆驼湾东路，南临金中都北路，西临金中都东路，北临丽泽路，占地面积 231000 平方米，共发掘清理各类遗迹 108 处。其中金代房址 57 处、井 2 眼、灰坑 6 座、路 2 条、烧灶 37 个、沟 3 条、瓦片遗迹 1 处。



北京丽泽金融商务区 B6B7 地块文物遗址分布图

一、金中都历史回顾

金中都的城中心地带在现今的广安门外、西二环处，宫殿遗址就在广安门桥南附近，金以燕京为都城，标志着北京正式成为皇都，并成为当时中国北部的政治中心，这是北京发展史上的又一个转折点，即北京由方圆都邑、北方重镇、三燕临时都城而成为正式皇都。金中都是仿照北宋都城汴梁的规制，在辽代南京城的基础上进行大规模扩建的。城廓略显正方形，由大城、

皇城和宫城三部分构成。大城（外城）设城门 12 座，每面 3 座。今广安门大街就是当时横贯燕京城的东西大道。从 1153 年海陵王完颜亮在北京建设中都到 1215 年忽必烈一把火烧了金中都城，仅仅存在了 60 多年，但是金中都在北京的历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开创了北京作为都城的历史。此前的辽国也曾在北京进行过城市建设，但那仅仅是陪都而已。金中都才让北京正式成为封建帝国的统治中心。以 1153 年作为北京初建都的年份，到 2003 年就是建都 850 周年，那一年就在原金中都大安殿旧址上，建了北京建都纪念阙。

二、土遗址保护中的注意问题

在考古发掘过程完成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由于遗址裸露和气候等因素，导致土体内部水分蒸发过速，致使土体收缩，这种收缩是土体开裂的主要原因。长期裸露受到外界影响，遗址表面的原始保存状态被不同程度地剥蚀破坏，这是土体本身损缺改变其固有形态的主要原因。土遗址本体病害类型主要有土质风化、墙壁坍塌、土体干裂等。

常规下物体热胀冷缩的这种变化随着温度的周期变化而变化。对于土遗址，这些变化产生的土体本身涨缩应力必然导致稳定性下降，具体表现为开裂脱落等。对于暴露于自然环境中，温度低于冰点还会导致水分结冰，及可溶盐在水的作用下在土体内运动等。人为因素来自人类在遗址上进行的生活、生产、建筑等活动，这些都有意无意的造成破坏。

三、遗址起取前保护

丽泽商务区金中都西营遗址在起取保护工作前，对该遗址进行加固。为了采取更有效的加固措施，更合理的施工工艺，我们针对以前做过的保护工作中的经验于现在遗址土样进行试验，得出最佳保护的加固剂及渗透使用的可行性。具体实验工作是要对该遗址保护中与保护后效果比较。对所起取的几种不同的样块，按要求配置一定浓度用量的加固液体，按照喷洒量、速度、分块分次，即喷洒一次后观察效果：（1）要看遗址上有没有泛白现象，如泛白就说明浓度大了，（2）喷洒速度控制，不宜过快，否则还没有来得及完全渗透，继续喷洒就有留物在遗址表面上。这两种现象（泛白、留物）出现说明喷洒没有起到作用，等于没有加固保护的效果。（3）当用药液过量后，表面也会泛白，这是由于遗迹表层饱和的原因。在以后遇到温湿度发生变化时，遗址还会发生泛白，这就会影响回迁工作的展示与陈列。因此在实际加固工作中更需要多次加固，待第一次喷洒的加固溶液完全干燥后，以相同的方法进行第二次、第三次喷洒加固，直至该遗址的土体自身达到我们所需要的标准，就是需要的保存条件所具备的硬度及受到潮湿所显现的效果。

四、套箱起取保护

将遗址根据丽泽金融商务区 136-137 地块考古发掘平面图，定出具有能反映金代房址的原貌和反映当时历史记忆的起取遗迹范围，以备将来金融商务区建成后进行回迁展示。

这次套箱起取工作是以 F25 定标，位于发掘区的中南部、T0302 的西南部，方向 93°，距地表深度 2 米。该 F25 发掘清理出 8 个柱墩。

F27 位于发掘区的中南部，T0302 的中西部，方向 93°，距地表 2 米，清理出 8 个柱墩。F34 位于发掘区的中部，T0303 的西北部，方向 93°，距地表 2 米，清理出 31 个柱墩。中部、东部、西部和南部柱墩分别被现代坑打破。

在切块分割套取工作之前，首先对丽泽金融商务区 B8-B7 地块定出的金中都遗



套取中挖槽



套取中用石膏灌缝



套取中



套箱完成

址中西营房遗址依次进行编号、登记、拍照，留取必要的资料，明确记录每一块套取的详细位置与角度，以便在回迁工作中确保金代房址展示的真实性、准确性。

操作的程序：

划定准确所需起取的范围，将划分线以外的土方挖取掉，深度较套箱高度的 60 厘米略少，为 50 厘米。在两块探方与两块探方以上相连的遗迹划分为其中间 15 厘米左右厚的切割线。

套箱的制作是根据起取土块尺寸大小而定，制作好的套箱放下。切割的遗迹上四边为 2 厘米最好。

用宣纸在遗迹表面进行覆盖，它起到隔离套箱封盖前与回填土的作用，使遗迹的原始状态不会损坏。

套箱外框放好后，用石膏浆对所预留的 1-2 厘米空隙进行灌注，目的是使木箱与遗迹块成为一个整体。检查好，覆盖宣纸（起隔离作用），放好最后一层土，填平至木箱上口之后，封盖。

插底板工作，将套箱底板预先编排好，按顺序在套箱底部掏挖土方。当掏挖的深度与编排的底板大小一致时，即可从底部将底板支垫牢固，把底板两端与套箱固定，采用大号木螺丝钉拧上，目的是防止脱落，直至完成最后一块木板的支垫。最后整箱加固，此次的最后整箱加固在以往套箱底部用槽钢托以保套箱整体性的基础上，又用整体钢托托起套箱两侧用钢托伸出钢条夹住，以防套箱移动中套箱变型，导致套箱内遗迹受扰。用吊车调出现场，至此整个起取工作完成。

执笔：董育纲

北京市文物局 2011 年一季度文博事业

大 事 记

1 月 7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参观了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的“首届世界华人典藏大展”。

1 月 10 日　2010 年度局领导班子和局领导干部述职考评会议在机关礼堂召开，局属单位党政负责人、机关处级领导干部及职工代表参加会议。局党组书记、局长孔繁峙同志代表局领导班子做了 2010 年度工作总结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情况报告，各位局领导结合个人思想政治状况、履行岗位职责、完成重点工作、廉洁自律等情况进行了述职述廉。按照规定，参会人员填写了局领导述职考核表。

1 月 14 日　国家文物局单霁翔局长一行 5 人来到正阳门管理处检查安全工作。

召开北京市文物系统 2010 年度工作会。会议传达了市政府专题会研究全市文物安全工作情况与《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总结了全市文物系统 2010 年度工作，通报了 2010 年度全市文博系统文物安全与执法工作考核评比情况。局党组书记、局长孔繁峙同志部署了 2011 年工作。

1 月 18 日　发布《北京市文物局科研课题管理办法（2010 年修订）》。

1 月 22 日　首都博物馆艺术团在礼仪大厅举行了汇报演出——大型民俗风情乐舞《婚风喜庆老北京》。这是 2010 年 5 月 18 日艺术团成立以来，推出的首台以本馆展览内容为主题的舞台演出。

1 月 24 日　“欢乐文博”2011 年春节联欢会在首都博物馆举行，局领导发表了新年致辞，全局系统 1300 名干部职工参加联欢。

1 月 24 日—25 日　市文物局举办文物行政执法及文物鉴定知识培训，为考试合格的市区两级文物行政执法人员颁发了国家文物局统一制作的“文物行政执法证”，各区县文化委员会 100 余人参加培训。

1 月 26 日　根据行政许可审批事项要求，经局务会研究，同意国文科宝（北京）新材料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二级可移动文物修复单位资质”和“甲级可移动文物技术保护设计单位资质”的申请。

召开2011年目标管理责任书签订大会，局属单位党政领导及机关正、副处长参加会议。局党组对局属各单位2010年目标管理责任书完成情况进行总结和表彰，与23个局属单位签订了2011年《目标管理责任书》。局党组书记、局长孔繁峙同志做了重要讲话。

1月27日　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张淼一行3人到首都博物馆检查安全工作。

启动2011年北京地区博物馆“博物馆里过大年”春节系列文化活动。

1月28日　为落实刘淇同志关于北京中轴线申遗工作的指示及市委、市政府关于首都功能核心区文化发展的要求，市文物局与东城区、西城区文物和名城保护管理部门以及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等相关专业研究单位进行了深入沟通，分析了当前中轴线申遗工作的基本情况和存在的难点，研究提出今后的主要思路，初步规划文物修复、搬迁整治等工作重点，为正式启动中轴线申遗工作奠定了基础。

1月31日　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陈启刚到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检查安全工作。市文物局局长孔繁峙、巡视员巴爱民等陪同检查。

1月份　经市文物局博物馆专家组实地考评及局务会研究，同意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注册登记。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培养之文物鉴定、修复和文物修缮类人才培养工作调研》和《清代园寝志》结题完成。

2月14日　市政府办公会研究原则通过北京市第八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2月15日　召开“香山寺遗址”保护及建筑复原立项专家讨论会。北京建工学院文物保护设计所汇报了《香山寺后苑原址重建工程初步方案》，专家们提出了应进一步完善遗址保护、修复可行性研究等意见建议。

2月16日　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在东城区图书馆多功能厅举办北京古都历史文化系列讲座。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庆柱研究员做了题为“曹操墓的确认、质疑和释疑”的报告。

2月23日　由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主办的“中欧青年交流年”中方开幕式在首都博物馆礼仪大厅举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开幕式。

2月24日　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崔国民调研房山区文物工作情况。

为落实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关于开展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工作检查的通知》要求，召开顺义区龙湾屯镇焦庄户村历史文化名村检查汇报会，对保护和自查情况进行了评估评分。

2月份　圆满完成2011年春节期间全市文博系统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全市文博系统未发生因燃放烟花爆竹而引起的火灾事故，受到市领导表扬，被北京市人民政府烟花爆竹安全管理领导小组和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评为先进集体。

3月1日　北京市地方标准《文物建筑雷电防护技术规范》颁布施行。

3月2日　北京市文物局巡视员巴爱民及市文物局有关处室负责人一行8人来到昌平区调研文物工作。

3月4日　举办以“纪念赵其昌先生”为主题的第30次北京市文物局青年学术论坛活动。

3月7日　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龙新民带队的调研组一行6人，在北京市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孔繁峙，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崔国民，纪检组长张若妮，副巡视员刘开阳的陪同下来到首都博物馆考察调研。

由外交部礼宾司主办的“我眼中的中国——驻华女使节和使节夫人摄影展”在首都博物馆礼仪大厅隆重开幕。

3月9日　举办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百姓宣讲选拔赛，局系统单位有

15 名选手参赛。选手们围绕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来的光辉历程及首都文博事业的发展变化进行精彩演讲，最终选拔出三名选手参加宣传系统比赛。

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王丹江带领市文物局文保处、安全督察处、博物馆处、法规处负责同志到东城区调研文物工作。

3 月 10 日　召开 2011 年度北京文物拍卖工作会议。会议传达了全国文物拍卖管理工作座谈会精神，总结了 2010 年度文物艺术品拍卖情况，强调了北京文物拍卖市场存在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并对 2011 年文物拍卖重点管理工作进行了部署。嘉德、翰海、保利等全市 78 家文物拍卖企业参加了此次会议。

3 月 14 日　共青团北京市委副书记于庆丰率北京国学院工作执行团队一行 10 余人来到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调研。

3 月 21 日　市文物局与市发改委、市规划委联合调研中轴线保护现状，对钟楼、鼓楼、万宁桥、火神庙、地安门外大街、地安门内大街、景山、大高玄殿等区域进行了实地考察。

3 月 22 日　市文物局组织《文物建筑修缮工程操作规程》编写人员参加地方标准制定的培训。

3 月 23 日　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一行 40 余人，就北京中轴线文物保护和申遗工作等情况来到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进行视察、调研。

3 月 24 日　市发改委一行 10 余人，在市文物局计财处、文保处有关同志的陪同下，就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周边有关建设审批和北京先农坛文物保护等情况进行考察、调研。

3 月 25 日　参加市政府张玉平副秘书长主持召开的研究固定资产投资审批大厅办理事项审批流程工作会议，会议就《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优化本市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审批流程和完善北京市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行政审批综合服务大厅工作机制的意见》（代拟稿）及审批流程图进行了讨论。

启动孔庙十三经碑林和进士题名碑保护工程的设计招投标工作。

3 月 28 日　启动明十三陵裕陵修缮工程的设计招投标工作。

3 月 29 日　启动怀柔区怀北镇河防口段长城修缮工程的设计招投标工作。

参加徐波副秘书长主持召开的丰沙线改移协调会，要求石景山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惠济庙原址保留，请建设单位将原址保护方案与区文委直接沟通。

3 月份　陪同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实地调研首都钢铁厂。委员们提出应充分认识工业遗产在文化发展、城市发展中的重要价值，尽快完成对保护工业设施的认定，同时提出首钢应申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根据东城区文化委员会做出的《关于对曾一智女士申请认定不可移动文物来信的回复意见》，曾女士向我局提起行政复议申请。在受理该行政复议申请后，经多次协调当事人及相关部门，最终曾一智女士决定撤销行政复议申请，市文物局决定终止该行政复议。

完成局系统 2010 年度科研成果统计。2010 年度共发表论文 344 篇、出版物 38 部、开展课题 34 项。

经博物馆专家组实地考评及局务会研究，同意北京市房山世界地质公园博物馆注册登记。

一季度　北京古代钱币展览馆对德胜门箭楼城台的四门火炮进行了全面修复和保护工作，并通过了专家验收。

北京燕山出版社《道藏说略》（上、下）获第二届中国出版奖政府提名奖，《土地征用过程中农民利益保护问题研究》、《北京地名研究》、《北京近千年生态环境变迁研究》和《清代前期关税制度研究》4 种图书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组织完成了全国“两会”期间局属单位的安全管理工作，全局系统单位平安无

事故。

对2010年度区县文物系统文物安全和执法工作、局属单位文物安全工作表现突出的先进单位、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颁发了奖牌和证书。

共接待公、检、法等部门涉案鉴定13次，鉴定涉案文物68件。

共完成对全市31场拍卖会25282件（套）标的的依法审鉴工作，确定国家一级珍贵文物1件，撤拍文物标的23件。第一季度文物拍卖总成交额达18.94亿元，同比增长197.8%，创第一季度成交额新高。

2011年第一季度市文物局属博物馆参观人数统计表

名称	入馆总人数	购票人数	免票人数	学生	老人
首都博物馆	251084	4893	246191	43084	58916
大觉寺管理处	27640	23947	3693	22	944
正阳门管理处	26131	26101	30	0	15
徐悲鸿纪念馆	0	0	0	0	0
北京文博交流馆	12040	8427	3613	672	2941
北京辽金城垣遗址博物馆	11653	0	11653	3954	2954
北京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	5930		5930	1750	690
北京艺术博物馆	68996	67381	1615	102	402
团城演武厅管理处	2144	0	2144	298	825
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	5605				
大钟寺古钟博物馆	10900	4470	6430	1101	2318
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	5086	4111	975	667	416
白塔寺管理处	31917	27448	4469	25	1530
老舍纪念馆	7466	0	7466	3624	2197
北京古代钱币展览馆	17689	17480	209	16624	1065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	4448	3801	647	41	697
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	76890	72692	4198	9861	6226

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北京部分介绍（十六）

北京鲁迅旧居



●年代：1924—1926 年

●说明：北京鲁迅旧居现位于西城区阜成门内北京鲁迅博物馆内，建于 1924 年，为一座小型四合院，北房 3 间，南房 3 间，东西厢房各两间。鲁迅先生曾于 1924 年 5 月至 1926 年 8 月在此居住。这里是至今保存最为完整的鲁迅在北京的故居。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

国立蒙藏学校旧址



●年代：清

●说明：国立蒙藏学校位于西城区小石虎胡同 38 号，旧址明初为常州会馆，是京城最早的会馆之一。清初为吴三桂之子吴应熊的府邸，因清太宗皇太极的十四女恪纯公主下嫁吴应熊，所以人们一直称这里为驸马府。雍正二年（1724 年）清政府分设左右两翼宗学，培养宗室弟子，右翼宗学即设于此。后来为清高宗第一子定亲王永璜之长子绵德府第。1913 年蒙藏院在此开办蒙藏专门学校。1923 年秋，李大钊、邓中夏等来校开展革命工作。1924 年乌兰夫、奎壁、吉雅泰等一批青年学生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批蒙古族党员，并在此组建了蒙古族的第一个党支部。国立蒙藏学校旧址分为东西两路建筑。西路有三进院落，建筑高大，主要由府门、正厅、过厅、后厅、东西跺殿、东西配殿等建筑组成。东路有四进院落，建筑相对较小，包括大门、正殿、北房、东西配殿、东西耳殿。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